

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

107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

——从古罗马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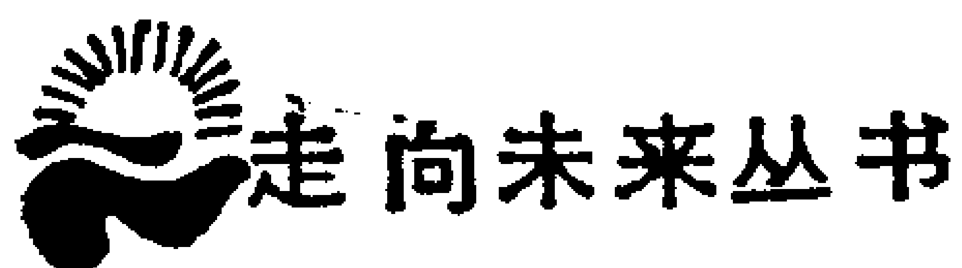
金观涛 唐若昕 编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成都

特约编辑：王小强

责任编辑：安庆国
封面设计：戴士和
插　　图：季云飞
装　　帧：盛寄萍



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

金观涛　唐若昕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三号）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960mm 1/32　印张8.25　插页5　字数117千
1985年4月第一版　1985年4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17118·113　印数：1—62,500 册

定价：1.26元

编者献辞

《走向未来》丛书和读者见面了。

她凝聚着我们的心血和期望。

我们期待她能够：展现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日新月异的面貌；反映人类认识和追求真理的曲折道路；记录这一代人对祖国命运和人类未来的思考。

我们的时代是不寻常的。二十世纪科学技术革命正在迅速而又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生存方式。人们迫切地感到，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千变万化的未来。正是在这种历史关头，中华民族开始了自己悠久历史中又一次真正的复兴。

在艰苦而又富有生命力的改革道路上，我们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理解了科学的价值，并逐

步深化了对我们时代和民族的认识。今天，我们听从祖国的召唤，热情地投身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潮流。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今天，照亮我们民族的思想闪电，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和我们民族优秀传统的结合，以及由此开始的创新！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领导下，我们编辑了这套《走向未来》丛书。

她力图从世界观高度把握当代科学的最新成就和特点，通过精选、咀嚼、消化了的各门学科的知识，使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能从整个人类文明曲折的发展和更迭中，理解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和历史地位，科学地认识世界发展的趋势，激发对祖国、对民族的热爱和责任感。

她特别注重于科学的思想方法和新兴的边缘学科的介绍和应用；把当前我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文学艺术方面创造性的成果，严肃地介绍给社会，推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卷，第15页。

《丛书》是个新的园地，她将自始至终贯彻严肃认真的学风和生动活泼的文风。

《走向未来》丛书，从她一开始就受到老一辈共产党人关怀，受到学术界前辈的热情支持。

约四百年前，弗兰西斯·培根在《伟大的复兴》一书序言中，曾经这样谈到书中描述的对象，他“希望人们不要把它看作一种意见，而要看作是一项事业，并相信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不是为某一宗派或理论奠定基础，而是为人类的福祉和尊严……。”我们怀着真挚的感情，把这段话献给《丛书》的读者，希望广大读者关心她、批评她、帮助她。

让她成为我们共同的事业。

《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

一九八三年六月于北京

目　录

第一章　序言：对历史哲学的渴求………………　1
第二章　从古罗马看社会组织的秘密……………　21
2.1　罗马帝国奇特的商品经济……………………　23
2.2　城市生活和罗马帝国的政治与意识形态……　35
2.3　罗马、中国、印度——不同的社会结构……　46
2.4　社会组织的结构-功能分析…………………　59
2.5　罗马共和国怎样演变为罗马帝国……………　69
第三章　古代社会的衰落…………………………　83
3.1　是什么因素侵蚀了罗马共和国的小农经济…　85
3.2　罗马帝国灭亡之谜……………………………　90
3.3　没有万古长存的帝国…………………………102
3.4　适应态破坏的原因：功能异化………………114
3.5　一个比喻：赫胥黎之桶………………………125
第四章　新社会结构的诞生：西欧封建社会和拜占庭帝国……………………………………135



4.1 潜组织的成长和取代……………………………137
4.2 查理曼帝国和西欧封建制的确立……………143
4.3 东罗马帝国：斯拉夫人入侵和君士坦丁堡…155
第五章 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首先在西欧确立……………………………………………167
5.1 中世纪城市和古希腊罗马城市、东方古代城市的差别……………………………………………169
5.2 影响资本主义确立过程的三种因素…………179
5.3 议会和三角形均势：英国捷足先登…………188
5.4 官僚机构的阻碍和法国急风暴雨式的大革命……………………………………………203
5.5 王权衰落和再版农奴制：德国的道路………214
第六章 结构取代和社会进步 ……………………227



第 一 章

序言：对历史哲学的渴求

历史的进程犹如人生，叉道之中又有叉道。我常常扪心自问，应到哪里去寻找通向真理的大路。

——无名氏

1980年，一部长达四十万字的书风行世界，这就是著名记者、未来学家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托夫勒在书中宣称，人类社会已经经受了两次浪潮的冲击，今天又面临着滚滚而来的第三次浪潮。

第一次浪潮是农业社会的兴起，它历时数千年。第二次浪潮是二百年前开始的工业革命，它摧毁了古老的农业社会，创建了具有非凡扩张能力的工业化文明。目前，新的产业革命正以它汹涌的势头掀起第三次浪潮。托夫勒在这本书中兴冲冲地向读者展示了第三次浪潮将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变化。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写道："人类的历史远未结束，人类的故事不过是刚刚开始。"

不管托夫勒对人类未来的描绘是否正确，我们以一个历史研究者的眼光鸟瞰一下整个文明史，就会发现社会发展的进程确实颇为壮观而又十分奇特。人类的历史虽然远未结束，但它的故事却可以追溯到远古的年代。地球上出现农业社会已有几千年了，正是在这漫长的农业社会中，诞生了许许多多不同的社会结构，形形色色的文明之花竞相开放，几乎所有的民族都在这一时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相比之下，工业化浪潮的历史却短得出奇。尤其令人惊异的是，工业革命并非象海浪一样在所有的文明中自然迭起，与其说它象浪潮，不如说它象喷泉，在两百多年前欧洲的一个面积不大的岛国上喷射而出。众所周知，这就是英国的产业革命。

当十八世纪英国产业革命发轫的时候，不仅传统社会的阴霾笼罩着整个东方，就连欧洲大陆的法国和德国也处在封建势力强有力的桎梏之中。但是改变整个人类面貌的历史从此开始了。这个神奇的喷泉带来了空前的骤变，法国、德国、美国、日本先后学习英国的模式，建立了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泉水迅速地变成洪水，几乎形成席卷全球的浪潮。

工业革命的历程向人们提出了一个深刻而严峻的问题：为什么工业革命在英国最先爆发？而没有出现在那些历史更悠久、资源更丰富的东方国家？

从某种意义上说，追溯浪潮的源头比研究浪潮本身更为重要。人类有一种颇为幸运的天性，那就是善于遗忘过去的阴影而乐观地面对未来。但是现在，这种自然的乐观主义受到了挫折，社会的变化是这样的迅速，以致于人们还来不及思考变化的原因，变化了的现实又被接踵而来的新变化所取代了。发展的洪流迅猛地冲击着传统社会的结构，大变动的暴风骤雨无情地荡涤了人类社会史上的遗迹。越来越多的人们感受到：如果我们不理解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那我们就不可能知道今后将发生什么。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要认清人类社会今后的道路，必须透彻地了解它曾经走过的漫长道路。

在探讨工业革命兴起时，人们常常只注意生产力发展的进程，也就是说，仅仅把它看做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早在十七世纪以前，英国就具备了经济起飞的条件，商品经济非常发达。圈地运动急剧地破坏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英国的工业，首先是毛织业的兴起奠定了基

础。近年来，历史学家们发现，这种看来是无可非议的观点是很值得怀疑的。

就拿十五——十七世纪的圈地运动来讲，据1455—1607年在英格兰中部、东部24个郡的统计，这些地区共圈地516,676英亩，只占24个郡土地总面积的2.76%，驱逐农民仅5万人左右。圈地最多的中部14个郡，共圈地386,810英亩，占14个郡土地总面积的6.03%①。从这些数据来看，这一时期英国的圈地运动对小农经济的瓦解作用十分有限。

再把十七世纪前英国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与德国和法国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到，十五——十六世纪英国的商业不如法国发达，整个经济水平也不如德国。据研究者统计，德国十六世纪采矿业居欧洲首位，它的白银产量比欧洲其它地区的总和的三倍还要多。恩格斯曾精辟地论证了这一点，他指出："在经济方面，德国完全处于当时各国的水平之上。"②"德国的金银开采在多大程度上成为最后的推动力，使德国在1470年—1530年在经济方面处于

① «关于英国圈地运动的若干资料»，载于«世界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10期。

②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60页。

欧洲的首位，……说它是最后一个因素，是说行会手工业和中介商业已达到较高的发展水平，而这一点使德国超过意大利、法国和英国。”①但是，产业革命并没有最先在法国和德国爆发。

进一步研究表明，英国自耕农的迅速消失，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是在十八世纪，是与工业革命同步的，甚至可以看作是工业革命的结果。图1.1绘出了英国1688年—1868年经济增长的曲线。这条曲线证明英国经济飞速发展和工业革命的产生，是在十七世纪中叶资产阶级革命完成后的事情。1688年，即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四十年以后，英国的国民总产值仅为4,800万英磅。这个数目显示的经济水平，即使与当时的法国和德国相比，也不算先进。但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在短短两百年的时间里，英国的国民总产值一下子增长了10倍，②并长期呈现出指数曲线增长的趋势。

实际上，把机器的使用、大工业的兴起仅仅看

①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1889年9月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267页。

② 钱秉旦《论工业革命造成的英国社会结构变化》，载于《群众论丛》1980年第4期。

成是经济本身的增长所致是十分片面的。问题的本质在于：英国十七世纪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起资本主义政体。它对经济的发展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一系列迫使小农经济瓦解，促进资本主义大工业兴起的法令是资产阶级政府颁布和实行的。难怪三百年前英国著名的思想家霍布斯说："如果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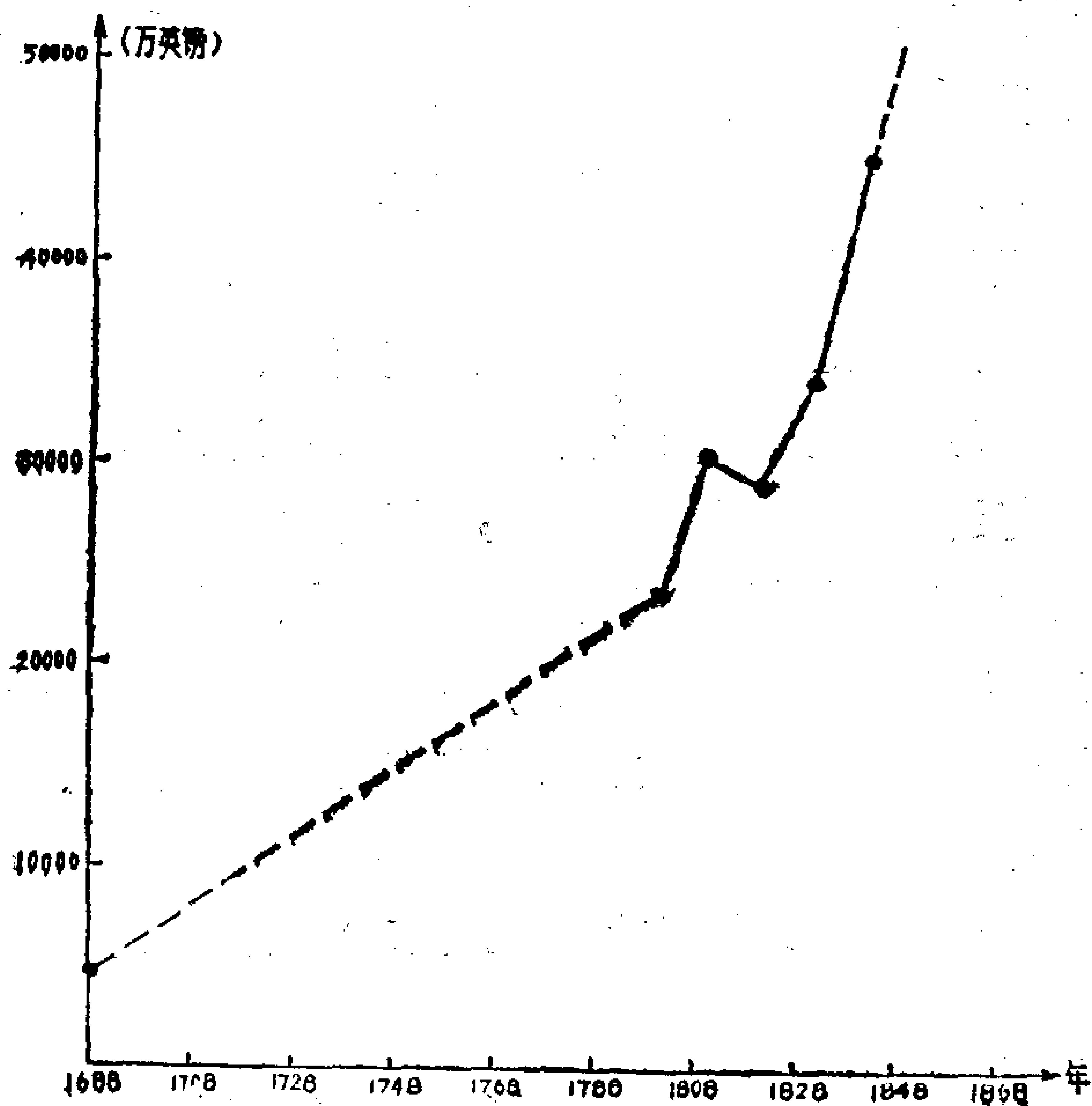


图1·1　1688—1868年英国经济增长曲线

间也象在地理上有高低程度不同的话，那么我相信时间上最高度将是1640—1660年之间的一段时间。”①他的话并不过分，正是在这一段时间里，全世界第一次出现了一个比较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产业革命只不过是这种结构的展开罢了。

这样一来，英国为什么最早发生工业革命的问题就变成了另一个问题，这就是：英国为什么最早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资产阶级政府。历史表明：当英国开始资产阶级革命时，法国还处于封建绝对君主专制的鼎盛时期，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比英国晚一个世纪，而且深受英国的影响。德国则经历了十分曲折的道路，它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又比法国晚半个世纪，看来，工业化的历程与资产阶级政治体制的确立是密不可分的。

从政治结构的变迁来看，英国之所以能够最早建立资产阶级政府是与其早有资本主义国家政体的雏型——议会制度有关。英国议会制度萌发于十三世纪的《自由大宪章》时代，以后不断壮大，对确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政体产生了影响。但是，这种分析是很表面的。议会的出现是欧洲中世纪城市不

① T. Hobbes: «Behemoth or the long parliament» ed. by C.F. Tonnies. 1969.P.1.

断发展的结果，从城市的兴起来说，意大利最早，德国也绝不比英国逊色，为什么意大利和德国没有出现比较完善的议会制度呢？

西方一些著名学者在研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原因时，特别强调了英国宗教改革、清教徒运动的重要作用。然而，宗教改革是在人文主义思潮的冲击下兴起的。从宗教改革运动的规模来看，英国没有德国大，文艺复兴的发源地则是意大利。如果宗教改革和人文主义思潮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决定因素，那么为什么德国、意大利没有最先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呢？于是，研究者不得不进一步分析宗教改革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

人们从而发现，导致社会变革的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原因是互相联系、互相渗透，在许多场合互为因果的。英国清教运动可以看作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引起了宗教改革的愿望，它是经济和政治变革的结果。但同时又可以把它看作是加速资本主义因素发展的原因。在英国的宗教改革运动中，大量的教会土地被没收，以低廉的价格拍卖给商人，促使封建经济进一步瓦解。十分奇怪的是，这种相互联系的因果链在不同的国家是很不相同的。意大

利十四世纪时商品经济发达，曾最先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但那里的人文主义意识形态并没有保证资本主义因素继续发展下去。相反，十五到十六世纪，意大利的商品经济开始衰落，资本主义萌芽处于被扼杀的状态。十六世纪时意大利手工工场的数量减少到十四世纪的二分之一，产量缩减了六分之五。丝织业、印刷业、陶瓷业、采矿业都迅速衰落。1338—1527年间，曾经是文艺复兴发源地的佛罗伦萨，人口从9万下降到4万。①早在1289年，意大利就宣布废除农奴制，可是到十五世纪以后，农奴制又重新恢复了。

这一切表明，英国能够在十七世纪最早进入资本主义的原因非常复杂。其中既有经济原因，又有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乃至地理的因素。它们之间互相联系、互为因果，并不是仅仅把它们罗列起来就能解决问题的。这就迫使历史学家把变革过程做为整体来研究，任何一种政治、经济或文化的变革，一旦离开了整体，都是难以理解的。

然而，一旦进入整体研究，在我们面前马上展现出一张巨大的因果网络。它不仅包括社会的各个

① 参见郑如霖《略论佛罗伦萨资本主义发展的曲折道路》，载于《华南师院学报》1982年第1期。

方面，而且包括它的全部历史。要理解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原因，就要研究十七世纪英国政治、经济、文化的总貌。当时许多社会因素又是从更早的社会条件中成长起来的。要追溯英国议会出现的原因，就必须研究十三世纪英国的状况，而这又与十一世纪西欧的政治、经济相联系。它与诺曼底公爵入主英格兰，全面推行封建制有关。如此继续下去，英国的封建制与西欧大陆的封建制有关，西欧大陆的封建制又与日耳曼人早期的社会制度及罗马帝国的灭亡有关。要探讨宗教改革和人文主义兴起及传播的原因，就要研究意大利中世纪的城市，考察基督教发展变化的历史。基督教又是在罗马帝国中成长起来的，我们又要研究罗马帝国衰落和灭亡的原因。一句话，为了解决英国为什么最先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问题，我们必须研究整个基督教文明的出现和演化。为了理解某一重大历史现象的原因，就要寻找原因的原因，结果就把全部历史都包括进去了。假如把历史割断，仅从某一时期开始，就很难获得对整个问题的透彻理解。

这张因果网如此巨大，它不仅包括一个文明、一个地区的演化史，而且还包括其它文明、其它地区的各种影响。对此，比较历史学派曾作过一个精

辟的说明：一些学者把佛罗伦萨最早出现铸币的原因归结为该城市商业的发达，但在意大利商业同样发达的另一些城市，铸币的出现却比佛罗伦萨晚一些。比较历史学家们发现，佛罗伦萨最早发行铸币是因为它存在很大的收支逆差，这个问题一下子涉及到当时各大文明间的世界贸易。要理解资本主义为什么首先在西欧确立，同样不能简单地从西方文明演变的历史来回答，而要把这种因果关系渗透到其它文明中去。因果关系要抽象为历史规律，必须具有普遍性。假如我们确立某几种因素必然导致一种历史现象，就应该能从几个文明的历史发展中得到相同的印证。因此，历史规律只有从比较中才能阐述。解释西方社会在某种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变化，必须把这种规律应用到东方，看它为什么没有具备这种条件，或者具备了同样条件是不是出现了同样的变化。这样一来，英国为什么最早建立资本主义社会，最先开始工业革命的问题就转化为由如下各方面组成的一个庞大的世界性问题：

1，既然在产业革命以前，几乎所有的文明都处于农业社会中，宏观地看，中世纪东西方各国生产水平相差并不悬殊，为什么西欧、中国、印度、拜占廷、伊斯兰、奥斯曼等封建国家的社会结

构是如此不同？既然人类文明都起源于原始部落制度，为什么会有形形色色的社会结构？

2．为什么只有西欧封建社会才是近代工业文明的发源地？拜占廷帝国同样属于基督教文明，它同西欧封建社会一样是由罗马帝国演变而来的，为什么它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那些历史更悠久、资源更丰富的国家又为什么一直在农业社会中步履维艰呢？

3．西欧的英、法、德三国在中世纪的社会结构大致相同，为什么英国最先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当时法国和德国在经济上并不比英国落后，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比英国晚一个多世纪？它们的发展道路为什么差别如此之大？

4．社会结构演变的动力是什么？为什么罗马共和国会演变为罗马帝国？罗马帝国为什么会灭亡？为什么罗马帝国灭亡后东西部出现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拜占廷帝国的社会结构为什么不同于西欧封建社会结构？

这些重大历史问题的回答，涉及史学方法论问题。要回答它们，需要一种历史哲学。只有对人类社会普遍的规律有所认识，才能对一个个具体问题提供统一的说明。这就需要一个理解人类演化进

程的研究纲领。历史的问题尤如海上的冰山，直接提出的问题不过是它的裸露部分，而主体则隐藏在水的下面。要把握它的整体，只有消融整个冰山。

然而，这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庞然大物，西方很多史学家在它面前止步了。有的看到了历史进程的复杂性，断然否定历史规律的存在。他们认为，研究近代工业文明为什么最早在英国产生的问题毫无意义，因为历史并无规律。美国的商业史学家阿伦·尼文斯认为：历史过程不过是偶然事件的连续堆积。“不测的疾病，气候的改变，一封文件的丧失，一个男人或女人突然间产生的一个狂念——这一切都曾改变历史的面貌。”①这种观点自十九世纪后半叶至今，始终在西方史学界十分盛行。既然历史本身是无规律可循的，那么历史就只能是一部精神史，或者是一部偶然事件和人的个性发展的记录。所以，一些西方史学家认为历史思维无非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自传，第二种是传记，第三种是历史编纂学。②个别史学家走得更远，连历史事实的客观实在性都一古脑儿否定了。他们认

① 田汝康、金重远《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7页、280页。

② 参见田汝康、金重远《现代西方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为，历史从来是历史学家头脑中的历史。当代历史哲学批判派倡导人雷蒙·阿隆说："人只是意识到有一个过去，才会真实的有一个过去。历史是由活着的人为着活着的人而重建的死者的生活。所以，它是由能思考的、痛苦的、有活动能力的人找到探索过去的现实利益而产生出来的。"①另一些西方史学家虽然承认历史发展可能有规律，但它太复杂，人类不可能认识它，他们曾望洋兴叹，悲观地说道："总体历史的起源，也同宇宙起源一样沉浸在史前的黑暗中，即使有什么总体的规律，那么它们还远远没有被发现……。"②

在迷惘与动荡的时代潮流中，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坚信，只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应用现代科学提供的先进方法，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历史唯物主义承认历史规律的存在，并提供了一个从整体上把握历史发展的基本原理。我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最精采、最核心的思想是：一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要相互适应。三者处于比较适应的状态时，社会就稳定、繁荣。反之，它们处于不适应的状态时，社会就发生动荡。这种适

①② 参见田汝康、金重远《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应性是在相互作用的关系中形成的，并不是经济结构单方面决定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结构不是被动地适应经济结构的变化。在这里，适应能力表现为彼此互为因果，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同样，三者的不适应状态也不单单是由于经济结构的变化造成的。当社会结构内部关系不协调时，社会结构演化的时代就到来了。由于不同社会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内容不同，组织方式不同，以及彼此间适应方式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社会结构和文明社会，导致了不同的演化过程。我们认为，只要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展开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基本原理，就可以对前面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作出回答。本书就准备作这方面的尝试。

在本书第二章中，我们将首先引用系统论和组织理论来展开历史唯物主义的“适应性”原理，探讨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互相适应性的含义；指出所谓社会结构的适应性实际上是三个子系统组成一种相互调节的功能耦合网络；调节方式不同，适应方式就不同。从而在理论上证明：在大致相当的生产水平上，可以建立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并通过对罗马帝国结构、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印度封建社会结构的具体分析来证明这

一点。

一旦用现代科学的方法给“适应性”以严格的定义，引进了对社会结构的分析方法后，就可以对社会结构演化规律进行研究了。我们在第二章中还分析了从罗马共和国到罗马帝国的演化过程，指出从整体上把握社会结构演变的可能性。

社会结构只有在内部的适应性被破坏时，才会出现演化。在第三章中，我们研究了社会结构适应性被破坏的原因。根据组织理论的一般原理可以证明：社会结构中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三个子系统相互调节的功能迟早要被破坏，它可以回答罗马帝国灭亡之谜。我们发现，尽管各个时期、各个国家社会结构瓦解的原因和方式不同，却共同遵循着惊人一致的机制。这就是：功能异化会造成社会结构的畸变，而且社会结构最终将不能容纳不断发展的社会生活。

我们在第四章中研究了社会结构取代的三个阶段。分析了罗马帝国灭亡后西欧封建社会建立的过程，说明封建化为什么仅仅限于墨洛温王朝的版图，并指出，为什么东罗马帝国的演变会走另一条不同的道路。我们认为原则上可以用社会结构演化的原理解释各种社会结构的发展变化。

第五章则是应用前面几章所阐述的分析方法解决本书的中心任务，回答为什么在西欧、在英国最先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并具体分析了结构取代所需要的条件，指出英国、法国、德国为什么在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出现时间与道路的明显差别，从方法论上给出有关社会结构演化的理论问题的统一解答。

本书力图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现代科学的整体分析方法结合起来，坚信这一结合会给历史研究带来硕果。因为，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① 毫无疑义，二十世纪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所带来的新的整体的研究方法，必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研究纲领，它的内容和方法一定要随着科学的新发现而改变自己的形式。

本书与《在历史表象的背后》一书互为姐妹篇。不同的是，前者以分析中国封建社会为主，这里则是采用同样的方法研究西欧社会结构的演化道路。本书只是一个纲要。本书在某种程度上是和很多同志合作研究的成果。刘青峰同志参加了观点的讨论

①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第443页。

和定稿，王军衔同志为全书核对资料，并提供了宝贵的意见。由于我们的理论水平和世界史知识有限，难免会出现各式各样的错误。我们恳切地希望听到史学界前辈和学术界严肃的批评，指出本书的缺点和错误。



第二章

从古罗马看社会组织的秘密

在一个民族的一生中，除了做梦，它很少有时间问自己：我想在哪一种社会里生活呢？我觉得，我们是接近这种时刻了。我们可以着手建设一个新社会，一个繁荣、朝气蓬勃、慷慨和解放的社会。

——沙　邦

2-1 罗马帝国奇特的商品经济

公元二世纪，世界的东方和西方分别屹立着两个庞大的帝国，一个是汉王朝时代的中华帝国，另一个是地中海沿岸的罗马帝国。当时，罗马皇帝图拉真（公元98年—117年）完成了帝国史上最后一次远征，使帝国的疆土几乎同今天的美国一样辽阔，人口达到一亿以上。这时，中国的汉朝也正值鼎盛

时期，人口超过五千万。但是这两个庞大的帝国无论在社会形态、社会结构和组织方式上都是如此的不同，以致于历史学家在剖析古代社会时，常常把它们作为两个不同的范例来运用。现在，我们也从这两个不同的范例出发，来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思想——社会结构适应原理。根据这个原理，我们可以推导出社会结构演化的主要规律，为解决西欧为什么最先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难题提供一个出发点。

罗马帝国在历史上留下了数不清的秘密，其中最使历史学家感兴趣的是它那极其特殊的经济结构。众所周知，在古代农业社会中，人类各个文明的经济结构大多是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而罗马这个奴隶制大国却是一种典型的非自给自足的奴隶制商品经济。一些人把罗马帝国仅仅看作是只知穷兵黩武的国家，仿佛它的存在就是征战、掠夺和奴役战败国家的人民。其实，自从公元二世纪“罗马和平”降临时起，罗马就以工程技术和商品经济大国的形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了。

首先，罗马城市之多、之大，是世界古代文明中罕见的。只要翻开古代地图，就可以看到整个帝国的版图上数以千计的城市星罗棋布。仅就西班牙

一省来说，重要的城市就有400座，次要的城市也有293座。①一般说来，当时的中小城市都有几万人口，大城市人口可达几十万或近百万。地中海几乎是帝国的一个内陆湖泊，沿地中海各行省形成了相当专业化的社会分工，稠密的海陆商业贸易网维系着帝国的经济生活。有人统计，作为罗马中心地区的意大利几乎所有的产品都不是在产地消费的。②

就拿经济生活中最主要的粮食来说，当时罗马本土的粮食消费主要靠外部地区供应。罗马城居民一年的口粮中竟有四个月的粮食来自埃及。据记载，埃及每年都要供给罗马本土四千万加伦麦子。③有些人认为，大量的物资从行省流向本土反映了罗马帝国的殖民掠夺性。然而在古罗马帝国鼎盛之际，这种掠夺并不是仅仅依靠武力来实现的。罗马帝国对行省的剥削主要是靠各种税收，其主要形式是交纳货币。而物资流动则大多是由市场商品经济及自由贸易机制维系。甚至帝国政府控制最紧的粮食，也通过和私人公司签定合同的方式来

① 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3页。

② 同上书第6页。

③ 同上书第2页。

管理。对商人来说，贩运粮食是一项有利可图的事业。四世纪时，一条从亚历山大开往罗马的运粮船可以获得4%的利润。一条从非洲开往罗马的运粮船则可获得1%的利润。“爱色斯”号是经常穿梭往返于埃及与罗马之间的运粮船，它一次可以载货1575吨，平均价值达15000美元。①

罗马帝国商品经济的发达和地区经济非自给自足的特点，是历史学家们历来公认的事实，也是使历史学家们长期困惑不解的问题之一。一般说来，在古代，商品经济仅仅限于城市或城郊，为什么在罗马帝国出现了如此奇特的经济结构，成为历史上少有的例外呢？

我们知道，在古代社会里，商品经济的增长往往有一个极限。我们且不谈政治上、文化上会出现的限制商品经济发展的因素，仅就经济发展本身而言，就存在几个无法克服的天然屏障。首先是交通和通讯工具的缺乏。打破自给自足的状态需要使交换成为一种连续不断的大规模的日常活动，其贸易量必须大到足以支持其居民基本生活资料需求的程度。这么多的粮食、货物运输要有相当发达的交通

① 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页。

和通讯作为基础。然而对古代社会来说，做到这一点往往十分困难。因为仅仅依靠经济本身的力量并不能把人们组织起来去修筑商品经济所必需的诸如四通八达的公路等大规模的公共工程。所以，在古代，商品经济发达的城市往往仅限于沿海港口或大河流域。在这些地方，大自然为它们提供了水路运输条件。而要把商品经济发展到广大内陆地区，就要建立纵横交错的商业交通网。这依靠古代商品经济本身的力量是很难做到的。

第二个障碍是交换媒介的不足。要维系巨大的交易量，就要有大批的贵金属源源不断地投入市场，去充当通货。否则流通就不畅达。在古代社会，依靠经济自身的力量同样不能大规模地组织采掘贵金属，铸造货币。只有通过超经济的力量干预，才能把大量的交换媒介提供给社会，以打破自给自足的生产状态。

第三个障碍是缺乏契约和商业法的保证。商品经济必须建立在稳定的社会秩序上；交换的双方必须遵守契约，即社会经济团体所确立的某种共同规范；一旦发生争执，要有权威性的制裁机关来处理。这同样不能依靠古代商品经济自身来保证。它需要强有力的政府存在，以及相应的文化背景。在

古代，任何一个分散的乡村社会都很难同时克服这三大障碍。因此，商品经济的发展往往有一个限度，在这些困难面前，要么放慢速度，要么停滞下来。

这些障碍在罗马帝国同样存在。考察罗马帝国克服这三大障碍所采用的手段，可以使我们解开罗马帝国商品经济发达的秘密，从而为分析罗马帝国社会结构中各个子系统的相互作用打开一个突破口。

众所周知，地中海交通在罗马商品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公元八世纪伊斯兰国家封锁地中海以前，它一直是欧洲最重要的商业运输通道。然而，假如罗马帝国仅仅依靠地中海这一天然交通要道，充其量在地中海沿岸发展起商品经济。就象古希腊城邦的繁荣那样。商品经济仍不可能深入到纵深地区，建立一个贸易普遍发达的经济大国。历史学家们发现，罗马帝国商品经济的普遍繁荣，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它的陆路交通发达，归功于帝国版图上巨大的公路网和河流航运系统。这个系统之巨大，是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的。据统计，罗马帝国在高卢一省的公路就长达13000哩①，即使在偏

① 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10卷，第44页。

远地区的不列颠，也有长达5000哩的公路。①就拿萨丁尼亚一个小岛来说，居然也修了1000哩的公路。②无数的商队昼夜不停地跋涉在大大小小的公路上，维系着整个帝国商业的繁荣和经济运转。即使在今天的技术条件下，要修建和维护这些公路系统，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可以想见，罗马帝国修建和维护这些公路,克服了多么巨大的困难。

值得注意的是，罗马帝国修建这些公路，并不是为了商品经济的目的，而是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公路首先是为了军事目的而修建的。它经由罗马军团年复一年的修筑和维护。我们知道，罗马帝国的本土意大利只有800万左右的人口，而要统治一亿以上的臣民。③管理那么大的地区，镇压随时都可能出现的奴隶起义和蛮族入侵，就要求罗马军团有很高的机动性。例如，罗马帝国在北非只驻有一个兵团的卫戍部队，却要保证整个北非的稳定和安全。由此可见抵御内陆掠夺部落的侵扰，不得不依靠四通八达的公路系统，使部队得以迅速调动，军

① 同上书，第52页。
② 同上书，第28页。
③ E.v.乌尔拉尼斯《世界各国人口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页。

事情报得以高速传递。如果罗马帝国没有高度发达的公路系统，使罗马的野战军团在短时间内到达它所要去的地方，仅仅依靠边防要塞和地方治安，整个罗马的政治统治几乎是无法维持的。然而，这个用于军事目的的公路系统，却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便利。使伽太基的经济与整个地中海地区及大西洋、撒哈拉沙漠地区联系起来，形成了商品经济必需的通道。

罗马的公路非常典型地反映了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彼此之间的依赖关系。本来，它是政治结构的产物，是维持政治统治的物化手段，却同时造就了与这种政治结构相对应的经济形态。我们知道，早在罗马共和国晚期，罗马的奴隶总数就达到了90万人，自由民只有71万人。① 由于分工及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帝国各地都布满了奴隶制大田庄，大量的奴隶被集中在一起，强迫在田间生产。而大多数田庄主人却住在城里，过着豪华的城市生活。他们从奴隶中挑选一些能干的人当管家，管理田庄上的事务。显然，高度集中的奴隶很容易团结起来，发动起义。因此罗马帝国必须有一支高度机动

① 《希腊罗马简史》，第153页。

的强大军团存在，这不仅是为了消灭海盗和边远地区的蛮族进犯，也是为了自身内陆的安全。所以，罗马帝国总是像保护眼珠一样保护自己的公路系统。历史上总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每逢罗马帝国征服一个地方，奴隶主就在这里建立起大田庄，罗马军队就开始修筑蜘蛛网般的公路系统。而后，这些公路又为商品交通提供了条件，使商品经济发展起来。按照这个典型的模式，这个地区就被编入了罗马帝国政治、经济统治的大网，牢固地置于帝国的统治之下。所以，我们可以说，公路系统是罗马帝国政治统治的基础，又为罗马帝国独特的经济结构提供了条件，

影响罗马帝国商品经济发展的另外两个障碍，也是帝国政府依靠行政手段来消除的。罗马帝国历来十分重视组织对金银矿的开采，始终把铸币的权力牢牢掌握在帝国政府及各级市政府手中。西班牙是罗马帝国最主要的金银产地，数以万计的奴隶和囚犯在一个个的矿山中夜以继日地开掘，他们甚至一连几天都见不到太阳。在矿井旁边，帝国建立起庞大的冶炼工业。①据说，帝国在新伽太基的一个

① 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10卷，第37页。

白银矿就雇佣了四万名矿工，每天出产价值25000便士的白银。①一些历史学家在谈及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时，非常重视帝国后期金银矿的枯竭。因为罗马帝国是一个高消费的奢侈国家，它要花费大量的金银货币向东方购买奢侈品和粮食。帝国政府必须用行政手段去帮助组织金银矿开采，否则商品经济无法维持。帝国后期色雷斯和西班牙金银矿产量迅速递减，又没有新矿投入生产，从而造成货币极度缺乏。商品经济患了不可救药的贫血症。当然，把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仅仅归结于此无疑是荒谬的，但从这一现象中可以看到，开采金银矿是维系整个帝国商品经济的重要手段。

著名的希腊传记作家普鲁塔什曾指出过罗马政府的重要职能。他说过，应当给予人民两项福祉：自由与和平。对商业发展来说，和平是一种社会秩序，而自由从来就是建立在契约之上的。罗马法中关于贸易和所有权部分的法律是极为详细的。它对近代西方法典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没有它，商品经济的广泛开展几乎是不可能的。普鲁塔什在世之日，正是罗马帝国的全盛之际，他游历了帝国后指

① 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3页。

出:"有关和平，因为所有的战争都已结束，现在可没有占领我们的需要了。有关自由，我们有了政府（罗马）所留给我们的。"①确实，罗马和平虽然是建立在民族征服的基础上，是以武力维持的和平，但却把不同的地区、不同语言的民族纳入了一个共同的经济市场。罗马的《万民法》实质上是一种商业社会的法律，尽管它在所有制问题上是奴隶制的，强调奴隶是奴隶主财产的一部分，但它在古代社会中缔造了一个人们可以共同遵守的法律秩序，甚至包括契约生效的办法。只有在罗马法规的保护下，古代超越民族的商品社会所需的契约观念才能在人们心目中建立起来，不同民族、不同地方间的商品贸易才可能迅速发展。正如汤普逊所说："帝国开始的几世纪，对有些地方来说，是它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这对叙利亚、高卢、非洲和埃及来说，尤为确当。埃及的人口有着显著的增加，'罗马和平'的利益，不仅在道德方面，而且也在物质方面；它在陆地上和海面上扑灭了抢劫和海盗行为，给生命和财产以保障，给旅行以便利。"②

① 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10卷，第27页。

② 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5页。

我们无意于把公元二世纪后的罗马帝国描绘为“太平盛世”，但从历史事实出发，去追溯罗马帝国之所以建立起非自给自足的商品经济结构，除了经济本身的力量外，发现了一些极为重要的条件，都是政治结构提供的。有些还同古希腊社会的心理、传统有关。如货物流通的生命线——公路系统，是因军事目的建立并由军队维护的；商品交换的媒介——大批量通货，是由帝国政府帮助组织开采并提供的；商品交换的原则和秩序——契约和法律，是基于古希腊文化、心理传统，由政府制定并颁布的；政府在经济纠纷中充当仲裁人的角色，如此等等。这些特殊的职能都源于经济生活之外，又与经济生活紧密相关。到公元五世纪的时候，罗马帝国崩溃了，它的军团衰落不堪，道路破坏无人问津，政府的职能丧失，没有人维持秩序，金银矿枯竭，社会通货奇缺，商品经济全面破坏，战乱纷起。罗马帝国就象患了老年性综合症，各个器官都衰竭了。此后数百年，西欧社会从商品经济回复到自然经济，恰恰从反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例证：商品经济发展并不是一个自然上升的连续过程，它需要社会的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提供一系列的条件。没有社会结构中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间

特殊的组合方式及调节机制，商品经济不可能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态。

2-2 城市生活和罗马帝国的政治与意识形态

在上节分析中我们指出，罗马帝国的奴隶制商品经济结构之所以能确立起来，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政治结构为它提供的条件。那么，人们会问，罗马帝国政治结构的确立又依赖于什么样的条件呢？罗马帝国政治结构的特殊性同样也是历史学家一直感兴趣的问题。如果不能阐明这个问题，经济结构的特殊性也还不能透彻地给予说明。

罗马帝国的政治大厦是依靠三根巨大的支柱支撑起来的。第一根支柱是它的军事制度。它的强大军团不仅维护着帝国的统一和安全，而且还常常决定罗马皇帝的人选。奥古斯都曾经大规模地削减军队和军费，但是保留下来的常备军仍达30多万人。①因此有人称罗马帝国是一部庞大的军事机器。第二

① 威廉·兰格《世界史编年手册》古代和中世纪部分上，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219页。

根支柱是罗马帝国的元首和政府。元首（后来是罗马皇帝）是最高统治者，掌握着立法、司法和执法大权，并有权任命各行省的总督，以此控制着帝国各个行省。他手下的顾问会议控制着财政部和司法部，秘书厅负责内务、外交和军政。第三根支柱是各个城市的自治制度。公元二世纪时，罗马帝国中央政府的官员不过150人，仅靠这么少的人无力承担管理庞大国家的任务，必须实行城市自治，并通过城市组织把税收和摊派等项事务担负起来。因此，意大利大多数自治区各有自己的元老院，城市有自己的议事会。它根据帝国统一的法律拟定各种具体政令。城市中还有一个人民大会，选举出执政官，负责处理各种行政事务。我们要理解罗马的政治大厦，就要分析这三根支柱得以确立的基础。

罗马军团的强大、机动性、组织性以及士兵的骁勇善战在历史上非常有名，这些军团是怎么组织起来的呢？从公元前二世纪末马利乌斯军事改革把民兵制变为募兵制以后，大批城市的无业游民加入了军队，后来成为帝国鼎盛时期的主要兵源。马利乌斯大幅度提高了士兵的军饷，又延长了服役的期限，此后，士兵的军饷一直有增无减。帝国建立以

后，职业军队合法化，变成正式的常备军。相当多的无业游民成了军队的骨干，这些人为了钱和土地来当兵。所以，要组织起庞大的军团，罗马皇帝就不得不把国库和财政来源的大部分用于军饷，并许诺士兵退伍后可以得到一块土地。由此，罗马的军事组织便直接和国家的货币收入联系在一起了。罗马军团的强大，依赖着国家资金的富有。西赛罗担任督察官后曾经说过，各省交纳的税款，仅够支付行政和国防的费用。①可见军费早已是国家财政支出中的大头。公元193年，一些平民和士兵因为没有得到奖金，勾结皇帝的侍卫队杀死了当时的皇帝。侍卫队的头脑曾宣称，谁出价最高，就赐给谁王位。朱立安那斯为了攫取王位，曾提出发给每个士兵5千希腊币（约合现在的3千元美金），而士兵们仍然嫌少。皇帝侍卫队的办事员到一个个百万富翁面前去鼓励他们抬高价格。当朱立安那斯宣布给每个士兵6250希腊币时，侍卫队就宣布他为皇帝。朱立安那斯的登基引起了罗马公民的不满，不列颠、叙利亚和班诺尼亚的罗马军团相继前来讨伐，各自拥戴军团长为罗马皇帝。班诺尼亚的军团

① 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10卷，第27页。

长塞佛留当众宣称，如果他登位，将给每个士兵12000希腊币。[1]正是这位塞佛留在把帝位传给儿子时，讲述了当皇帝的秘诀："尽量想法使你的士兵富有，除此而外，什么事都不用操心"。[2]这些事例非常形象的说明，罗马军团的存在必须依靠巨大的财力支持。当罗马皇帝拿不出金钱时，他就会失去士兵的拥戴，争夺皇位的战乱就可能发生，国家货币收入是军事的基础。而用金钱赎买雇佣兵却是罗马军事组织明显区别于其它奴隶制国家的特点。

第二个特点是罗马军人大多来自各个城市。罗马帝国规定奴隶不能服军役，隶农从法律上说可以当兵，但必须征得主人的同意。我们知道，隶农原先是自由民，只是因为债务而失去了自己的土地，不得不沦为大土地所有者的佃户，这部分人在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的农业生产者中占有不小的比例。根据帝国法律的规定，他们的全部财产都属于主人，没有自由迁移的权利。因此，隶农要征得主人的同意去入伍是非常困难的。这就决定了罗马军团的兵源只能主要来自城市的自由民，特别是无业游民，

① 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10卷，第276页。

② 同上书，第278页。

而不可能是乡村的农民。要理解这支主要来自城市的军团的素质，了解罗马军人的骁勇善战，就必须去剖析罗马的城市生活。另一方面，罗马军团的高度组织性和士兵的勇敢善战来自于罗马公民的城邦爱国主义精神和神人同形的宗教信仰，这种意识形态只可能从古代希腊城邦形成的文化中继承下来，并且在罗马的城市生活中得到维系和发展。同样，它也直接依赖于城市的繁荣。

我们以庞贝古城为例来剖析一下古罗马人的城市生活，就可以对这一点得到明晰的认识。庞贝古城因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的爆发而被掩没，十八世纪被重新发现，成为现今人们研究古罗马城市生活的完整标本，那些已经变成化石的古罗马人的死尸，烧焦硬化的坚果、面包和水果，墙壁上保留下来的各种布告以及私人藏书等等，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生动的古罗马城市生活的画面。庞贝城约有二万人口，市中心有一个人们聚会的公共会堂，它是交易中心，举办各种竞技和表演。人们还建立了许多庙宇来祭祀众神。城中心的一边是朱匹特天神，另一边是阿波罗太阳神。还有庞贝的守护神——爱神维纳斯。庞贝城中一共有三个公共浴堂，一座体育馆，一座可容纳2500人的小型剧场和一座可容纳

5000人的大型剧场，还有一座可容纳20000人欣赏角斗的圆形技场。城市街头的广告竟达三千份之多。其中大多数是商业广告和公共事务布告，也有情书、春宫画和寻失启示。① 如果把罗马城市和今天的城市作一比较，有一点非常奇怪，这就是，一座人口仅有二万人的城市居然有如此众多的公共设施，这在今天是不可思议的。实际上，古罗马社会中的剧场、竞技场和会场所起的作用远比近代社会的电影院和体育馆重要。因为自由民的城邦爱国主义精神就是从这些公共社会活动中产生的。在这些公共设施中，他们选举自己的执政官，进行各种政治纲领的辩论，从政府公布的公报中知道全国各地的新闻。城市的公共生活铸造了罗马精神，形成了自由民生活的精神支柱。据说，世界上最早的“报纸”就是罗马人创造的。公元前59年，罗马政府曾经设立了一个机构，定期公布罗马元老院和公民大会的决议及全国各地的新闻。这些东西都写在一块巨大的白板上，挂在街上供人们阅读。在纸和印刷术还没有发明的时候，只有在这种集中居住的城市生活中，人们通过聚会等各种方式获得社会信息，

① 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10卷，第16—20页。

才能形成集体意志，使其成为支配社会生活的精神力量。应当指出，庞贝城在古罗马数以千计的城市中只是一座默默无闻的小城市，它仅以虾露、白菜和葬礼略有名气，除此之外的一切，很少被人知晓。而整个古代罗马帝国，正是基于数以千计的类似庞贝这样的城市的繁荣，才能建立起庞大的军事基础。

以上的分析表明：无论是罗马军团的组织形式，还是军人尚武精神的维系，都直接取决于以商品经济为背景的城市生活的繁荣。没有奴隶制商品经济，就不会有大量繁荣的城市，也不会有国家大宗的税收。自由民不在城市里吃商品粮，就不会维系城邦的存在和产生与之相应的爱国主义精神，国家也不会创造出具有高度组织性、机动性的罗马军团。

实际上，罗马帝国政治大厦的另外两根支柱也是建立在奴隶制商品经济上的。罗马帝国的官员有两个来源，一是贵族奴隶主，一是“骑士阶层”。罗马帝国的骑士阶层实际上是日益壮大的商业奴隶主阶层。汤因比曾经指出，这个阶层办事效率高，能力强，在帝国时期几乎完全取代了贵族阶层，成为帝国官僚的中坚力量。他们管理城市、调查户口、地产，征收各种税，整个帝国的行政机器实际

上是由他们运转的。罗马帝国的官制和东方有很大的区别。官吏中有很大一部分实行无俸服务。他们之所以无俸，因为他们是有产阶级。据史书记载，官员不但没有薪金，而且当选后还要付“就职费”，从3000到35000塞斯泰尔乌提斯不等，有的竟高达60万。①虽然就职金很高，但在帝国兴盛时期，有钱有势的公民争先恐后地竞争市政官位，因为这对他们是一种巨大的荣誉。他们通常用自己的财产，支付行政官位所需的各种开支。如果他们管理的城市所征收的税额不足，有时，还要掏自己的腰包来补充，即使如此，元老和行政官的职位对商业奴隶主仍然有着强大的吸引力。

实际上，骑士阶层不仅是官僚机构中的主要成员，而且是城市各项公共设施的主要投资者，是自由民各种社会活动所需经费的提供者。罗马各大城市的图书馆、竞技场等公共设施大多都不是国家投资，而是私人捐款建立的。据说，有些富豪为了追求名誉，投资之多到了不顾自己破产的地步。许多古罗马建筑的碑文为此提供了可靠的证明。一位百万富翁为威尼弟亚省兴建浴堂捐赠了160万银币。一

① 王刚《奥古斯都行省政策初探》，载于唐山市教师进修学院学刊，1983年第2期。

位富裕的老太婆为建立庙宇和竞技场捐出了全部财产。在人口稠密的奥斯地亚港，卢西里体面地宴请全城居民，铺了一条又宽又长的大道，修复了七幢庙宇，重建了浴堂，并捐给市库300万银币①。在奥古斯都时代，有一个阿提那城的富人送给本城公民的财产，达12000塞斯脱。一个马赛城的公民，把他的全部财产都送给了城市。著名的小普尼林发财后，陆续献给本城60万塞斯脱，相当于今天75,000多美元，其中六分之五的款子，作为穷人的粮食基金，其余作为建造图书馆的经费②。这样的例子，在帝国兴盛时期是举不胜举的。这种风气是古罗马城市得以繁荣的重要机制。

可以说，整个罗马帝国城市市政的基础是商品经济。只有存在着实力雄厚的奴隶主商人阶级，城市管理、市政建设、城市生活才能正常运转。所以，当罗马帝国的奴隶制商品经济趋于瓦解时，城市公共设施得不到修缮，市民活动的费用缺乏来源，甚至帝国的官员也没有人能够充当，各种职位不得不由国家强迫分担下去，帝国的政治大厦就濒

① 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10卷，第22页。

② 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54页。

临崩溃了。

读者或许已经发现，我们对罗马帝国的分析陷入了奇特的因果循环：在我们寻找帝国非自给自足的商品经济结构何以建立之时，发现政治结构为它提供了最重要的条件，恰是军团修建的罗马大道，政府职能所保证的税收、统一货币、法典权威保证了商品经济的生存和发展。而在我们寻找罗马帝国政治结构建立的原因时，又发现商品经济结构为它提供了最重要的条件，无论是罗马军人的来源，自由民城邦爱国主义精神或神人同形宗教信仰，城市市政的管理建设，罗马帝国的官吏来源，都离不开以奴隶制商品经济为背景的城市生活。正象著名历史学家麦唐纳所说："城市生活是在罗马统治范围内一切地方社会组织上的主要特征。"①我们从追溯商品经济存在原因开始的研究，绕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

如果是寻求终极原因的决定论者，一定会为这个大圈子垂头丧气。但是，假如我们从这种机械分析方法中跳出来，思想就会豁然开朗。它表明，当我们对任何一项复杂的事物进行整体研究时，寻求

① 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69页。

终极原因往往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对社会这样的大系统的每个具体环节，我们都能区别原因和结果，但把这些原因结果无限追溯下去，就会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循环。正是因为存在这种循环，系统才表现出自我维持的能力。罗马帝国奴隶制商品经济结构，元首军事和地方自治的政治结构，城邦爱国主义精神和神人同形宗教信仰的意识形态结构，任何一方都不能离开其它两方的调节而独立存在。没有奴隶制商品经济，就不会有发达的罗马城市生活，因而就不会有罗马帝国政体和罗马军团，罗马精神也不可能存在。反之，假如没有罗马帝国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的存在，奴隶制商品经济就不可能在罗马帝国发展起来，它的繁荣依赖着交通、货币、商业法的保证。这些都要依靠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的调节才能发挥作用。(见图2·1)这种互为因果的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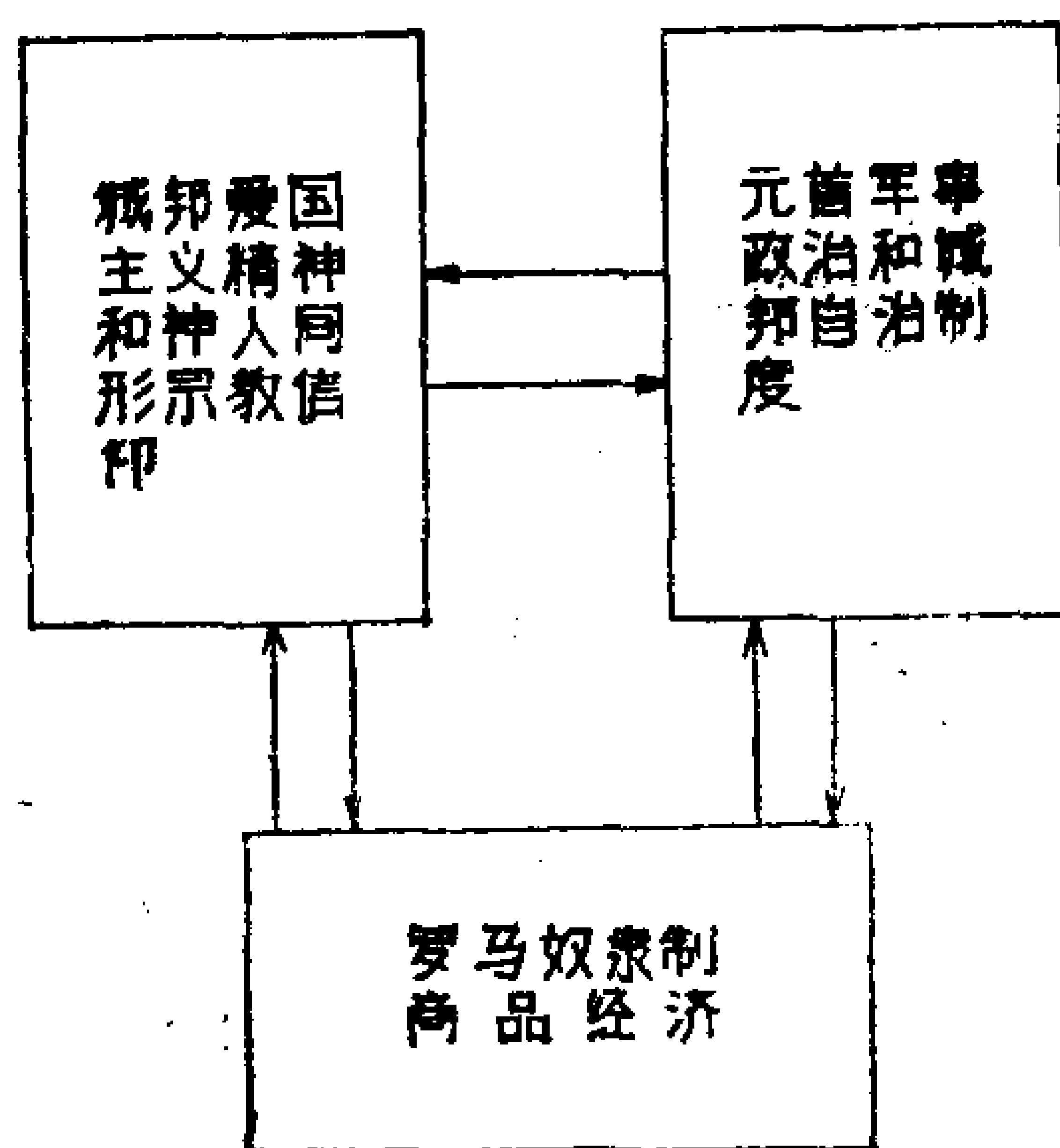


图2.1 罗马帝国的社会结构和因果循环

系清晰地表达出社会结构各个组织之间深刻的相互依赖性。

2-3 罗马、中国、印度
——不同的社会结构

如果我们把对罗马帝国社会结构的分析上升为理论，就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结论：经济结构虽然是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的基础，但是如果没有与经济结构相适应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对它进行调节，为它提供条件，单靠经济结构本身并不能保持稳定。这三个子系统是互为因果的，总体上构成一个封闭的循环圈。我们把它称为社会结构调节原理。

社会结构调节原理是否普遍成立呢？为此，我们必须研究那些同罗马帝国完全不同的文明，看它是否同样得到印证。我们先来看看中国封建社会。

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结构最大的特点是：自秦汉以后形成了官僚统治的大一统帝国。大一统官僚政治必须建立在地主经济结构之上。因为要维系庞大的行政系统，需要数万官僚和十几万吏员，必须有充足的税收来支持巨大的行政开支。在农业社会

中，税收的来源主要依靠自耕农。没有他们提供兵源和各种劳役、租税，统一政府是很难建立起来的，我们知道，只有地主经济的繁荣才可能存在大量自耕农和佃农，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较弱，国家的劳役和税收有着充分的保证。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恰恰是地主经济。表2.1是十三世纪时英国和北宋王朝农村土地结构的比较。①从中可见，即使到英国领主庄园衰落的前夜，自由农民和佃农在整个农业经济中的比例仍不高。而中国封建社会中，自耕农和佃农占压倒多数。一般说来，在一个王朝的中前期，它们大约占全国总户数的70%——80%。它们是大一统官僚政治得以确立的基础。而且，大一统官僚政治结构还必须依赖大城市的存在，这些城市是国家管理的中心，由它们组成巨大的统治网，把幅员辽阔的农业社会组织起来，它们像岛屿一样分布在农村的汪洋大海，使其周围的自耕农经济中，出现一定程度的分工和商品交换，以保证官员流动和国家管理工作的运行。只有地主经济才能包容这些郡县城市，如果是在高度自给自足的庄园土壤上，大一统政权和郡县城市

① 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2—83页。

十三世纪英国土地结构

	领主自用地	农奴份地	自由农民租佃地
大庄园	26%	51%	23%
中级庄园	35%	39%	26%
小庄园	41%	32%	27%

表2.1　北宋主户的构成

主户户等	阶级成份	占地情况	占全国总户数比例	备　注
一	大地主	3顷—100顷以上	10%	北宋的官户、形势户加上主户中的一、二等上户，总共不超过10%
二	中、小地主	1—3顷或不满1顷		
三				
四	自耕农	数十亩	50%	
五	半自耕农	占少量土地但不能自给		

便会迅速枯萎。

那么，地主经济结构是不是中国封建社会形成大一统政治结构的终极原因呢？否！地主经济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是无法维持稳定的。小农经济普遍存在农奴化倾向，表现为农民对地主依附关系增强。地主不仅力图霸占自耕农土地，还尽力把他们变为自己的“私属”，日久天长，自耕农有可能“农奴化”。查理曼帝国自耕农农奴化，日本大化

革新后班田制的破坏都是实例。中国封建社会保持地主经济的稳定有两个重要的前提。一是国家政府的调节作用。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总是制定各种法令，限制地主豪强把农民变成“私属”；并依靠强大的官僚机构推行这些法令政策，对地主经济的稳定性加以控制，从而把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权夺到国家手中。从秦代开始，封建政府就限制豪强贵族杀奴婢，行刑必须报官批准。汉代以后，政府取消了豪强贵族杀奴婢的权力，一律按国家法律处置，到了宋代，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已微乎其微，按宋律规定，农民有退佃的自由。恰恰是政府的巨大调节力量，使中国克服了西欧封建社会和其它一些封建国家中普遍出现的自耕农农奴化倾向，保持了地主经济的稳定。第二个条件看来似乎是纯经济的，即利用一定程度的土地买卖防止地主和农民之间出现“硬化”的人身依附关系。使地主对土地的占有权和对农民的占有权在一定程度上分离开。但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土地买卖这一现象本身也是和政治结构对经济结构的调节相联系的。首先，土地买卖依赖于相对发达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发达要依靠国家政治结构的作用，要以大量城市的存在为条件。如果国家不以超经济力量建立众多的郡

县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就会碰到障碍。而且，土地买卖时农民之所以能从土地转让中游离出来，也是以政治结构限制地主占有农民人身为前提的。因此，中国封建社会保持地主经济的稳定离不开大一统官僚政治的调节作用。

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结构对政治和经济的稳定也发挥着重大的调节作用，我们知道，封建社会的官僚政治有日趋演化为世袭贵族的倾向，他们和地方军事势力结合起来，就会造成封建割据。一旦如此，大一统官僚政治就必然解体。日本大化改革后的情况就是这样。中国封建社会控制这种解体趋势的办法是利用具有儒家信仰的知识分子充当国家官吏。这些人遵循统一的国家学说治国，自觉地执行国家法令和政策，与分裂割据势力斗争，维护国家的统一。他们自身处于王权的监督下，又不断地流动调换。图2.2是西汉王朝利用儒生官僚与贵族化倾向斗争的曲线图，它清晰地表明了依靠儒生的统一力量遏制贵族化分裂倾向，维护大一统帝国稳定的过程。①

中国历史上，当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丧失

① 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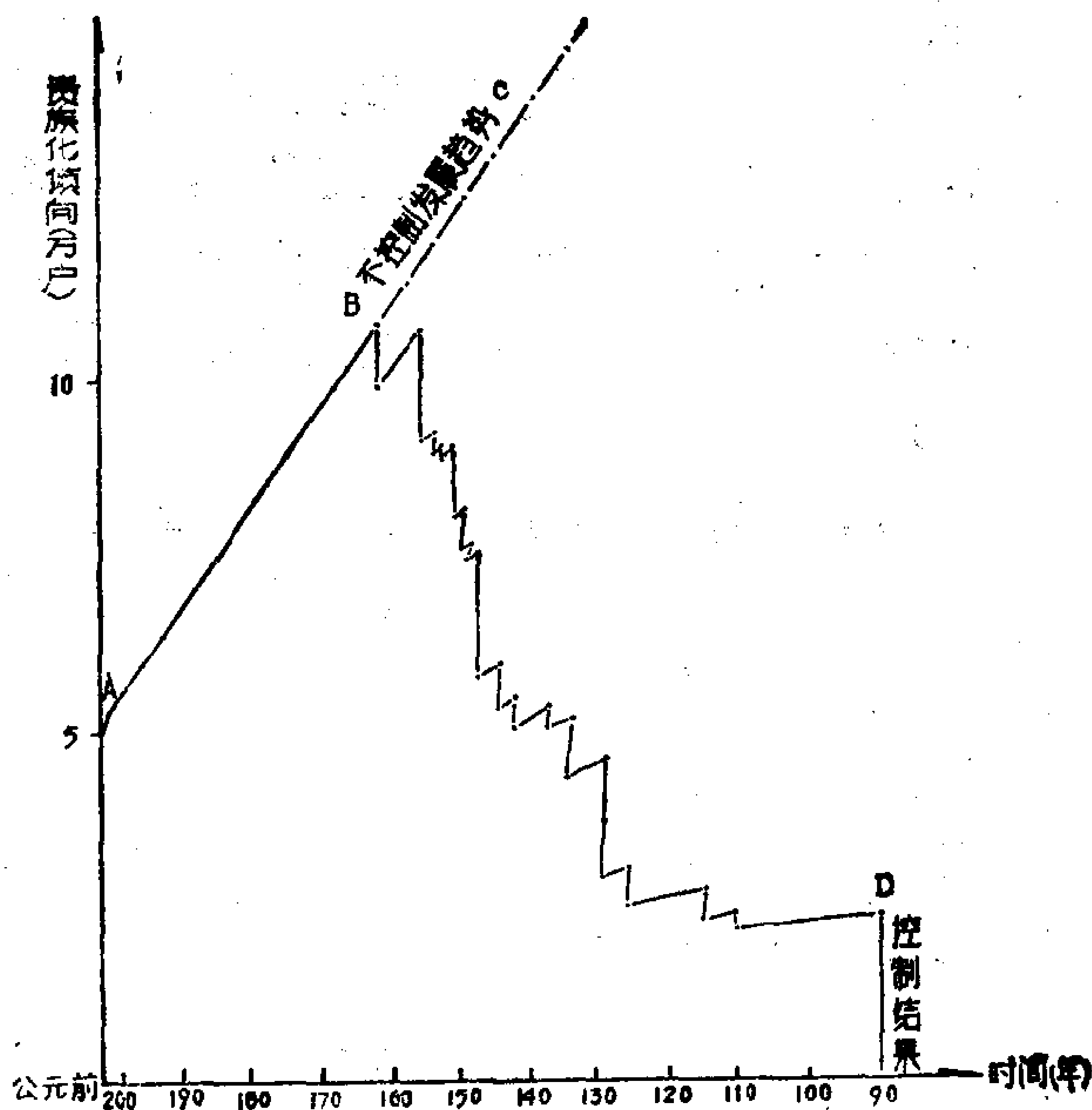


图2.2　西汉王朝儒生官僚与贵族化倾向斗争曲线图

调节能力时，地主经济不可能独立地保持稳定。魏晋南北朝庄园经济的兴起就是例证。东汉灭亡后，原有的意识形态结构中玄学泛滥，儒家思想受到佛教的冲击。政治上门阀贵族势力强大起来，外部恰逢少数民族侵扰，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的调节作用大大削弱了。经济结构受到东汉末年大动乱的破坏，出现了一系列的变化。首先是农民对贵族地主

的人身依附关系强化，沦于近乎农奴的地位，部曲、私属、奴婢的数量与日俱增。其次是国家税源骤减；世袭门阀在政治上占有主导地位。结果整个社会几百年处于分裂割据的状态，大一统政权长期建立不起来，经济结构蜕化到类似于庄园经济的状态。①

这里，我们又发现了一个和罗马帝国类似的因果循环。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子系统互为条件，尽管中国封建社会和罗马帝国的子系统内容及调节方式完全不同，但同样构成因果循环，通过循环保持稳定的特征如出一辙。三个子系统处于不断的相互调节中，共同维护了大系统的稳态，而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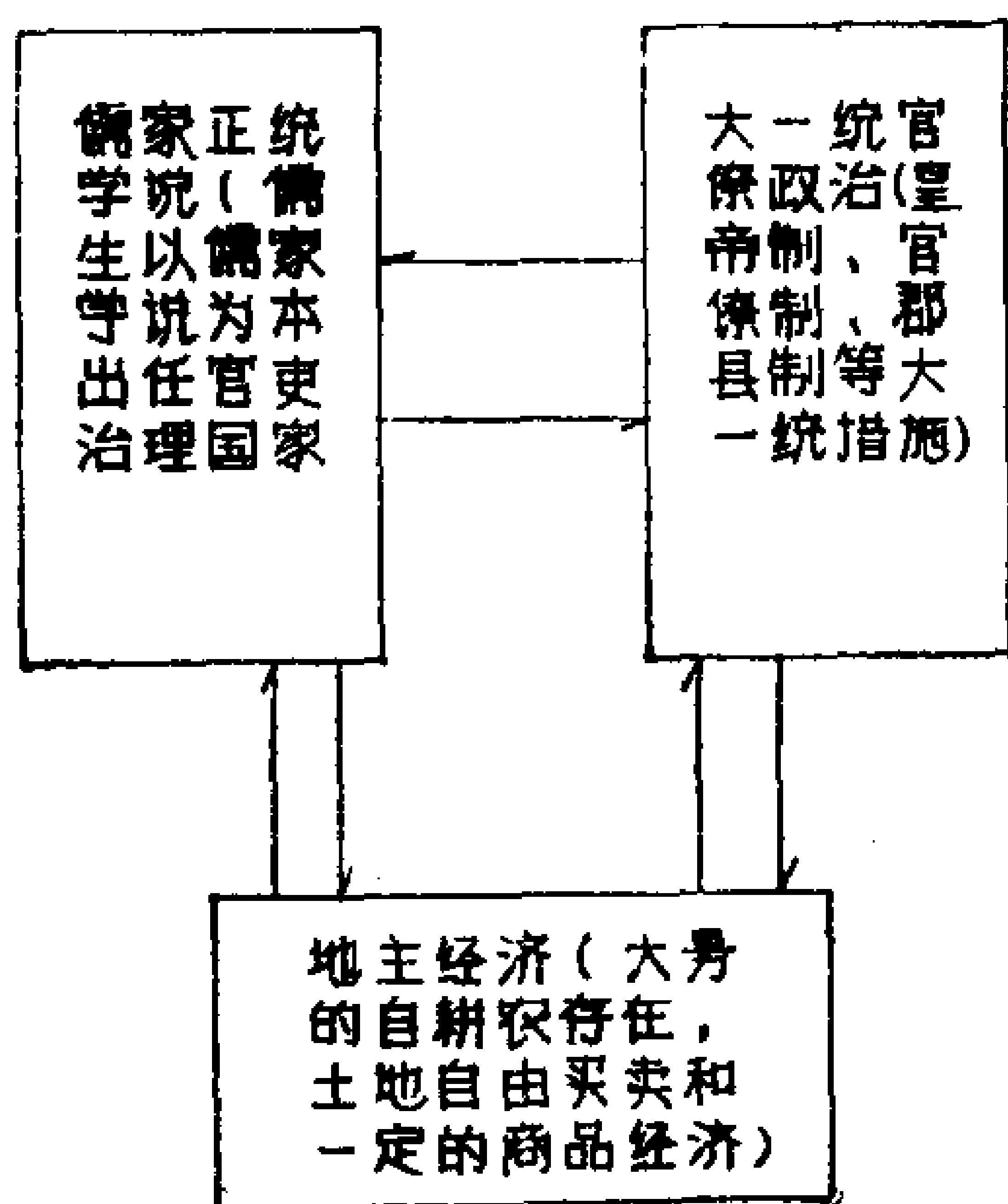


图2.3 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内部各子系统间的相互调节关系

① 有关这部分论述，读者可见《兴盛与危机》一书，该书进一步分析了魏晋南北朝时，旧的调节系统被削弱，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又重新构成一组调节关系，维持了几百年的亚稳态结构。

系统中的任何一个离开其它两个的调节都不能稳定地存在。（见图2.3）

我们再来看看印度中世纪的社会结构。从国家组织来看，印度不仅没有出现类似中国封建社会的大一统结构，它的国家组织反而比西欧更松散，更不稳定。在印度两千年的历史上，除了被其它民族征服，接受外部强加的政治结构外，自己几乎没有形成稳定的统一局面。正如著名的印度史学家恩·克·辛哈和阿·克班纳吉所说："政治统一并不是印度古代史和中世纪史上的正常特征。在各个时代中，这个广阔的次大陆分成许多小王国。"①史学界普遍认为，印度史上这种长期政治分裂的局面是以其村社为主的经济结构所造成的。印度村社和西欧的庄园比较具有更大的封闭性。尽管村社内部也有一定程度的商品交换，对外却几乎是"老死不相往来"，形成了自我封闭体系。国家的大小和势力都以统治村社的多少来衡量。因此国家组织十分脆弱。

那么，印度为什么能形成这种高度封闭的村社经济结构呢？表面上看，这似乎完全应归于经济上

① 《印度通史》，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4页。

的自给自足，其实不然。我们知道，中国封建社会中广大农村也是自给自足的，但其政治上并不封闭。它们要为大一统帝国提供税收、劳役、兵源，可以被大一统政治结构组织起来。印度村社的封闭性是政治结构调节的结果。众所周知，印度政治结构最明显的特点是种姓等级制度，每一个村社中都存在四个种姓。婆罗门是最高种姓，掌握着宗教事务。刹帝利是第二种姓，是武功阶层，婆罗门和刹帝利不参加劳动，却享有村社中大片土地的所有权。这两个种姓完全主宰了村社的宗教、政治统治，而且是村社各种公共事务的管理者，是宗教规范的解释者和执行者。他们担负着协调各种职业、分工之间关系的职能。吠舍是第三种姓，包括耕种自己土地的自由农民和工匠、手艺人，他们是村社居民中的大部分；首陀罗是第四种姓，他们的身份相当于奴隶，为各种高级种姓耕种土地。工匠和手艺人制造各种工具和消费品，维持每个村社经济的需要。显然，正是普遍的种姓制度造成了村社的封闭状态。每个村社中的管理者、生产者和职业都被种姓制度严格地规定了。一个村社内部的政治、经济、宗教活动原则上不需要和外部发生联系。这种政治上的自给自足给村社加上了一层难以突破的外

壳。种姓制度必然使王权衰落，官僚机构无法成长起来。要想形成统一的国家，就必须剥夺婆罗门、刹帝利这些“地头蛇”的权力。由此可见，统一国家和种姓制度是格格不入的。

同样，印度村社组织和种姓制度的稳定也离不开意识形态结构的调节作用。公元前一千年前就形成的婆罗门教和由它演变来的印度教是印度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婆罗门教宣扬，人的一切痛苦和幸福都是前定的，四种种姓分别来自于普鲁沙神的口、手、腿和脚，因而种姓划分是命中注定，不可改变的。每个人为了来世不遭受痛苦，就必须严格按照婆罗门教所规定的行为规范做事。印度教发展了这些思想，为不同等级之间禁止通婚、使种姓划分更为细化提供了宗教根据。它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村社组织的封闭性。印度经济、政治、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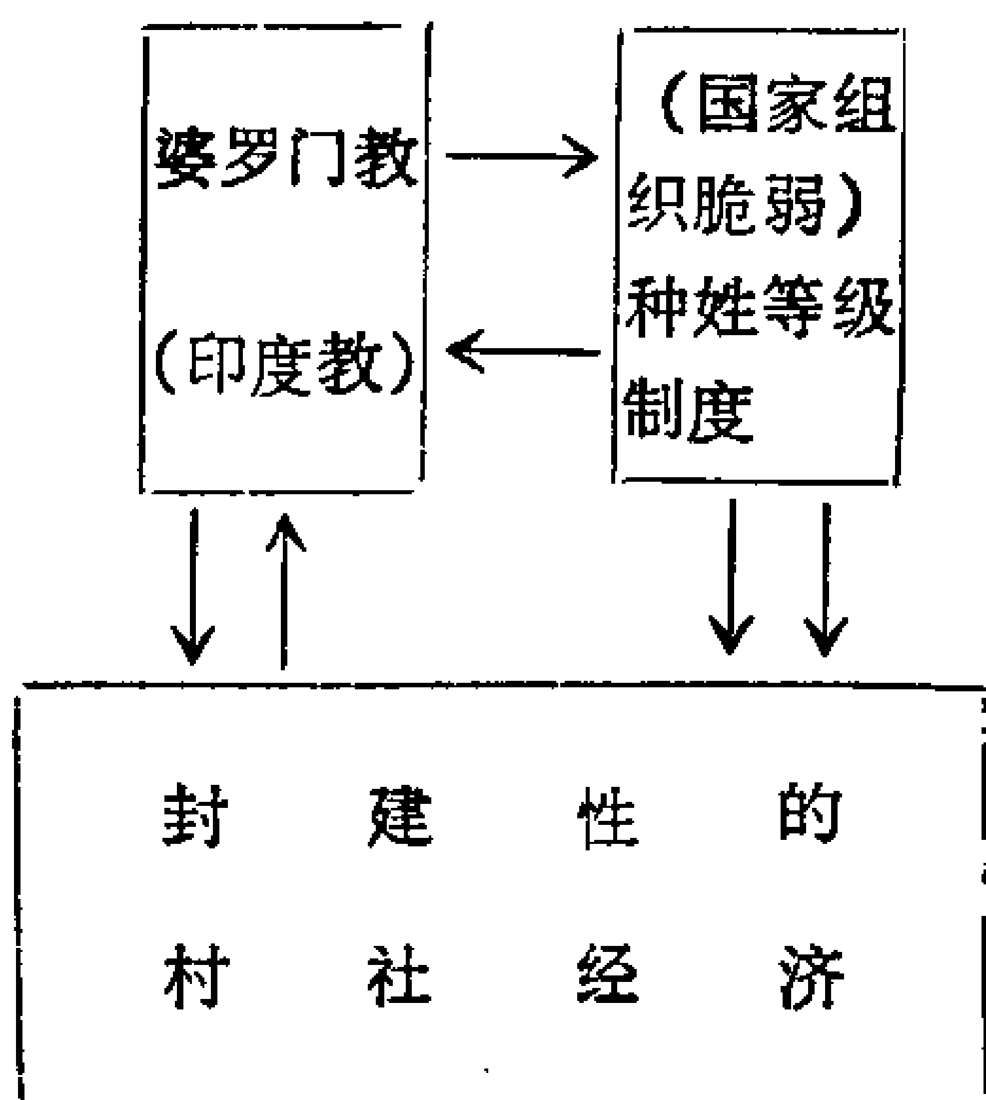


图2.4　古代印度社会结构

识形态三个子系统同样是互相调节、互相依赖的（图2.4）。

印度历史上也存在着富有说服力的例证，它说明经济结构的封闭性只有在种姓制度和婆罗门教的调节作用丧失时才能被打破。大一统的孔雀王朝就是一例。孔雀王朝时期，印度的政治结构一反常态，形成大一统的官僚结构。当时，出现了很多大城市，形成了全国性的公路网和驿站。官吏来源也取消了世袭制，由中央政府委派，甚至官员的录用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受出身和身份制的影响。当时，印度的经济结构同样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但为什么能建立大一统帝国呢？关键在于在孔雀王朝时期，婆罗门教衰落了，由佛教取而代之，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种姓制度也一度出现了松动。也就是说，造成村社政治上封闭性的种姓制度和宗教意识这两个调节器开始呈现出瓦解和松动状态。那么从逻辑上就自然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印度村社结构虽然在经济上仍是自给自足的，它也可能象中国封建社会自耕农那样，成为一个统一帝国的基础。尽管孔雀王朝的统一十分短暂，有如昙花一现，但它却证明印度村社结构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并不是封闭性的根源。封闭性是以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结构

的调节为条件的。孔雀王朝瓦解后，佛教衰落，印度教兴起，种姓制度又开始强化，并发展到新的形态。它们调节功能又得以恢复。这时印度的村社又重新变得高度封闭，整个社会又长期陷入缺乏统一组织的局面。在这里，我们看到，印度社会和中国相反，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衰落时，国家出现政治上的分裂；而在印度，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衰落则导致国家的统一。这种奇特的现象，社会结构调节原理给予了令人满意的说明。

社会结构的调节原理不仅可以在一个文明和整体分析中得到证明，即使对于文明中的小社会也是适用的。我们知道，雅典的经济结构是以对外贸易为主的奴隶制商品经济。雅典每年都要从黑海、西西里和埃及进口大量的粮食，从马其顿、色雷斯进口木材，从麦加拉、彼阿提亚进口蔬菜，从意大利半岛进口金属制品。有人认为，雅典之所以形成殖民主义式的、以对外贸易为主的商品经济，纯粹是由于地理上多山和土地瘠薄的原因。其实，雅典商品经济结构的稳定，主要靠其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调节。它的以外贸为主的商品经济结构确立起来是在希波战争结束以后，当时雅典在希腊世界中拥有了最强大的海军。海上霸权使它有能力把黑海和地

中海的贸易集中在自己手里，从而充分保证了内部经济结构转向工商业和对外贸易，使农民改种葡萄和橄榄等经济作物，不再考虑口粮问题。此外，军事力量强大还为雅典提供了大量奴隶，保证了各个工业部门有足够的劳动力，这也是工商业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雅典的海军只是雅典国家政治结构的一小部分，这种政治结构的活力来自它的自由民主政体。据统计，当时雅典的 42000 名男性公民中，每年参加政治和经济工作的达 20000 人之多。① 自从梭伦变法禁止雅典人变成奴隶起，赋予平民的政治权力越来越多，军队从自由民中吸收的人数一天天增加。特别是伯里克利改革以后，所有参加政治、军事活动的人都有了薪俸，生产劳动是奴隶的事。雅典人从直接的生产劳动中摆脱出来，专门履行政治权力或从事海外移民。因此，尽管雅典城邦不大，人口也不算多，却可以组织起一支庞大的海军。如果自由民不从生产中摆脱出来，无论如何做不到这一点。同时，雅典人的神人同形宗教信仰对维护自由民的民主政治又是必不可少的。自由民经常要组织体育竞技、诗歌音乐会

① 《希腊罗马简史》，第74页。

及演说活动，推动公民文化和体育素养的提高，促使平等、自由和荣誉的增长，维系雅典公民城邦主义的观念。然而，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又都依赖于奴隶制对外贸易经济的繁荣。显然，雅典社会结构又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奇特的因果循环，（见图2.5）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在相互调节、互为条件中保持整个社会的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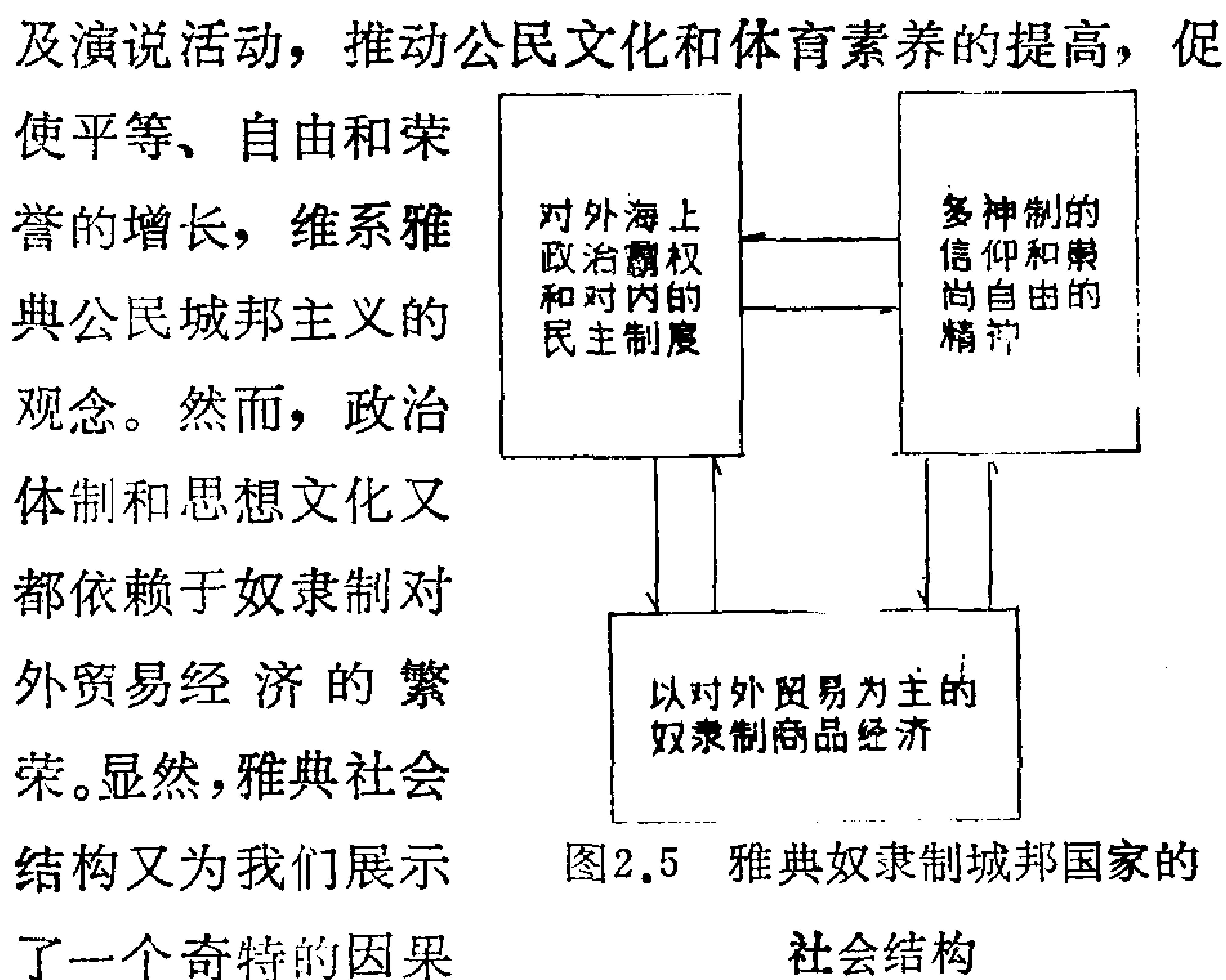


图2.5　雅典奴隶制城邦国家的社会结构

我们还可以举出其它许多例子。但是一个个具体实例的分析并不等于证明。要证明社会结构调节原理的普遍有效性，我们必须研究它的理论基础。

2-4 社会组织的结构—功能分析

现代科学对自然界各种组织进行研究后，得到一个普遍适用的结论：只有组成整体的各个部分形

成一种互为因果、互相调节的耦合系统时，才能构成整体性的组织。也就是说，对任何一个有调节能力的组织进行解剖，因果循环都必然出现。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先从生态组织谈起。

有人曾把整个生态系统想象成如图2.6所示的那样一个具有单向因果关系的系统。土壤是绿色植物存在的基础，绿色植物又是食草动物生存的基础……。毫无疑问，没有绿色植物，就不能供养食草动物。但是如果整个生态系统的因果关系是这样简单，那么，整个生态结构早就崩溃了。因为自然界大多数系统的每一个组成部分，本身都处于经常流动之中，有着内在的变化趋势。土壤时时刻刻为流水所冲刷，存在着水土流失的可能。绿色植物的生长也可能出现各种不同结果，如在某种条件下，池塘中的水草繁殖过快，可能使水中因氧气缺乏而导致生物死亡。如果整个生态系统仅仅是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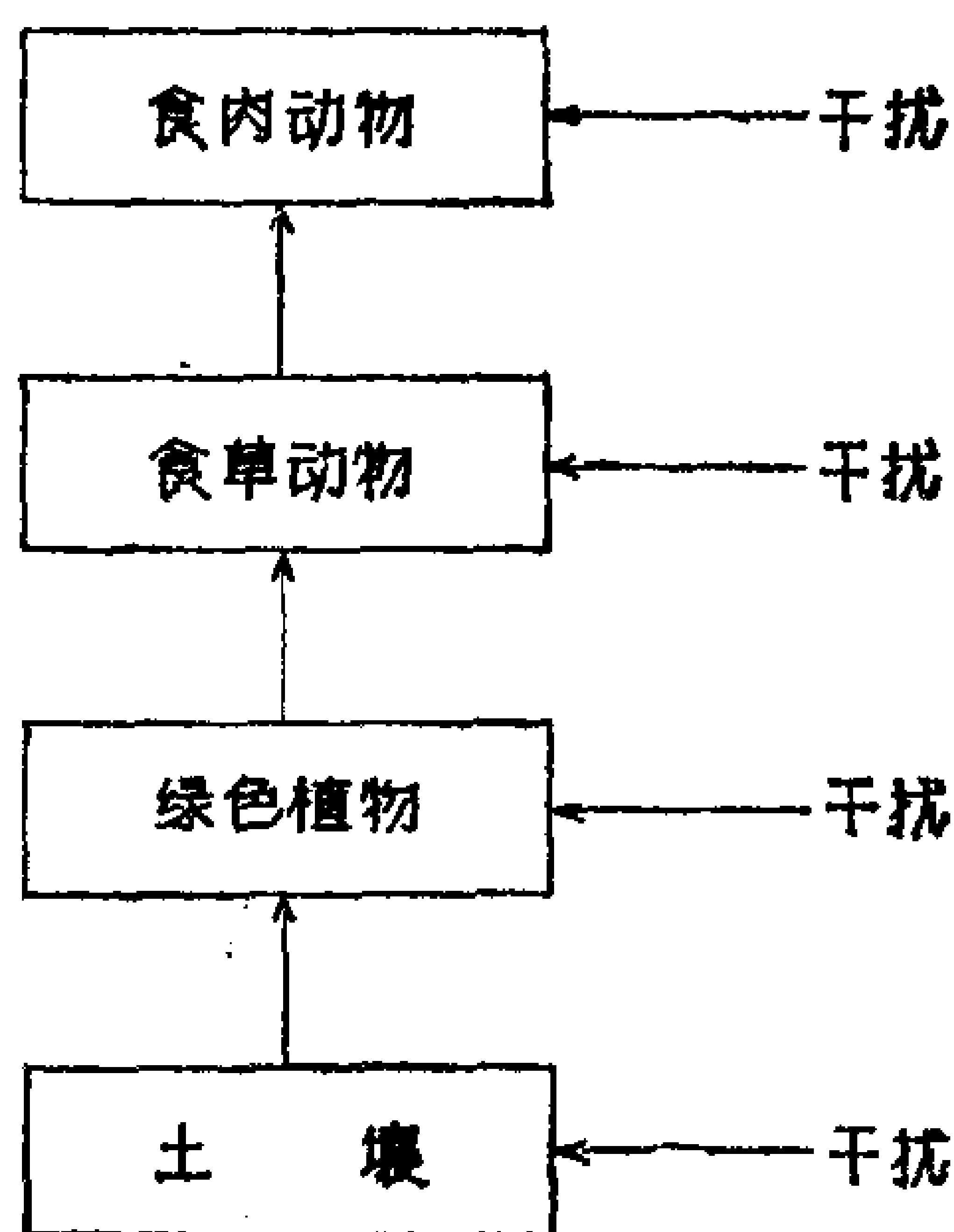


图2.6

维持另一个，那么过不了多久，任何一个子系统的内在变化趋势就会破坏整个系统。水土流失会使森林缺乏土壤，池塘中绿色植物自我窒息使鱼儿失去食物……。但是，这种自我崩溃在一个稳定的生态系统中并没有出现，其原因恰恰在于子系统在干扰作用下各种变化倾向都被其它子系统控制住了。表面上看来，在整个生态系统中，食肉动物处于大厦的最上层，这个系统的破坏对基础毫无影响。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人们都知道，在美国开巴高原，由于那里的食肉动物被捕尽，致使鹿群迅速繁殖，在很短的时间内数量达到十几万只，几乎吃光了七十万亩土地上所有的绿色植物。结果，绿色植物消耗殆尽又使鹿群大量的死亡。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这种状态长期维持下去，开巴高原还会出现水土流失，变成一片不毛之地。可见，在这个系统中，土壤、绿色植物、食草动物、食肉动物都为整个系统的存在做着贡献，它们组成了一个互为因果、相互调节的有机整体。任何一个子系统的存在都是大系统存在的条件，只有依靠相互调节，生态系统才能稳定。

社会是什么？它也是一种组织，是由一个个人组成的巨大而有机的组织网。经济结构毫无疑问是

一切社会活动得以进行的基础，每个人只有解决了衣食问题之后，才能从事政治、文化活动。但是，只要我们承认辩证唯物主义最基本的原理：万物都处于变化和流动之中；只要我们承认经济活动是人类一切活动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那么，就不能忽视经济结构自身存在着的多变倾向。中国封建社会地主经济中自耕农有失去土地变为大地主私属的可能；在某些条件下，地主经济可能变化为庄园经济。商品经济既有不断发展的可能，而在通货、通讯、交通条件破坏时，也可能出现倒退，演变为自给自足的经济。古代的农村公社经济既可以在大一统官僚政治的干预下演变为有众多自由农民的小农经济，同样可以象古代印度那样由于种姓制度的作用，演变为一个个自我封闭的组织。自然界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也没有只可以向一个固定方向改变的事物。永恒的变化犹如一团内在的火，它时时刻刻在焚烧着那些看来似乎是固定不变的形态。

因此，当各个不断变化的子系统组成大系统时，为了保持整体的稳定，必须要求子系统相对稳定。这就要求子系统之间能够相互调节，彼此控制那些破坏性的变化趋势。否则，任何一个组织都会被子系统内部的变化之火所焚毁。这就是社会结构

调节原理的哲学基础。

毫无疑问，社会结构调节原理是对历史唯物主义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作用及反作用的进一步细化。为了从理论上对这一点获得更深刻的理解，下面，我们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结合现代系统论的组织原理，从逻辑上把它推导出来。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社会结构是社会的组织方式，是占主导地位的组织形态，社会是靠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结成一定关系组织起来的。所谓社会关系，无非是四大类：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和血缘的。我们在对社会结构进行宏观分析时，往往把一类关系网看成是一个子系统。在文明社会中，纯粹的血缘关系网是比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网低一层次的组织，它们往往通过政治、经济和文化组织才成为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这样，我们在宏观层次上考察社会结构时，可以把社会结构近似地看作由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三个子系统组成。经济结构是指占主导地位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网，是人类为了维持自身生存的经济组织。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同样是指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网和文化关系网，它们有着各自特殊的组织方式，完成自己

独特的功能。

这三个子系统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可以组成一个稳定的社会呢？现代系统论和组织理论在研究小组织怎样才能组成大组织时，广泛应用了结构一功能分析。这种方法的要点是：先把形成大组织的每个子系统搞清楚，对其进行如下三方面的具体分析，①子系统的结构；②子系统结构存在需要的条件；③子系统的功能。也就是说，应该按照如图2.7所示的输入输出框图来分析每个子系统。输入是保持这一子系统生存的条件，输出代表这一子系统结构所具有的功能。图2.8表示对罗马帝国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结构这三个子系统分别进行结构一功能分析得到的结果。对每一个子系统进行结构一功能分析，基本上等同于寻找因果关系。因为功能总是结构的必然产物，而某种结构总是依赖特定条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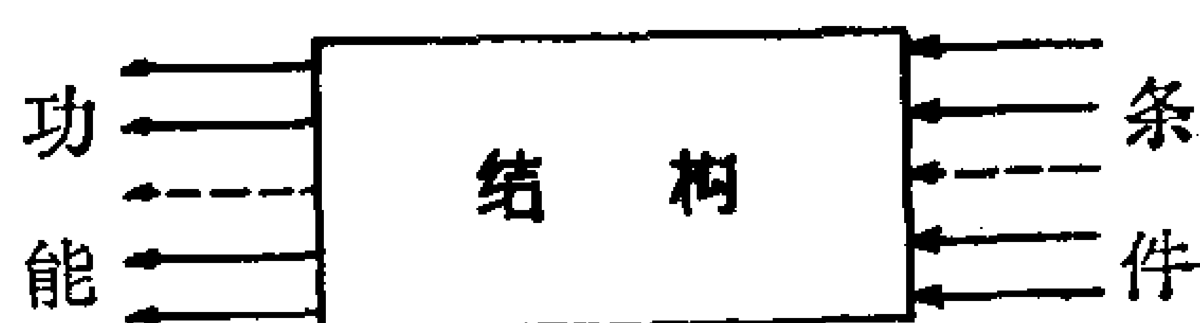


图2.7
子系统的结构一功能分析框图

一旦子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搞清楚了，子系统组成社会结构的条件也就不难理解了。系统论指出，当不同的子系统的功能和条件（输入和输出）能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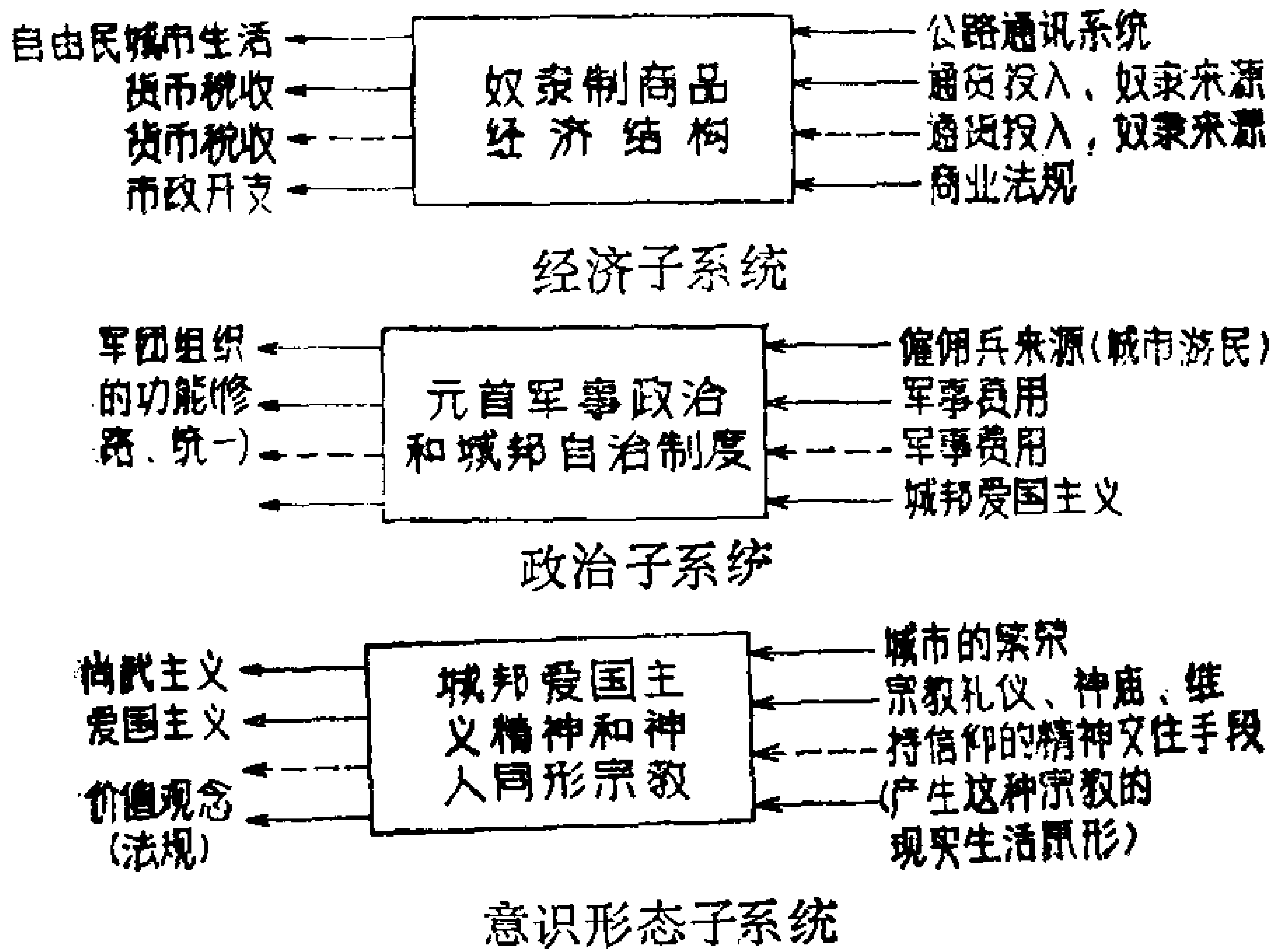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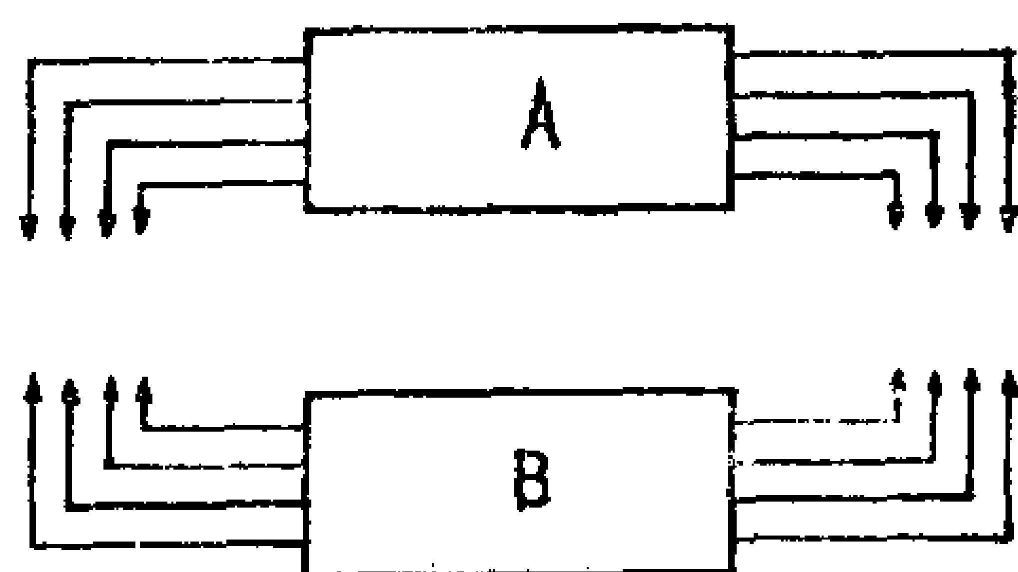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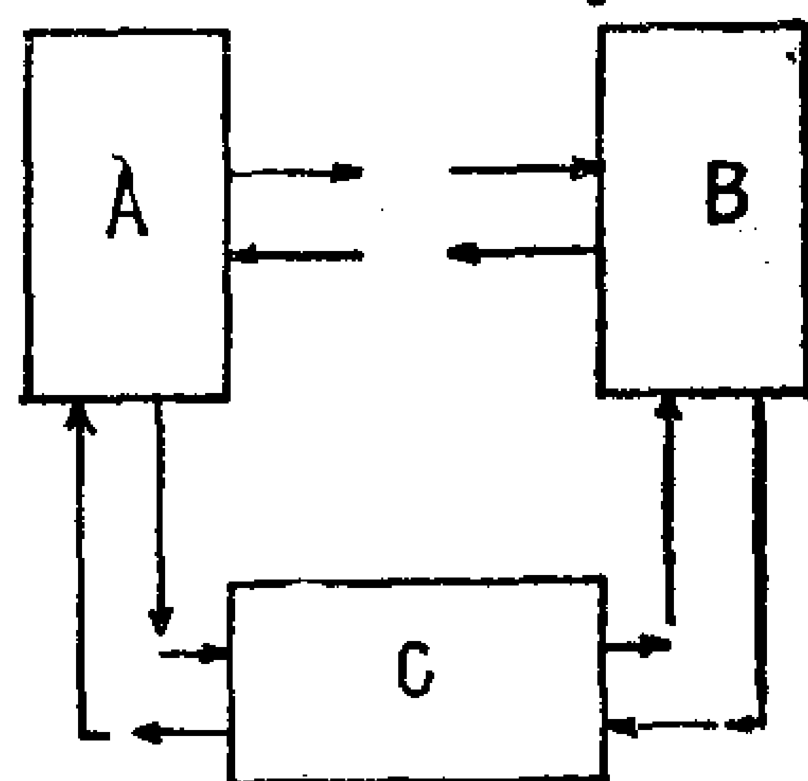
图2.8

全耦合起来时，这些子系统就能组成一个稳定的大系统。比如有两个子系统A和B，当A的功能恰恰等于B所需要的条件，而B的功能又与A所需要的条件相符，这时，A的条件为B的功能所提供，B的条件为A的功能所提供，两个子系统就能在相互调节中保持各自的稳定，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大组织。无疑，三个或多个子系统组成的大组织也应是这样（见图2.9）。也就是说，只有各个子系统的功能和条件能够形成一个耦合网时，小组织才能形成一个大组织。这就是所谓“功能耦合原则”。对于生态组织和生命组织来说，“功能耦合原则”是早

已众所周知的。人体整个生命系统是由消化系统、神经系统、循环系统……等子系统组成的，这些子系统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结构和功能，维持这种特定的功能需要严格的控制条件。人体中各个子系统的输入和输出耦合是非常严密的，使它们互相提供必不可少的条件。比如：消化系统执行着提供营养的功能，而消化系统的工作需要血液循环系统的功能，血液循环系统又需要呼吸系统和神经系统的功能，这些系统又都需要消化系统提供能源，它们互相耦合，形成了复杂的功能耦合网。假如其中任何一个子系统的功能和条件不能耦合起来，整个生命组织都要瓦解。任何子系统都不能独立生存。



两个子系统形成的功能闭合系统



三个子系统形成的功能闭合系统

图2.9 不同的功能耦合系统

——小组织怎样形成大组织

只要把"功能耦合原则"运用到社会结构的分析中，我们马上得到了社会结构的调节原理。所谓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必

须形成互为因果、互为调节的关系，这是指每个子系统的输出刚好等于另一个子系统所规定的输入。图2.8中三个子系统的输出和输入联系起来，恰好能组成一个良好的耦合的网络，这就是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的社会结构。

必须指出，并不是任何时候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都能做到功能完全耦合的。罗马帝国后期的历史就证明了这一点。当时，基督教在意识形态中的比重逐渐增大，而基督教这种意识形态结构是不能和罗马帝国的政治结构耦合的。吉本曾精辟地分析了为什么基督教的兴起会促使罗马帝国的崩溃。著名的比较宗教史家詹姆·弗雷泽也讲得很清楚："希腊和罗马社会，是以个人屈从国家的观念作为基础的；它把国家安全，做为行为的最高目的，放在个人安全之上，……东方宗教灌输了灵魂和上帝间的感通的思想，而灵魂的永生作为唯一值得争取的目的了；与此相比，国家的盛衰兴亡都降到了微不足道的地位。……由于这项转变而招致了重大损失。政治机体的总瓦解就出现了。"① 所以，东罗马帝国用信奉基督教的城市市民组织武装

① 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93页。

力量而屡遭失败，很多皇帝都为基督教徒不愿当兵而苦恼。这样一来，罗马整个军事、政治结构就失去了维持稳定的重要条件。

同样，假如把罗马帝国的经济结构换成自由农民——奴隶经济，（即以自由农民为主，奴隶制仅仅是小农经济的一种补充。罗马共和国就是这种经济结构。）它也不能同罗马元首军事政治结构形成功能耦合网络。小农经济不具备为国家提供大量货币收入的功能，也不能为军事政治结构提供大量城市无业游民。它无法同其它两个结构组成稳定的系统。

这就告诉我们，从功能耦合条件推导出社会结构调节原理并不是对社会的任何状态都成立。它仅仅刻划了社会适应态，或曰稳态。正如人体、生命和生态组织中，功能耦合仅仅刻划了生态平衡、人体健康状态一样。当生命系统和人体组织出现功能不耦合时，毫无例外地会出现组织的瓦解和死亡。社会组织的子系统功能不耦合时，同样将出现社会结构的不稳定。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最核心的思想：一个社会要稳定的存在，要繁荣昌盛，它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必须互相适应，一旦不适应，社会结构就面临着变化。

2-5 罗马共和国怎样演变为罗马帝国

“社会结构调节原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概念，它是我们研究社会结构演化、解决一系列重大历史难题的出发点。

首先，利用社会结构调节原理，可以证明适应态必然具有多样性，从而为解决在古代生产水平大致相同的经济基础之上，为什么会出现如繁星般众多的文明形态提供了依据。

根据社会结构调节原理，同样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只要有大一统官僚政治的干预和调节，可以成为地主经济结构；在贵族政治的条件下，农民对地主人身依附关系日益强化，就表现为领主经济结构。同样是农村公社，在种姓制度调节下村社可以变成完全封闭的经济结构，而在佛教的调节下却能成为大一统的组织单元。在古代埃及，在多神教和神人合一政治结构作用下，又可以呈现出“诺姆”这一特定的形态。不同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进行功能耦合的方式更是丰富多采，只要三者组成一个功能耦合的调节系统，就都

能保持一段时间的稳定，在历史的洪流中占据一席之地。

这样一来，社会形态的多样性可以从一个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互相适应的方式得到说明，从而避免了历史哲学中那个令人迷惑的“最后原因的陷井”。我们运用结构—功能分析，通过对社会功能耦合网的解剖，就可以指出罗马社会、中国封建社会、西欧封建社会、古代印度社会等一个个具体社会的各自结构特点，分析它们是如何组织起来的，用它们自身来说明它们存在的理由。

第二，既然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结构从来是作为一个互相调节的功能耦合整体存在的，那么，要研究历史演变的规律，必须从在整体上把握结构开始，孤立地谈经济发展，或者孤立地分析政治文化的发展线索是找不到历史规律的。只有从一个个孤立的因素上升到结构分析，我们才能从历史发展互为因果的大网中摆脱出来。就拿为何英国最先进入资本主义这一问题来说，结构分析的方法告诉我们，绝不能单单追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线索，也不能仅仅分析议会制度的起源和宗教改革。因为，如果没有三个子系统的互相调节，它

们中间每一个都不能稳定，都会在历史的洪流中消失。因此，要真正理解英国确立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因，必须去研究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议会制度、人文主义这三个互相调节的系统构成的整体（图2.10）是怎样在封建社会结构中出现，并取代封建社会结构的。一句话，必须从整体上研究结构生长和演变的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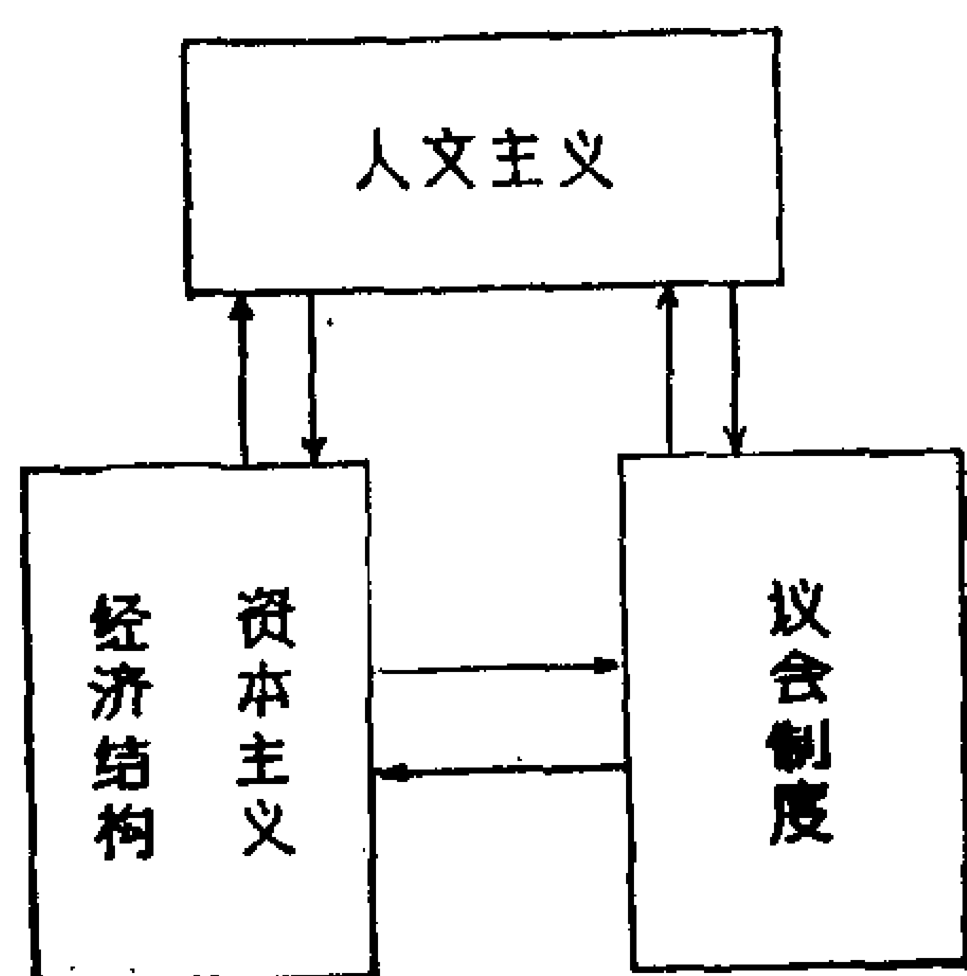


图2.10　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结构

社会结构调节原理能否用来分析社会结构的诞生和演变呢？表面上看来，几乎很难。因为社会结构调节原理中的功能耦合分析只能说明适应态，从它出发，得到的只是互为因果的循环。一定经济结构的存在必须要有相应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建立为前提，而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又不能脱离经济结构而存在，至于问它们中间哪一个先产生，这无疑构成了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也就是说，社会结构各个子系统互为因果的解剖，充其量只是描述了社会结构各个子系统的互相依存性，它只能解释存在，似乎很难说明结构是怎么产

生的，又会怎样变化。西方结构主义哲学家早就看到了这一点。于是，他们中一些人认为发展是没有意义的东西，即：历史规律不是在发展中，而是在结构各个方面的静态依存中。确实，如果把社会结构调节原理所把握的社会结构适应性仅仅理解为整体中各个部分的相互依存，这并没有超出结构主义所提出的思想。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结构主义是不同的。社会结构调节原理所刻划的社会结构的适应性不仅可以理解其自身怎样保持稳定的存在，还揭示了结构产生和演化的过程。

我们可以作这样的考虑，如果由于某种变化破坏了功能耦合，那么整个社会结构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社会结构的三个子系统中每一个都是另一个存在的前提，同时又是别的子系统调节的结果。因此必然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出现连锁反应。某一种结构的偏离，引起功能的变化，必然带来以这种功能为输入的其它子系统结构的变化。其它子系统的变化反过来又影响它的功能。结果造成功能耦合的破坏。整个社会结构因此动荡起来，除非找到新的功能耦合，实现新的稳态，否则动荡将不断地持续下去。在这里，“功能耦合”不仅能帮助我们把握社会结构的适应态，而且，是研究不适应态的钥

匙。在讨论社会结构的演化问题时，这种方法有助于我们去理解一系列奇特而重要的历史过程。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这一点，让我们来剖析公元前二世纪罗马共和国演变为罗马帝国这一颇有趣味的例子。

在罗马共和国早期，罗马是一个城邦国家。城邦公民各自都有一份土地。当时，商品经济和奴隶制都不太发达，社会中有大量的自由农民存在。与这种经济结构相适应，罗马在政治上实行共和国制度。就拿它的征兵制来说，当时只能实行义务兵制。国家既没有经济力量，也没有必要去养活庞大的常备军。而大多数自由农民的经济条件完全可以自备武器装备。当时的罗马法规定，凡年龄在17—45岁的男性公民，都有服役的义务。农民平时务农，战时入伍。根据公民的经济实力参加不同的兵种。最富有的一等公民是“骑士”，另一些一等公民和二、三、四等公民是“重装步兵”，五等公民是“轻装步兵”，赤贫者因没有经济能力亦不许在军队中服役。它表明经济结构同政治军事组织是基本适应的。但到公元前二世纪前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图2.11是从公元前251年到公元前201年罗马公民中有资格服役的人数和公元前四世纪到前二世纪

罗马军团编制数。我们看到有资格服役的人数是一条骤减的曲线。公元前251年尚有298,000人，到前201年只剩下214,000人。①吉本曾经说过："在不过几代以后，罗马人民可能已经完全消失了，如果不是经常有被释放的奴隶和外来移民的补充的话。"②总之，到共和国末期，罗马有独立财产的人只剩下一小撮，据当时人估算不过二千人左右。③然而，当时罗马在政治上需要不断地扩大对外战争，随着奴隶制的发展，也需要强化国家机器以镇压奴隶反抗。因此必须加强国家的军事力量。图2.11反映的正是这种情况。实际上，公元前二世纪的时候，罗马军队经常在外作战的人数在8万以上，比注册编制数要高得多。显然，就军队来源这一功能来说，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之间的"功能耦合"被破坏了。政治结构需要军团继续扩大，而经济结构没有力量再提供兵源。这时，不改变政治结构，整个系统的稳定就不能继续维持。

当社会结构中某几个环节出现明显的功能不耦合时，往往会变成尖锐的社会问题提交到人民面前。于是，社会改革势在必行。改革的最初目的必

①②③ 梁作干《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点：西晋帝国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载于《暨南学报》1982年第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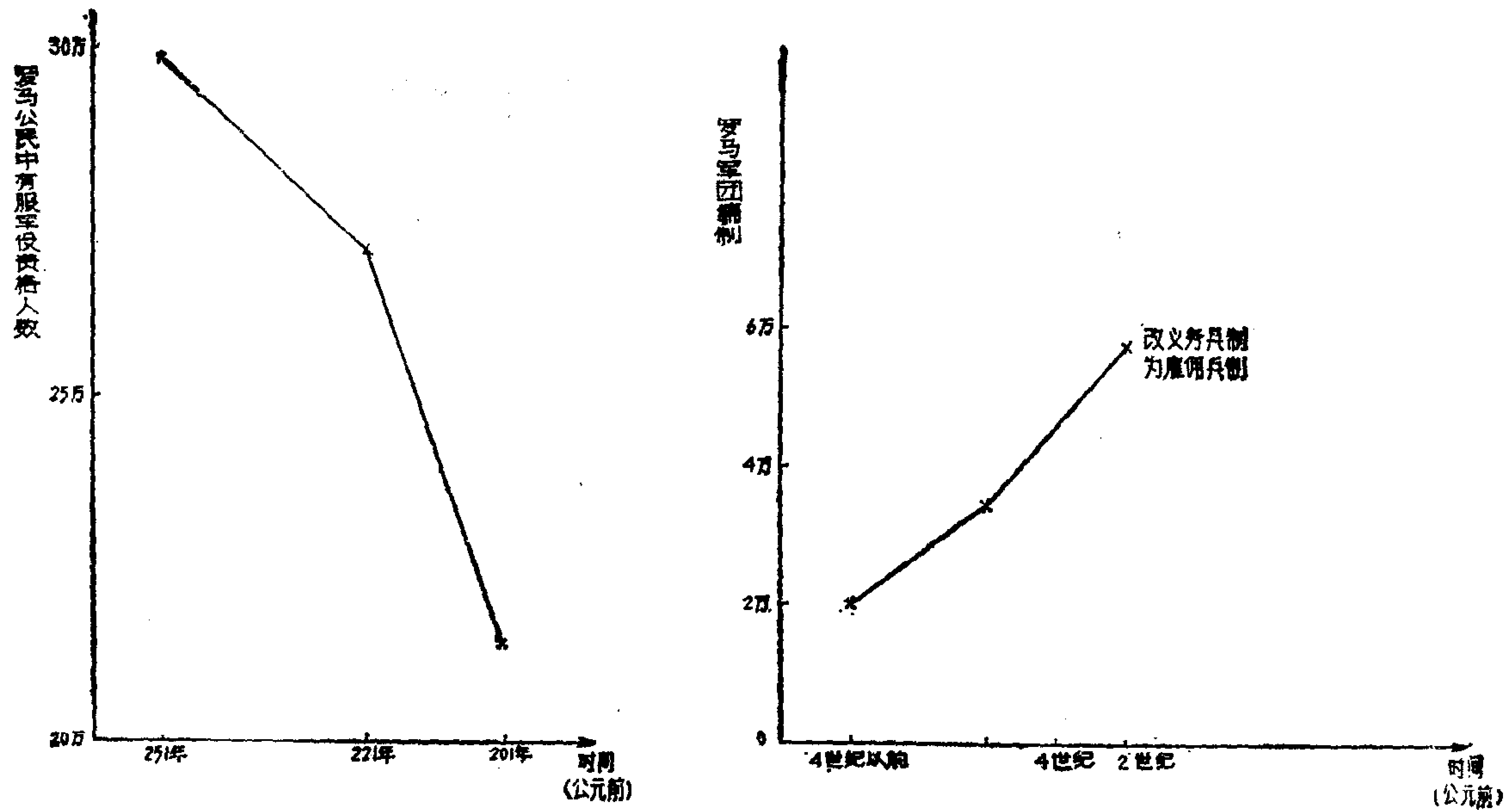


图2.11　公元前251年到201年罗马公民有资格服役的人数和罗马军团编制数对照表

定是围绕如何解决功能耦合问题。公元前二世纪末，在罗马军团节节失利的情况下，马利乌斯进行了著名的军事改革。他把公民兵制改为募兵制，不再要求有财产的自由民入伍，而从城市的无业游民中吸取源源不断的兵源。但是，军事结构是政治结构中的一部分（图2.11），它的变化势必导致政治结构的变化，而结构的改变必然会影响到功能。因此，连锁反应开始了。见图2.12。马利乌斯改革后，罗马共和国各式各样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

首先，募兵制必须解决军饷的来源。由于无业游民是为了得到经济上的好处而参军的，所以为了维持战斗力，不得不经常提高士兵的军饷。这就带来了财政问题。国家必须有相当多的货币收入，否则募兵制就搞不下去。这势必造成对商品经济的更大需求。军事结构的变化立即从政治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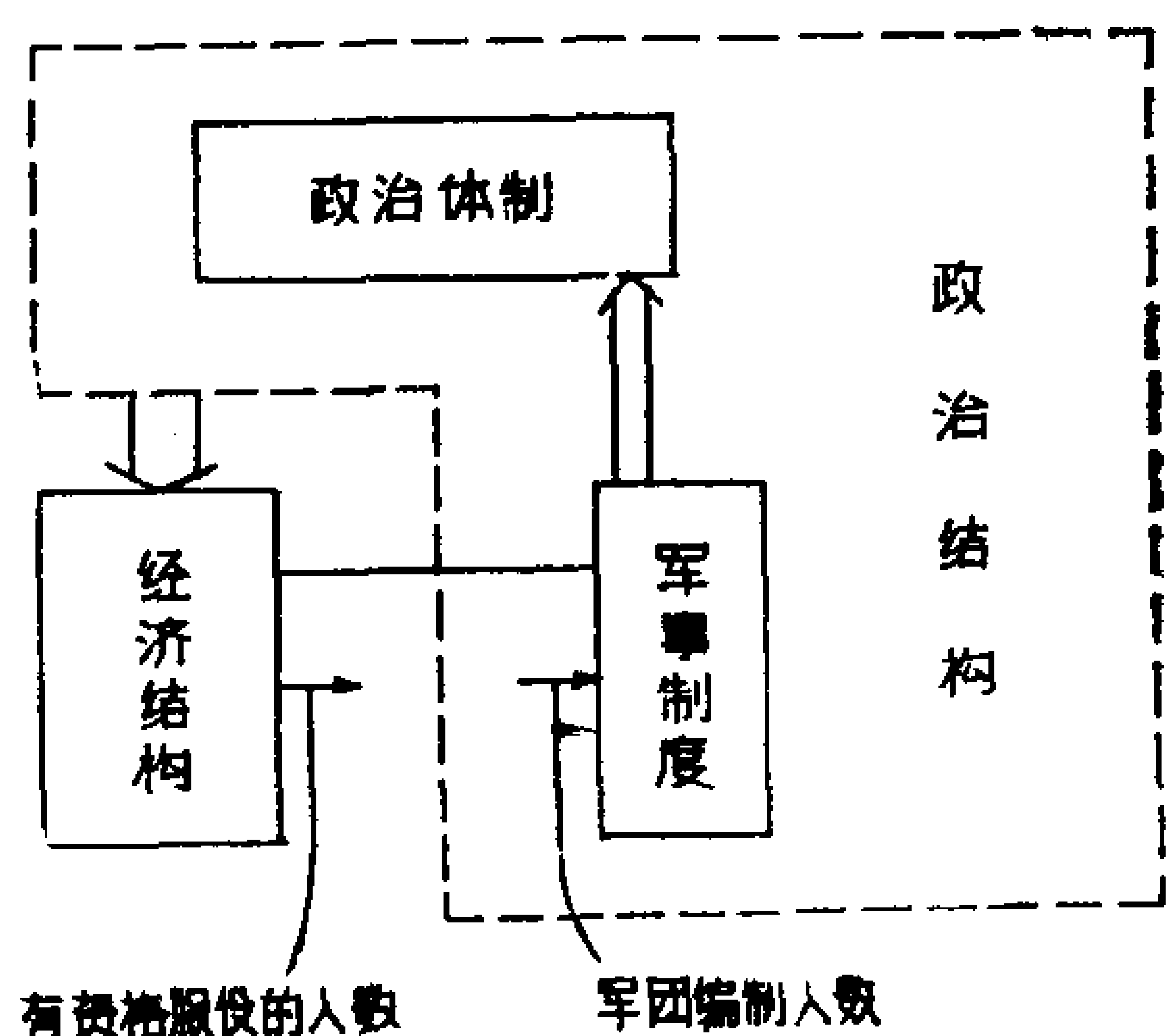


图2.12　共和国时期经济结构与军事结构

的功能上反映出来，影响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它大大加速了土地兼并和大土地所有者的发展。我们知道，罗马共和国早期的对外战争曾赢得大量土地。如公元前418年和前381年，侵占了拉比库姆和图斯库普姆10708公顷的土地；前396年，侵占维爱37072公顷土地；前386年，侵占了庞贝40000公顷土地；前353年又侵占了卡勒38660公顷土地。这些土地大多数作为罗马的国有土地，除了小部分拍卖给个人外，大多数分给了自由农民耕种。这是罗马共和国保证小农经济存在的有力措施。据T·弗兰克统计，在公元前三世纪，约有四至五万公民得到了约100万犹格的土地。但到了共和国末年，由于国家对货币需求的增加，逐步放弃了这一类调节措施。实行募兵制以后，罗马共和国通过扩张得到的土地，不得不大量地拍卖给商人，以增加国家的货币收入，还有一部分则分给有军功的士兵和将领，留给国家作为分配给自由农民的土地则寥寥无几。公元前146年，罗马消灭伽太基后，对伽太基的土地进行了大拍卖。其中，只有三分之一留给国库。结果在非洲兴起了一个非常有钱有势的业主阶层，他们的大地产遍布全境。在尼禄时代，据老普林尼统计，约六个人占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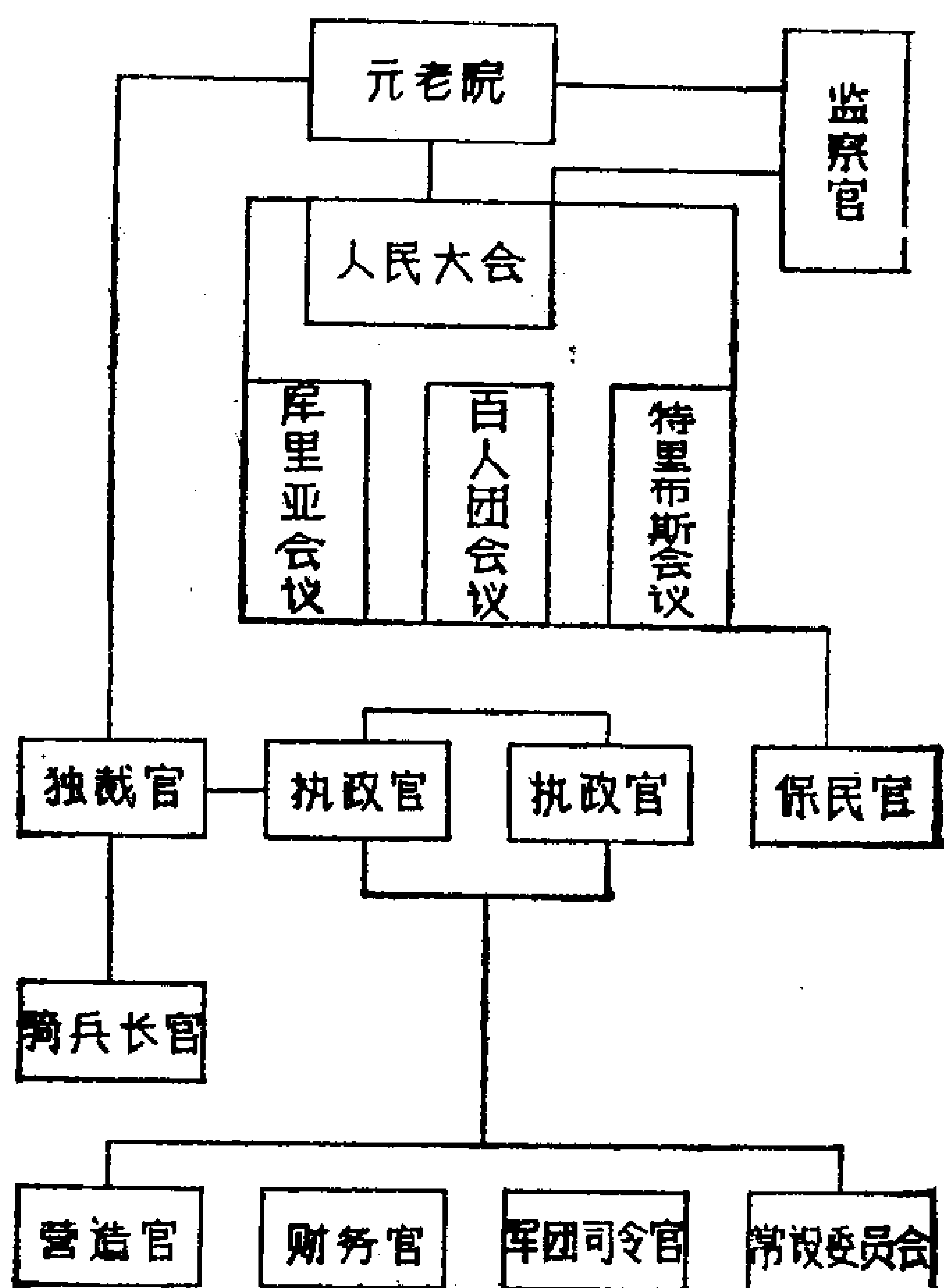


图2.13　罗马共和国政治结构

非洲省全部可耕地的半数。① 政治结构上的功能变化，促使共和国的自耕农经济更快的瓦解，原有的耦合系统被彻底破坏了。

第二，军事结构是和整个国家体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对罗马这个崇尚武功的民族来说，军事结构的变化必然导致整个政治体制的变化。罗马共

① 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8页。

和国的政治结构如图2.13所示[1]。军团司令官起初是六位军事保民官，由执政官任命，有时则由人民大会选举。执政官是由百人团会议选出的。当时罗马有193个军事百人团，按财产分为五个等级，一等级的98个百人团有优先表决权。军权是掌握在百人团会议手中的。这同义务兵制是相适应的。因为百人团会议本身就是以自由民的财产多少为等级划分标准的。义务兵仅仅在战时集中起来，战事一过就解散。因此百人团会议控制整个军队和军团司令官。但是，改为募兵制后，常备军与共和体制格格不入。首先，常备军中大多数是无业游民，他们在政治上倾向于平民的观点，而百人团会议则控制在财富富有的人们手中，所以常备军和百人团会议经常在政治上不一致。这就为军事头目利用军队同元老院斗争，进行个人独裁创造了条件。实行募兵制后，雇佣兵一般服役20年，因此武装部队就成为在政治上经常起作用的独立力量。无业游民对贵族的财产等级观念十分淡薄，往往只拥戴自己的统帅，百人团根本无法控制他们。军队自然走上干政的道路，军权在政体中变得越来越重要，终于成为军事

① 严家其：《国家政体》，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4页。

头目进行上层斗争的政治工具。在这种情况下，贵族共和政体无法继续维持自己的稳定。由于军队倾向平民的利益，而且日益成为游离于政体之外的政治力量，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亦尖锐起来了。

雇佣兵制度建立以后，商品经济必须加快发展，骑士阶层即商业奴隶主阶层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也日益突出，这一情况影响到意识形态结构。罗马的领土越大，买卖做得越广，越要考虑被征服地区臣民的特点和文化，这不仅要改变对征服地的政策，而且要改变仅仅局限于罗马本土的狭隘的城邦主义思想。罗马的泛城邦爱国主义精神从此发展起来，使意识形态结构也出现了某种变化。总之，我们从罗马共和国末期看到了政治结构不稳定带来的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局面。平民与贵族斗争的加剧，军团统帅扩张自己的政治权利，奴隶起义和殖民地人民争取罗马公民权的斗争。这一切终于导致了罗马内战。直到罗马帝国建立以后，才在宏观上达到新的功能耦合。社会才重新稳定下来。

读者可能会有一个错觉，好象罗马共和国的瓦解是征兵制改革造成的。其实，兵源缺乏只是整个共和国大系统功能不耦合的一个方面，这种不耦合还从其它方面表现出来，如政治上平民与贵族斗争

的加剧，经济上商品经济的扩大，意识形态上各种思潮的兴起等等。当社会结构功能不耦合时，变化的原因也是一个循环链。对此，从哪一点出发进行分析都可以，因为，从任何一点出发的分析，它们都是等价的。

历史学家在分析社会演化时，常常抱怨分不清什么是原因，什么是结果。互为因果大网使他们在寻找终极原因的道路上步履维艰。利用“功能耦合”的原理来研究这一问题，就能得到清晰的理解。

公元前二世纪罗马共和国的社会结构出现功能不耦合的情况，尽管一系列变化的锁链互为因果地缠绕在一起，在宏观方向上却有明显的规律。这就是：互为因果的变化过程一方面连续不断地破坏旧的功能耦合系统，随着破坏程度的加深，在宏观上却越来越趋向一种新的功能耦合状态。社会从一个旧的耦合框架日益演化到一个新的结构框架上去，罗马共和国变成了罗马帝国。（见图2.14）

这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社会结构的演变实际上是这样一个过程：旧的结构功能耦合被破坏，而且不能恢复了，人们便开始实行各种改革，新的功能耦合系统慢慢地形成，它标志着新结构的建立，最终取代了旧结构。罗马共和国向罗马帝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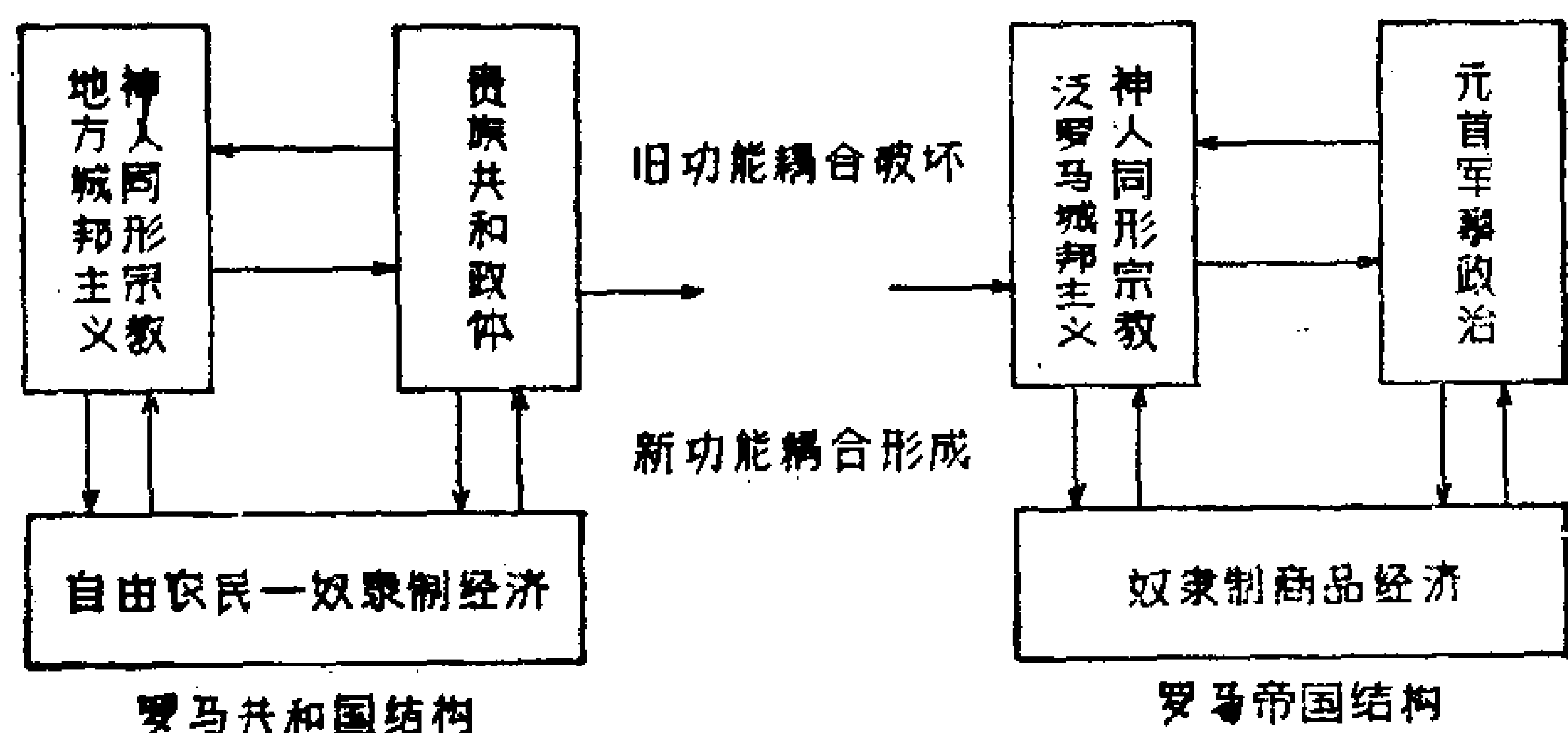


图2.14　罗马共和国向帝国演变的社会结构框图

演化可以用这种方式把握，罗马帝国向西欧封建社会结构的演化，西欧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演化，也可以用这种方法进行整体研究。虽然在不同的结构转化中，功能耦合的方式和性质是不同的，但是从整体上看，演变的锁链之所以起动，源于旧有结构功能耦合系统的破坏，是旧结构内部出现不适应引起的。而新社会的出现必定意味着新的功能耦合系统的建立，它实际上就是在已经破坏了的功能耦合系统中建立新的功能耦合系统的过程。这样一来，社会结构演化规律的探讨就可以归结为旧有结构功能耦合的适应态是如何被破坏，以及新的相互调节功能是如何确立起来的这两个问题，把它们搞清楚后，为什么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能在西欧出现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第三章

古代社会的衰落

在一切损害之中，善良者的损害是最不幸的损害。

——尼　采

规定即否定。

——斯宾诺莎

3-1 是什么因素侵蚀了罗马共和国的小农经济

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既然社会稳定时期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是互相适应的。那么为什么又会出现功能不能耦合的状态呢？这个问题不解决，研究社会结构的演化无异于一句空话。因为功能耦合的互相调节系统是自我保持系统，它具有强大的抗干扰能力。旧的功能耦合只要不破坏，就会一直存在下去，谈不上新结构的确立。但是，在人类历史上，我们总是发现，社会

结构即使没有受到外部冲击，适应态往往也只能保持一段时间，各子系统之间的不适应迟早要出现。不同社会结构的适应态的破坏是否存在共同的规律？这是研究社会结构演化规律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在上一章中分析了罗马共和国向罗马帝国演变的历史过程。显然，公元前二世纪以前，罗马共和国也是一种功能适应系统。剖析公元前二世纪罗马共和国功能耦合的破坏，会给我们的研究投之以光明。

历史事实表明，罗马共和国之所以出现兵源缺乏的现象，主要是经济结构中自由农民急剧破产造成的，也就是说，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功能耦合的破坏是小农经济瓦解的后果。

一些历史学家把公元前二世纪罗马自由农民急剧减少归为它对外征战的失利。我们在2.5节讲过，罗马共和国政治结构对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调节措施，是把从对外征战中获得的土地分给或租给自由民，保持小农经济的稳定。但在公元前二世纪罗马共和国这一政策的实施碰到了困难。当时，罗马在对外战场上遭到一连串挫折。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汉尼拔出兵罗马，转战于意大利半岛近12年。罗马

在这场战争中损失惨重。公元前217年的特拉西米诺湖一战，罗马的四个军团三万余人几乎全部被歼。翌年坎尼再战，又有七万人被歼，一万人被俘。① 因此，罗马共和国用战争获得土地来保持小农经济的调节办法在这段时期内受到了干扰。无疑这是一个原因。但是，如果我们继续深究，可以发现，它无非是一种外部原因。在整个罗马扩张史上，并非没有出现过失利的情况，为什么早期罗马共和国对外战争的失利却没有导致小农经济瓦解呢？

实际上，罗马共和国中小农经济在公元前二世纪的瓦解，是破坏因素长期积累的结果。无非是到了某一时刻，小农经济内部已脆弱到这样的程度：它再也经受不住战败的冲击了。历史证明，罗马共和国小农经济是被政治结构的功能慢慢破坏的。众所周知，罗马共和国的政治结构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对外征服战争。自由农民要为参战准备各种物资，而且把大量劳动力抽出来组织公民兵，这必然会延误农时，战争从来是自由农民不堪忍受的负担。但奴隶是不能参加对外战争的，他们一年四季在

① J.F.C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第1卷，第139页。

田间为主人劳动。因此，只要战争频繁，在经济结构中又有奴隶制并存，小农经济将无法与奴隶制经济竞争。如果战争打赢了，自由农民虽然得到了部分土地，但奴隶的来源也增加了，自由农民就面临更强大的竞争对手。它至多是给不断衰退的小农经济打支强心剂。如果战争输了，则自由农民破产更加迅速。总之，只要战争长期延续，成为政治生活中的经常状态，政治结构的这种功能从长期看必然一点点侵蚀与它适应的经济结构。自由农民迟早要破产到无法对罗马共和国提供足够兵源的地步。除了长期战争破坏小农经济外，商品经济的发展也破坏小农经济的稳定性。商品经济一旦从小农经济中萌发，竞争就开始了！土地兼并必然出现。但是，只要建立城市共和国，就必然会对商品经济产生较大的需求。可以说，商品经济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政治结构对经济结构调节的结果。

这里似乎存在着二律背反。罗马共和国的政治结构是以大量的自由农民的存在为前提的；小农经济的稳定，又要依靠政治结构的调节。这种调节，使罗马共和国形成功能耦合系统。没有对外战争的征服，没有城市的建立和一定程度的商品经济，谈不上罗马共和国的强大和扩张。但是，政治结构的

必备功能，如战争以及对商品经济的需求，却慢慢地破坏着经济结构。这不是同功能耦合的调节原理矛盾吗？

如果我们把概念精确化，可以发现这里不但不矛盾，而且为我们理解社会结构适应性的破坏提供了一个十分基本的出发点。功能耦合、互相调节是一种短期效应。无论从经济结构为政治结构提供兵源，提供商品粮，或是政治结构维护小农经济的稳定，对其实行各种保护政策，都是在短时间内有效的。但象频繁的战争、商品经济导致土地兼并这些破坏性因素的增长却是十分缓慢的。它往往需要近百年，甚至数百年的时间才表现出来，它只是政治结构功能在长期内所产生的副作用一点点积累起来的后果。罗马共和国结构的各个子系统在短期内虽然是功能耦合的，但因为政治结构的功能（如对外战争）长期作用却在慢慢瓦解着小农经济结构，使得功能耦合迟早有一天无法维持下去，旧社会结构一定会被新社会结构所取代。罗马共和国在扩张中必然要演变为罗马帝国。

这种分析有无普遍意义呢？罗马帝国建立并达到鼎盛之后，整个社会结构改变了，经济结构中自由农民已不占主要地位，代之以奴隶制商品经济；

公元二世纪政治结构的对外征战功能也基本消失了，出现了“罗马和平”。一系列新的功能基本取代了旧功能，形成新的功能耦合系统。在新的系统中，是否同样存在着结构因功能而释放出来的毒素由积累而瓦解的现象呢？也就是说，罗马共和国瓦解的原因在机制上是否具有一般性呢？我们发现，这种导致功能耦合破坏的机制确实在罗马帝国中存在，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通过对这两个具体例子的深入剖析，我们将得到一个普遍的结论：任何一个社会结构都有自我破坏的倾向。它是社会结构不断演化的内在动力。

3-2 罗马帝国灭亡之谜

在世界古代史的研究中，似乎没有别的问题比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更令人困惑，更众说纷纭了。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曾列举了罗马帝国灭亡的十三个原因，它们是：穷兵黩武、行政腐败、赋税过重、农业衰落、奴隶制度、民众贫困、地主贵族发财、资金减少，庇护制成长、公德丧失、血统混杂等等。他接着指出，把这些原因罗列起来是毫无意

义的，因为它们只是现象。如果我们思索一下，就可以知道上面提到的每一个原因本身，都是从其它的原因或条件得来的。人口减少，是原因还是结果？贫困，是原因还是结果？亨利·缅因勋爵说："再也没有比这种说法，即赋税过重使罗马帝国贫困化的说法，更加荒诞无稽。"农业衰落是因为地力枯竭呢？还是因为农民阶级的赋税负担过重和农业投资的递减？是因为地主贵族占夺土地使农民沦为农奴地位呢？还是因为乡村不靖和盗贼横行？①有人把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归为奴隶制度对生产力的束缚，归为奴隶对劳动毫无兴趣，那么为什么这些问题在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没有形成社会危机呢？当时的奴隶制度同样是十分残酷的。至于庇护制的成长，它无非是整个商品经济和帝国政治权力崩溃互为因果演变链中的一环罢了。当经济越来越近似于自给自足状态时，用奴隶进行群体性、专门化的生产必然过时，而且帝国已不再拥有对奴隶起义的威慑力量，奴隶制庄园从管理方式上就要发生改变，农奴制势在必行。

其实，真正的困难并不在于衰亡原因构成互为

① 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66页。

因果的大网。我们在前一章中已经阐明，任何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必然是功能耦合的因果循环系统，一旦功能耦合被破坏，变化的锁链也是互为因果的。“政治的混乱加速经济的崩溃，经济的衰微也促成政治的腐败。”①问题的实质在于，为什么在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它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结构能够形成功能耦合系统，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功能耦合被慢慢破坏，一系列的变化犹如滔滔的洪水，冲击着帝国的结构，使其离功能耦合的状态越来越远。事实上，当我们追溯这股吞没帝国的洪水源头，发现它竟发源于帝国的巅峰时代，起初不过是涓涓细流，来自帝国结构的各个部分。这种腐蚀剂和罗马共和国政治结构对经济结构调节带来的慢性破坏一样，正是社会各个子系统之间相互调节的功能带来的。

以罗马帝国的经济结构为例，帝国后期对商品经济的致命打击莫过于通货膨胀。巴勒斯坦在公元一到三世纪之间，物价上涨了10倍。在埃及，公元一世纪价值8个希腊币的小麦，到公元三世纪末竟价值12万希腊币。②毁灭性的通货膨胀犹如一次次

① 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10卷，第289页。
② 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10卷；第292页。

的地震，摧毁了商品经济的大厦。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是帝国货币的贬值。图3.1是从尼禄王时代到公元260年帝国货币含银量的变化，它是一条急骤下降的曲线。不到200年间，货币含银量从90%下降到5%以下。① 表面上看来，罗马帝国进行一次次的货币贬值是对经济规律的无知，有时是为了皇帝侈奢的生活，有时是为了搜刮更多的钱财去满足贪得无厌的士兵。但是，罗马帝国后期，也有懂得爱护商品经济，节俭有为的皇帝，如亚历山大（公元222—235在位）。他即位后，出卖皇室的大部分珠宝以充实国库，下令逮捕娼妓，放逐同性恋者，减轻赋税，把钱借给穷人买地耕田。他的行为引起了军团的愤怒，他本人和他的新政一起倒在了叛乱士兵的刀剑下。一位横征暴敛的皇帝取代了他。② 由此可见，罗马帝国货币贬值的根本原因是帝国财政日益困难，税收一天天减少。没有足够的税收，军事结构就会即刻瓦解。因此，货币贬值、横征暴敛只是在税收不断减少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的措施罢了。

那么为什么在帝国兴盛之际，国家能够从奴隶

① 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10卷，第292页。
② 同上书，第284—28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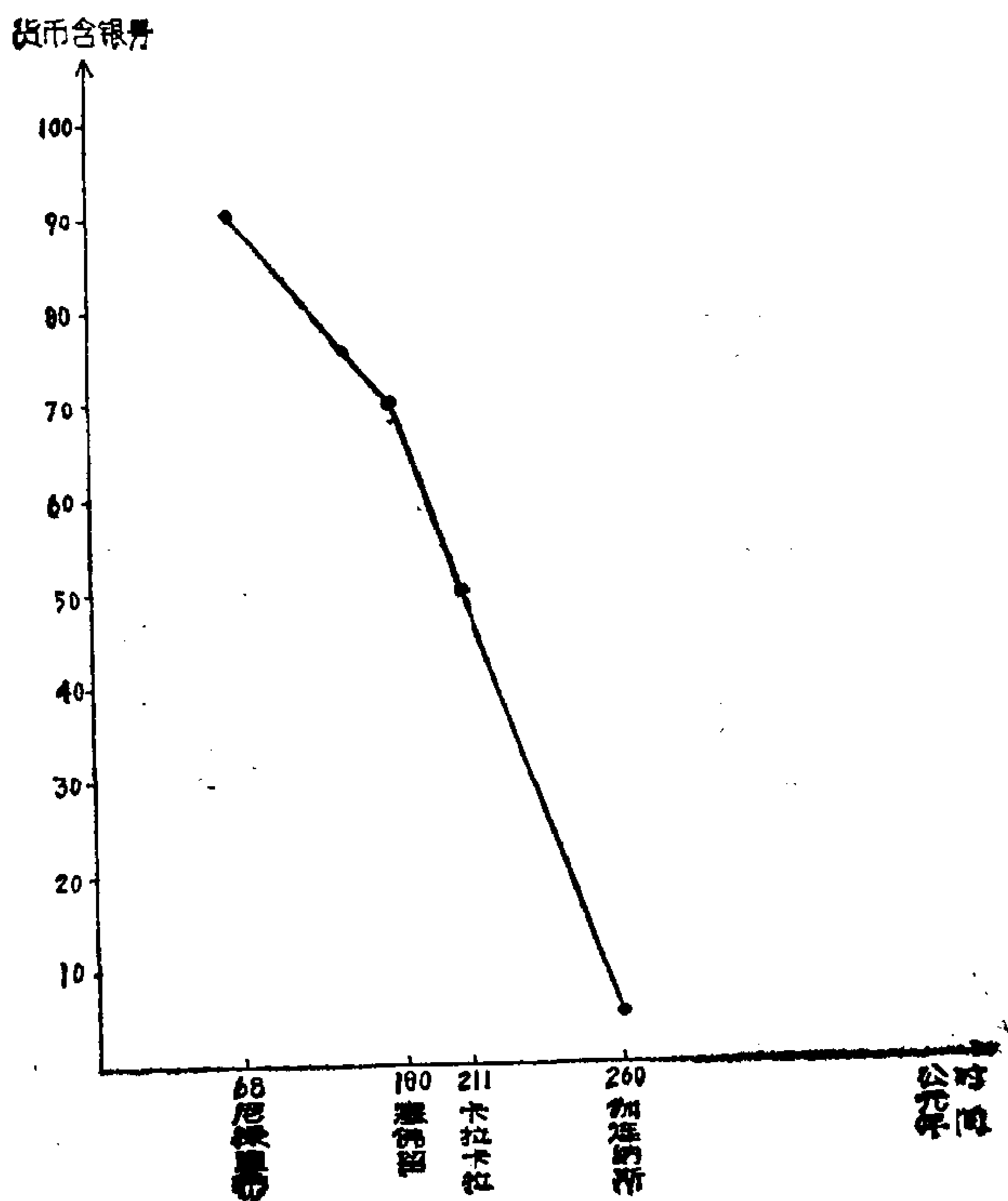


图3.1

制商品经济中得到足够的税收以供养军事机器，而到公元二世纪以后，要想做到这一点就一天比一天困难呢？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商品经济在漫长的运行中会产生一种积累性的变化，那就是土地兼并。财富愈来愈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我们知道，竞争性的商品经济自发地倾向垄断资本。在古代奴隶制商品经济中，土地是最重要的资本。奴隶制商品经济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带有无法消除的胎记——土地兼并，并且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土地兼并必然越演越烈。我们在上一章分析了罗马共和国时期奴隶制商品经济的发展如何导致自由农民的破产，在帝国初期，土地集中的倾向已不可阻挡，小农经济在整个经济结构中已不占主导地位，到处盛行的是奴隶主经营的“维拉”型中小地产。这种地产一般有几百犹格，每个庄园用几十名奴隶。①它的盛行标志着大批奴隶主中产阶级的兴起。“这些地产的所有者属于城镇人口，属于城镇的中产阶级或地方的劳动阶级。根据著作家及铭文的一般记载，罗马帝国的繁荣似乎主要是由于中小地产的耕作，至少公元后头两百年是如此。”②然而，“维拉”型地产的命运和自耕农经济一样，终究要被更大的庄园地产所取代。这就是“拉蒂芬丁”型地产。山南高卢维列依城发掘出来的铭文

① 参见林敦明何芳济《论罗马共和时期土地所有制的演变——兼谈共和制灭亡的原因》，载于《山东师大学报》1983年第5期。

② 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64页。

为我们提供了从“维拉”型地产到“拉蒂芬丁”型地产的兼并过程的史料。“拉蒂芬丁”型地产一般有数千犹格，拥有几千名奴隶，并建立起一个犹如政府般的庞大管理系统。

我们可以考察一下，当几十个，乃至上百个“维拉”型地产合并成一个“拉蒂芬丁”型地产时，帝国的税收会出现怎样的变化。原则上，帝国的税收不应有变化，因为税收是根据地产的大小来计算的，按生产量的比例征收的。其实不然。大地产交付的税收小于与它面积相同的众多的“维拉”型地产。无论罗马帝国政府实行包税人制度，还是利用帝国税吏，都有一个无法克服的弊病，那就是政治权力基本掌握在大奴隶主手中。各地的巨富无论从经济力量上讲，还是从政治力量上讲，都在地方自治中占主导地位。这些大奴隶主总是千方百计地逃避或减少自己所应交付的税收。他们常常作为包税人把税收转嫁到中小奴隶主身上，或者行私贿赂，趁人之危进行兼并。到公元二世纪末期，大量的文件反映了各省行政长官对富豪僭窃政权的诉苦。到帝国后期，政府不得不改革包税人制度，而

代之以税吏，但大领主们请税吏吃碗闭门羹，可谓是税吏的家常便饭。

土地兼并带来直接税的减少，帝国不得不把部分损失转嫁到间接税上。在帝国鼎盛时期，间接税主要是关税、售货税、遗产税等。关税一般是2%，只有对少量的侈奢品才征以12%的重税。到了公元四世纪，关税普遍上升到12%，使从事长途贩运的中小商受到重大打击！① 商品经济几乎被沉重的关税所窒息。帝国后期，一系列导致商品经济瓦解的因果循环链启动起来。

“拉蒂芬丁”型地产仍不是土地兼并这匹脱疆野马的终点，随着时间的流逝，它又被更大的奴隶主庄园所取代。“拉蒂芬丁”型地产变为“萨尔图斯”，一种更为庞大的世袭领地。世袭领地不仅是一个经济实体，由于雇佣人数和奴隶成千上万，管理权的无限膨胀，它已经成为一种政治实体。庄园俨然是国中之国。帝国后期很多公共行政权转移到这些大奴隶主私人手中。按照狄奥西多法典，法官不得进入私人土地开庭审判。如果有犯人需要逮捕，执行逮捕的人，不能是国家官吏，而是大奴隶

① 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1页。

主的管家。国家不仅很难从大领地中得到税收，而且几乎失去了对大领地的支配权。① 领地本身的经济实力已强大到实行自给自足的程度。法国一些地区的地名至今还保存着这些庞大领地的历史痕迹，它们往往是用奴隶主的名字来命名的。这些地区连成一片，甚至内部还出现市镇。每个大世袭领地都有工场商店，在领地上生活的人们不需要到领地以外的城市去购买必需品。

当帝国的版图日益被这些规模越来越大的世袭领地所覆盖时，拥有地产的人却越来越少了，税源势必枯竭，唯一的解救办法是更彻底地榨取已经奄奄一息的城市。倒霉的又是那些商人、手工业者和中小奴隶主。帝国后期，政府甚至占取城市的公地，拍卖给周围的大奴隶主。这显然是杀鸡取蛋之术。城市是商品经济的基础，皮之不存，毛之焉附？随着中产阶级商人的衰落，不仅城市平民、小商人、奴隶跑到大奴隶主庄园中请求庇护，甚至城市内的官员和公职人员也不得不逃亡。帝国后期不得不颁布法律，规定地产在25犹格以上的市民必须充当城市议员。然而无论谁当议员，即使倾家荡产

① 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43—60页。

也不可能交齐帝国摊派的税收，唯一的办法就是逃亡。于是人们故意贬低自己的社会地位以免被选任公职，有的改业务农，有的出家为僧。最后君士坦丁不得不规定，凡能胜任市政职务的人，不准做圣职人员。政府象逮捕逃税、逃兵役的人一样，逮捕那些不愿当官的人，强迫他们回城市去为政府做事。甚至还明文规定，议员的儿子必须再当议员。①

我们知道，商品经济必须以城市和非自给自足性的生产单位的存在为前提。但是，商品经济带来的土地兼并却在不断挖去自身的基础。"维拉"型地产本来是不能自给自足的，它必须依赖商业而生存。但商品经济的法则决定了它必然为更大的地产所取代。"拉蒂芬丁"型地产向自给自足跨出了一步，它庞大的生产管理系统包含了行政自主的可能性。"萨尔图斯"及进一步形成的世袭领地则发展成自给自足的小社会。帝国后期，到处可以看到庄园吞没城市的历史过程。最后，罗马帝国的城市消失在世袭领地之中。崛起于都市化基础上的罗马帝国文明，却在野蛮的乡村里找到了自己的墓地。

如果我们以土地兼并程度为横坐标，以商品经

① 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10卷，第342页。

济的发达程度为纵坐标，就可以得到一条拱型曲线。罗马帝国的商品经济和城市发展好象在爬一座山坡，一旦过了顶点，土地兼并就把矛头对准商品经济自身了。奴隶制商品经济被它自己发展所带来的后果消灭了。

在罗马帝国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中，甚至在各个子系统结构内部，我们都可以看到自我毁灭的过程，整个结构在互相维系、互相调节的运行中被自己造就的结果破坏。例如，庇护制的兴起与帝国国家权力的丧失互为因果，导致大领地奴隶主纷纷独立。这难道不是“罗马法”自食其果吗？法律是罗马政治结构对社会生活进行调节的主要手段。为了使奴隶制商品经济得到繁荣，为了使商业贸易得到保障，罗马帝国必然要用法律的形式来规定奴隶主对隶农私有财产的占有权，强调奴隶是奴隶主的财产，维护奴隶主对奴隶的无限支配权。既然如此，当一个大世袭领地的奴隶主拥有成千上万的奴隶和隶农时，那他用自己组织的小政府来管理他们也是合法的，庇护制更是合理的。由此可见，大庄园发展成国中之国，导致帝国政府职能的衰落不也是罗马法长期实行的必然后果吗？

强大的罗马军团之所以成为帝国的支柱，要归

功于雇佣兵制度的实行。直接依靠金钱是罗马军团的组织手段。恰恰是这个制度本身逐步腐蚀了军团的素质，金钱使士兵贪得无厌，它们热衷于掠夺城市，对征战越来越没有兴趣。军营中组建了家庭，驻地内办起了饭店，到处开设妓院，士兵们完全失去了尚武精神。罗马帝国的公民如此衰弱，以致不得不在蛮族中召募士兵。就连罗马大道都难逃这铁的法则，四通八达的大道所提供的交通便利反过来成为加速帝国灭亡的因素。它使得蛮族可以迅速地深入帝国的纵深地带。大道周围的盗贼比其它地方的盗贼更为猖狂。日耳曼人入侵高卢地区时，一举摧毁了大道旁的60座城市，市民和乡民不得不远离罗马大道，到荒僻的地区去寻找新的住所。①罗马大道提供了发达的交通，同时也带来不停的动乱，最后人们不得不抛弃它。

我们无须列出所有破坏因素增长的过程。有一点是十分明显的，商品经济、罗马法、帝国军团，它们一开始就构成了一个互相调节的系统，保持着整个社会结构的功能耦合，但是它自身的发展却难免导致一些破坏因素的积累，这些因素在短期内几

① 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10卷，第293页。

乎看不出来，人们无法发现它对社会结构的损害。土地兼并不可能在几年内破坏商品经济；雇佣兵也不会在短期内失去尚武精神；制定罗马法的人绝不会想到庇护制的出现。然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这些因素积累起来。开始，它们象水滴一样浸蚀罗马帝国社会结构的石壁，石壁慢慢出现了裂缝，水滴汇成细流，当石壁一块块地倒塌时，细流变成了洪水，最终冲垮了罗马帝国社会结构的大厦。

3-3 没有万古长存的帝国

如果我们对社会结构适应态被破坏的过程进行宏观的跨越社会形态的比较，就会得到一个普遍成立的结论：组成社会的各个子系统在其本身漫长的运行中，在彼此间相互协调的稳态中，都会不断地释放出某种对结构本身有害的东西，导致功能耦合的松弛，最后破坏社会结构的适应性。不仅罗马共和国，罗马帝国如此，就是中国的封建社会也不例外。

中国封建社会各个子系统间相互调节的方式与罗马帝国完全不同，中国封建王朝崩溃的原因同罗

马帝国灭亡的原因也不同，但社会结构的适应性被调节功能自身释放出来的毒素所破坏却如出一辙。

中国封建王朝鼎盛时期，政治结构与经济结构之间相互调节的功能是耦合的。地主经济结构中有大量自耕农存在，就能够维持政治结构运转必需的税源。然而地主经济结构自身不断释放着腐蚀功能耦合的因素，这就是土地兼并。自耕农不断地沦为大地主的佃户。原则上讲，地主应按土地的面积向国家交纳田赋。但是与罗马帝国的情况类似，这些大地主不仅是乡间的巨富，而且身兼大商人或国家官吏，往往是本地豪强。他们总是依仗着政治、经济特权偷税逃税，把税收转嫁到自耕农和 佃 户 头上。正如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所说，有的朝代偷税逃税占总额的十分之七、八。随着土地兼并的增长，封建王朝的大量田赋、徭役负担完全压在越来越少的自耕农头上，促使自耕农迅速破产。大批的自耕农转化为地主的佃农。而地主地租的剥削往往比封建国家的田赋重数倍。于是，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爆发，功能耦合的破坏导致封建大一统帝国的瓦解。

虽然中国封建社会中经济结构是地主经济，土地兼并表现为自耕农失去土地，与罗马奴隶制商品

经济中的土地兼并性质是不同的，后者是大量中小奴隶主庄园和城市中产阶级破产。（自由农民在罗马帝国经济结构中不占主要地位，尽管土地兼并也包括自由农民失去土地。）但功能耦合机制的破坏过程却惊人的相似。中国封建政府在一部分自耕农担负不起田赋而逃亡以后，把他们的田赋额转嫁到另一部分自耕农的头上，这在历史上称为摊逃。罗马帝国同样把逃亡税户头上的税额转嫁到其余中、小奴隶主、中产阶级商人的头上。二者都促使自耕农或中产阶级的进一步瓦解。罗马帝国后期曾一而再、再而三地颁布严禁逃亡的法令，到戴克里先时期，把所有的市民、奴隶都冻结在他们所从事的职业上，剃头匠的儿子还当剃头匠，工匠的儿子还当工匠①。一切都是为了保证帝国的税收不再减少。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央政府也一再加强地方户籍制度，每年都派官吏对农民的土地进行调查登记，甚至连每一块田地中种几棵桑树都要明文规定。罗马帝国在税源枯竭时，不得不发行含银量极低的货币，强迫人民接受它的币面价值，但赋税却要用金银和实物。这就是帝国后期臭名昭著的“金银税”

① 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上古部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67页。

制度。中国封建王朝后期何尝不是如此呢，朝廷大量发行劣质货币，物价飞涨千百倍。元朝后期买东西时纸钞车载斗量，但百姓的赋税却大多要用实物和金银来交付。罗马帝国和中国封建王朝的这些措施和后果是相同的，都是在饮鸩止渴，这只能加剧危机，促使功能耦合彻底破坏。

人们会问，为什么破坏功能耦合的毒素积累是不可遏制的呢？社会做为一个功能上相互调节的系统，总是有能力调节子系统出现的各种偏离现象，它有巨大的内稳定机制和应变能力。正是它调节和控制了各个子系统内在的变化趋势，避免了自我崩溃，保持了结构的存在。为什么这种调节能力对慢性积累的毒素破坏功能耦合却无能为力呢？原因是深刻的。这些毒素的增长之所以是不可遏制的，就在于它们不是系统内一般的不稳定趋势，而是调节器在调节中自身释放出来的破坏力量。它是一种自我摧毁的力量，是调节器本身老化朽坏的过程。正因为如此，结构自身的调节能力和愈合能力对它不起根本作用。

无论是罗马帝国的奴隶主庄园的兴起，还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土地兼并，都是系统调节功能自身带来的破坏因素。我们知道，在西欧封建社会的领

主经济中，自耕农大量地农奴化，土地兼并的情况不明显，至多是地产和农奴一起转移。然而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用儒生组成的官僚系统去保持中央集权，限制地主与农民之间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化，从而保持了地主经济的稳定。然而，它既然创造了地主经济稳定的环境，就必然带来土地兼并的根源。首先，它使经济结构中存在着大量小土地所有者，其次为了维持官僚系统的存在，必须建立一些城市，发展相应的商品经济，允许土地自由买卖，这样，就使土地兼并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也就是说，土地兼并之所以不可能克服，正因为它是社会结构功能自身呼唤出的魔鬼。

对罗马帝国来说，当埃及总督路韦·派索不承认维斯帕西安罗马皇帝的地位时，罗马皇帝用行政力量罢黜了他。当塞普替金斯·塞佛拉斯在非洲登基后，封闭港口而引起了罗马本土的粮食危机时，罗马皇帝派遣军队镇压了反叛。对于这些变化引起的不稳定，罗马帝国可以用政治结构的调节力量来对付。但是，当商品经济带来的土地兼并在尼禄王时代使六名奴隶主占了非洲半数以上的耕地时，帝国政府却只能听之任之。因为它是奴隶制商品经济必然带来的东西，社会依靠奴隶制商品经济而存

在，因而罗马政府只好任凭大奴隶主们在自己的庄园内执行司法，征集赋税，维修公路，甚至制定法律，限制政府，随心所欲地发动战争。

中国封建社会为了保持对整个社会的控制调节，发展起一套庞大的官僚机构。结果带来另一个危机的根源，即官僚机构日益膨胀腐败成为中国封建王朝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功能耦合破坏的重要原因。王朝初期的官员只有几万，吏员也只有十几万，经过二、三百年的运行，官僚机器被贪官污吏淹没了，到了王朝末年，官员达到十几万，吏员则几十万，朝政败坏、机构瘫痪，加剧了社会的各种危机。①

罗马帝国的政治控制主要靠军团和法律。但法律对自身带来的弊病又有什么办法呢？从调节器自身老化这一点来看，罗马帝国的法律很像中国封建王朝的官僚机构，一天天处于膨胀和失控之中。罗马帝国最初实行十二铜表法，后来发展到民法，帝国后期，法令政策多不可数，使百姓处于摇手触禁的程度。不仅每个人的职业由法律固定，萝卜、橄榄、葡萄的价格也由法律固定，工匠、雇工和船夫

---

① 参见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第三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的工资也由法律固定。①法律本身是保持契约社会及自由经商的，而规定物价本身就直接破坏了商品经济。法律本来是维护帝国统一的，而对奴隶主利益的维护却成了庇护制成长的原因。罗马法律培养了它自已不能进入的禁区，只好无可奈何地看着日益独立的奴隶制大庄园瓦解了帝国的统一。后来，罗马帝国实行了行政改革，企图用官僚机器代替法律，但是立刻又带来了官僚机构的膨胀的弊病，帝国所需用的官员和经费超过预算的一倍以上。由于农村盗贼盛行，狄奥多西一世设立了一种农村警官，即“治安维护者”，到了公元409年狄奥多西二世即位时，这种警官本身就干起盗贼勾当来了，所以不得不取缔它。最后，企图用官僚机构来控制全国的尝试失败了，不得不把治安权委托给大领主本人。②

读者或许会有一个疑问，罗马帝国和中国封建王朝的崩溃在机制上所表现出来的一致性，是不是因为“商品经济引起的土地兼并”在两个社会都存在，因而使功能耦合的破坏表现出某种机制上的共同性呢？我们再来看查理曼帝国的瓦解过程。在这

① 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10卷，第306—307页。

② 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58页。

个社会系统中，商品经济的因素几乎不存在。而它瓦解的原因从功能耦合的角度来看，与中国封建社会和罗马帝国完全一样，都是调节功能被自身释放出来的毒素所破坏。

查理曼帝国的政治组织相对比较简单，首先它是一部军事机器。帝国是靠武力征服建立起来的，因此也是靠武力来维持的。随着国家军事武装的瓦解，帝国陷于分崩离析的状态。众所周知，自从查理·马特进行采邑改革以后，国家强大的军事力量就建立起来了。查理采用有条件采邑分封代替了贵族无条件的土地赏赐，接受采邑的领主要向国家提供相应数量的骑兵。“这样一来，豪绅显贵本人也成了国王的佃农。”① 我们从功能耦合的角度来分析军事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关系，可以得到图3.2。查理曼帝国的兵源一靠大量的自由农民，二靠领主提供的骑兵。由于当时商品经济已普遍衰落，国家只能用赏赐土地的办法报答贵族的服役。军费同装备只能由领主及自由农民自备。这种组织方式在短时间内是功能耦合的，帝国的经济结构所提供的经费和兵源都不成问题，强大的军队组织起来了。通过连续不断的征战建立了幅员辽阔的帝国。但恰恰又是“征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548页。

战”和采邑制度本身使整个社会系统遭到了破坏。

据史料记载，“法兰克人的习惯法要求一切自由人都去参加打仗；不去打仗的人就不再被当作自由人看待。”①但是对于一个自由农民来说，征战的包袱是难以长期担负的。一年四季的战争使他延误农时，脱离土地，最终不能同领主经济抗衡。当时装备一个战士相当于45头牛的价值，还要自带6个月的军中给养。②战争必然使自由农民破产，沦为农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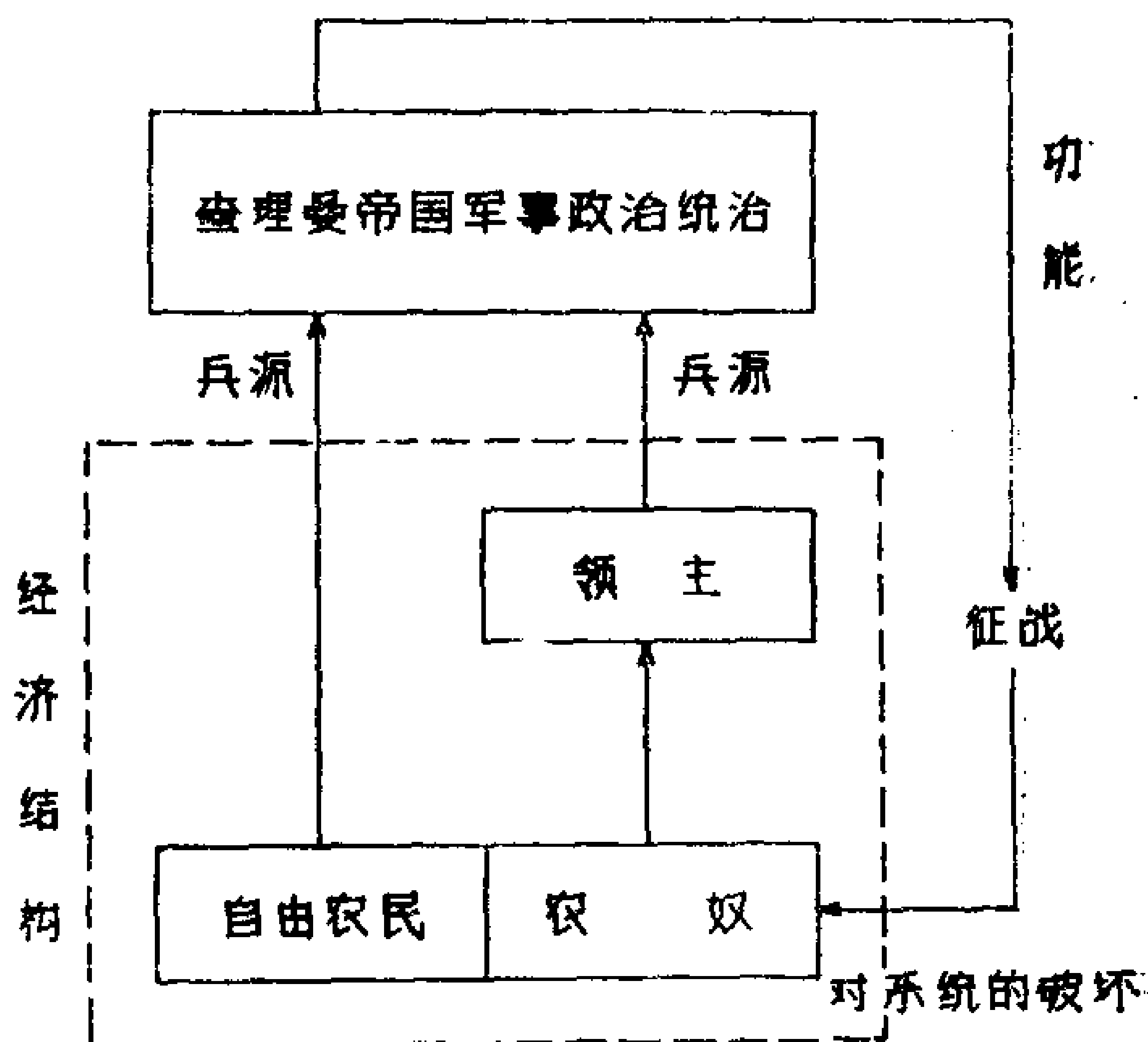


图3.2　查理曼帝国政治经济结构

恩格斯精辟地指出：“法兰克的人民大众，即占有土地的自由民，也由于连年内战和征服战争，

① 瑟诺博斯《法国史》，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63页。

② 《查理大帝勒令》，载于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中古部分，第38页。李运明《试论查理曼帝国瓦解的原因》，载于《安徽师大学报》1983年第2期。

特别是查理大帝时期的征服战争而弄得疲惫不堪和彻底破产了。这种起初构成全部军队，而在征服法兰西地区以后，又构成军队核心的农民，到9世纪初，已穷困到5个人之中难得抽出一个人出去作战了。”① 巴黎郊外圣热尔门—德—普雷修道院的地产登记册中，记载了查理曼时代自由农民迅速破产的情况。在这个修道院的领地上，住有2788户人家，其中2080户是隶农，35户是半农奴，220户是奴隶，只有8户是自由的佃农。②

查理曼帝国功能耦合被破坏的另一个原因是贵族化倾向，农民对封建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不断加强，逐渐演变为农奴，宫廷中大臣、武士、侍从则成为世袭领主。贵族化和农奴化同样是这种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必然带来的后果。商品经济的低落是查理曼帝国经济结构的重要特点，它和采邑制度一起成为贵族化、农奴化的根源。自由农民的消失，使帝国军事机器不得不完全依赖领主。领主的庄园可以由农奴耕种。他们自己的全部时间都可以用于战争。结果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战争迫使国王不得不过分依靠领主，而领主的强大又制造出无数的

①②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0—151页，第152页。

战争。由于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国王无力给部下发放薪俸，赐与地产是国王用来组织国家机器的唯一办法。在这种经济结构中，官僚机构是没法建立的，所以自由农民的消失必然伴随王权的衰落。领主权力和私人武装日益强大，帝国终于瓦解。整个西欧陷入封建领主的混战之中。

调节器在自身调节中的毁坏还可以从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上清楚地看到。奥斯曼帝国的社会结构在整个中古时代是颇为奇特的。它的政治结构基本上是采邑和军功封土制。一般说来，这种军事封土制是不稳定的，它会导致贵族势力的增长，农奴化会使大一统政权瓦解，就象查理曼帝国的瓦解那样。但奥斯曼帝国建立了一种调节器来控制贵族化导致的分裂倾向。这就是被汤因比称为“牧人人”的制度。“牧人人”是帝国的卡帕库卢（宫奴）。他们是从被征服的臣民、农奴和奴隶中挑选出来的。他们在幼年时代即为苏丹所集中，终生不得结婚，不能从事商业和手工业，整天从事各种训练。其中一部分组成统治全国的官僚机器。据记载，从穆罕默德二世起，除了司法部以外，中央迪万（国务会议）中所有的职务都由“牧人人”出身的人垄断。“牧人人”制度组成的国家机器有效地维护了国家

统一，防止了领主割剧。虽然奥斯曼帝国中领主的力量很强大。皇室、高级文武官员的禄田、军功人员的土地占去了国有土地的80%。十五世纪末，全国有一万个采邑，战时可以提供6万名骑兵。帝国几十万军队有十分之九是封建采邑提供的。但是，仅占十分之一的由“牧人人”组成的中央军却非常精锐，它的存在有效地抑制了封建主的割剧。奥斯曼在数百年内曾迅速地扩张了版图，却也不能长治久安，尽管它使东欧封建国家闻风丧胆，却仍然不能抗拒调节机器自身一天天地老化。正是“牧人人”制度使奥斯曼帝国后期各种弊端层出不穷。

在奥斯曼帝国衰落的历史上，我们看到衰落与“牧人人”制度的弊病的积累是同步的。帝国用“牧人人”来管理朝政，抑制分裂、组织军队，但却无力防止“牧人人”自身的衰落和腐化。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如果我们看到奥斯曼帝国前十位苏丹聪明有为，但这一支其余的统治者却又个个那样无能、堕落和不称职……，事情并非出于巧合，而可以就其实行的一种抚育和选择制度来加以解释，这种制度实际上是不可能产生出任何有作为的统治者来的。”因此，“在十六世纪时，是一种一丝不苟，认真负责并且具有惊人效率的政府制

度，到了十七世纪时，变得漫不经心，最后到十八世纪时，则归于崩溃了。”①事实上，到了十六世纪中叶以后，由于调节机器的慢慢失灵，分裂倾向开始抬头，帝国就日趋衰落了。

总之，虽然社会形态不同，社会结构子系统的调节方式不同，导致功能耦合破坏的原因是形形色色的，我们却从机制上发现了一个共同的规律，这就是调节功能总会在自身运行中产生破坏自己的力量。在历史长河中，没有一个万古长存的帝国，也没有一个达到适应态后就永远不变的社会。因为任何一个组织都无法抑制这种自我摧毁力量的增长。我们以为这是一条普遍适用的规律。

3-4 适应态破坏的原因：功能异化

“这一只天鹅是白的，那一只天鹅也是白的，凡是我看到的天鹅都是白的。”这能得到一切天鹅都是白的结论吗？今天，科学哲学家一再警告人们，归纳并不等于证明。澳洲就有黑天鹅。因此，

① 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9页。

要证明适应态被破坏的必然性，就要找到理论根据。

自我调节功能被调节结果所破坏，最后导致系统出现不适应态，是一切功能耦合的组织系统共有的规律。生物体是一个严格的功能耦合系统，但是，即使没有外来伤害，也没有一个生物体可以长生不老。某一物种与环境构成一个生态功能耦合系统，但它们之间的适应性无一不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破坏，造成灭绝或进化。

现在，我们从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考察一下功能耦合系统中各个子系统相互调节的能力为什么会一天天丧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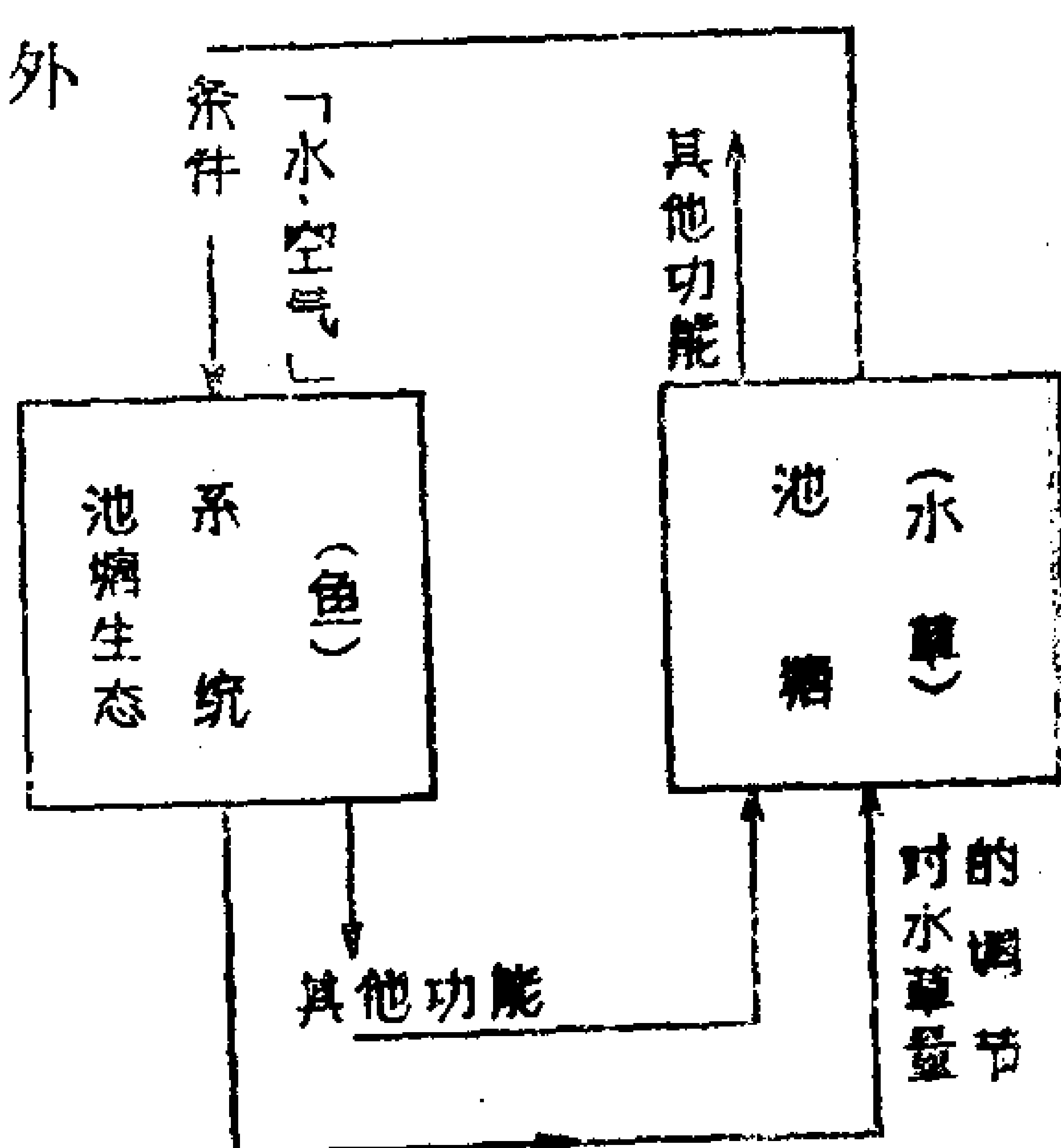


图3.3　池塘生态系统

图3.3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池塘生态系统，其中有水草和鱼虾。水草和水中的氧气是鱼虾生存的条件。这些条件恰恰为池塘水草子系统的功能所提供。同样，池塘水草子系统的存在也需要鱼虾子系统的

功能来调节。鱼虾以水草为食物，否则水草有可能出现无限繁殖，最终盖满整个水塘，造成生态系统的崩溃。在这个十分简单的生态系统中，我们可以看到，功能耦合形成了一个适应态，系统可以稳定存在几十年、上百年。但这种适应态能否永远保持下去呢？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池塘变得越来越浅了，水越来越少，最后池塘完全被泥填满，变成沼泽。由池塘、水草和鱼组成的生态结构瓦解，别的生态结构取而代之。这在生态学中称为沼泽化。分析沼泽化过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任何一个功能耦合系统在互相调节中会导致破坏性因素的积累。

沼泽化的原因是池塘内有机质的沉淀。这些有机质是整个生态系统在保持功能耦合的调节中释放出来的。鱼、虾的排泻物，鱼、虾死亡和腐烂的水草都变成有机质沉淀下来。这些东西在每天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不会影响整个系统的 功 能耦 合。然而，通过上百年时间的沉淀，就会出现沼泽化，把池塘填平。只要系统中有生命存在，就无法阻止有机质的积累。我们把沼泽化原因的分析提高到系统组织理论水平来看，调节功能丧失的原因就容易理解了。关键在于，组成一个大系统的各个子系统的功能都不可能是单一的，每个子系统都有很多种功

能，即使对于子系统的某一种功能，也常常由很多不同的方面组成。这些不同的功能以及某一功能的不同方面是不可分离的，比如水草这个系统，有提供给鱼虾食物和氧气的功能，也有增加池塘中有机质的功能。生命系统的结构决定了这两种功能总是同时存在的。当子系统形成了相互适应的大系统时，只能做到某几种功能互相耦合，或者某种功能的某几方面互相耦合，而每个子系统复杂的功能不能全部参与耦合，对于不参加耦合的其余部分，只要暂时没有害处，就不会影响大系统的组织。但是，正因为它们没有实行功能耦合，必然对子系统结构产生影响，这种作用虽然很小，但会慢慢地导致各个子系统结构发生畸变，子系统结构畸变到一定程度，那些互相耦合的功能就会受到损害，正如有机物的沉淀逐步改变了池塘结构那样，畸变的结果最后导致适应态的破坏。我们把组织内部没有实行耦合的功能慢慢使结构畸变，最后破坏那些互相耦合功能的现象称为“功能异化”。众所周知，异化是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经典作家运用它表达自然界的这样一种普遍现象：事物的性质慢慢被这种性质本身带来的结果所改变。无疑，我们用系统结构和功能分析对它做了精确的说

明。在研究社会结构演变的规律中，它有重要的作用。因为，社会结构各个子系统功能的异化是适应态被破坏的重要原因。

社会结构是由许许多多的子系统组成的，每一个子系统都是一个复杂的组织实体，它必然具有众多的功能，即使对于某一种功能，也往往具有很多方面，因此，当子系统互相耦合组成社会结构时，不可能使每个子系统所有功能和每一种功能的所有方面都互相耦合起来，必然有很多功能是互相不耦合的，因此，功能异化将不可避免。举例来说，工厂是经济组织中的子系统，只要它生产社会必需的产品，就必然与经济结构其它子系统实行功能耦合。但是工厂这一个子系统绝不可能只有这样一种功能，它除了具备生产社会必需的产品这种功能外，必然有许多其它功能。因为工厂由许许多多的人和设备组成，人和物的集合必然带来其它方面的行为。比如工厂会影响附近居民区的社会风气和购买力等等。即使对于生产产品这一功能本身，也是由很多不可分离的侧面组成的，生产任何一种产品都会带来一些副产品，出现废料处理问题，功能的这些方面如果不实行互相耦合，虽暂时不会危及经济结构的稳定，但是它们的长期作用会带来一系列积

累性的不可逆变化。废气与污水的积累会破坏环境，这类问题发展到一定程度，经济结构各个子系统的适应性会受到影响。对于工厂这些相对简单的子系统来说，我们在组织经济结构时，可以尽可能使它各种功能都互相耦合。但是，由于社会结构子系统功能极为复杂，它的每一种功能所涉及的方面都极为广阔，要使一切功能和任何一种功能的一切方面完全实行耦合，这是做不到的。社会组织只能让其中部分互相耦合，互相调节，而其他更多的部分暂时无害，就不会妨碍社会结构的形成，因此，时间一长，功能异化就必然出现，而且社会组织越复杂，功能异化也就越快。

中国封建社会中，每当新王朝开始时，必须建立一套官僚机构，用它管理郡县、征集税收，调解民事，防止割据，这些功能对社会其它子系统的稳定是必不可少的。整个官僚系统的结构也是根据这一功能设计的。但为了形成这些功能，就要把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组织起来，这种组织必然同时具有许多其他功能。比如，儒生既是国家政策的执行者，又是封建特权的享受者。于是就有贪赃受贿、假公济私的可能性。在王朝初期，这些功能不占主要地位，整个官僚机器能够同社会结构实行耦合。

随着时间推移，贪官污吏利用手中的权力营私舞弊也就严重起来，土地兼并的程度也加剧了。土地兼并的积累反过来侵蚀官僚机构，使整个机构日益腐败，最后官僚机构就发生了畸变，破坏了整个社会结构的功能耦合。

再例如，皇帝利用身边的宦官监督官僚机器，以宦官来放大皇权。太监本来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他们具有从外部监督整个官僚机器的功能。但这种功能必然有另外一个侧面，这就是太监在利益上与儒臣有天然的矛盾。宦官可以为了自己的私利打击儒臣，让皇帝疏远大臣，提拔亲信。所以，历史上凡是皇帝能够控制太监的时候，只是利用了太监功能的一个侧面。当另一个侧面暂时没有显露出来时，宦官确实可以放大皇权，起到调节作用。但久而久之，功能的另一个侧面必然表现出来，整个官僚机构会由于它的作用加速变形，造成宦官专权，朝政越来越腐败。最后，整个官僚机器完全毁坏。

同样道理，印度莫卧尔王朝为了保持帝国的统一，必须依靠各级柴明达尔去征收赋税。但是，无论是大柴明达尔，还是中、小柴明达尔在实行这项工作时，都要同时附带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千方百

计地把由他们负责管理和征税的地区变为自己的世袭领地。这种功能久而久之就使柴明达尔从国家税收者异化为土地占有者，封建割据代替了统一政权。①

功能异化也可以在意识形态结构中表现出来。印度的童婚习惯就是印度教功能异化的一种结果。印度教教义本身虽然没有规定童婚，只是着重强调了结婚成家。印度是一个重视来世的民族，强调结婚成家的目的显然是调节社会生活。然而一旦成了教规，上了教律，作为由宗教主张的生活准则，除了限制人们的活动外，它的功能必然有另外的一面，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准则。因此印度妇女在很小的时候就担心自己嫁不出去，久而久之就出现了童婚的习俗。

总之，为了一个系统具有某种必需的功能，必须有相应的结构和组织方式。结构和组织方式总是比较复杂的，因此，结构带来的功能也必定是复杂的，甚至总会带有一些附加功能，它们不能全部实现功能耦合，这几乎是铁的准则。这一点，对调节器的调节功能来说，特别明显。在社会结构的调节

① S.努鲁尔·哈桑《莫卧儿时期的柴明达尔》，载于《世界历史译丛》1980年第6期。

器中，尤其是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结构对经济结构的调节，基本是靠法令和政策来实现的。任何一种调节方式，乃至任何一项政策法令都有功能异化的特点。政策和法令是人为的一种规定，它告诉人们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它是为达到一个具体目的而设计的调节手段。但任何一个政策、法令的影响都是多方面的，它除了针对调节对象所需的目标外，必然有附加性的影响。只要它那复杂的多方面影响在短期内无害，这个法令就是有效的。然而政策和法令长期实施的结果，附加性的影响就会变得大起来，出现了制定政策法令的人根本考虑不到的后果。

公元98年，罗马皇帝图拉颁布法律，规定元老议员须将三分之一以上资财投资于意大利的农业。①目的是解决当时意大利的农业危机。他绝没有想到，若干年后，意大利的土地集中到了少数人手中，出现了一个政府难以控制的大奴隶主集团。十二世纪时，英国国王亨利二世颁布法令，强行推行农奴化。他的目的是加强农奴制，把原来属于国王的臣民变成领主的依附者，使他们不能随便地把

① 翦伯赞主编《中外历史年表》，第143页。

维兰赶出庄园，或任意加重维兰的劳动负担。①以便建立稳定的封建制度。但是，用法律来固定农奴对领主的依附关系，潜含着限制农奴主对农奴的权力。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法令的附加含义在几百年后形成了一种强大的习惯法，竟成为摧毁庄园经济的有效武器。后来，无论经济有什么样的变化，甚至发生通货膨胀，农奴交给领主的地租是永远不变的，结果造成旧领主经济地位的衰落。

也许有人会提出异议，认为政策和法令是可以变化的，当那些附加影响造成的后果越来越严重时，往往就会取消法令或实行相反的政策。人口过剩时，可以实行节制生育的政策，人口减少时，可以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这样，政策和法令的异化就不是不可避免的了。然而，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有些重大政策是和社会结构密切相关的，是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除非社会结构出现更替，这些政策法令是不能任意改变的。在奴隶社会，奴隶主国家绝不会改变把奴隶视为主人私有财产的法令。同样，埃及的法老也绝不会制定没收神庙土地的法令。公元前三世纪，印度的孔雀王朝一反传

① 孔令平《中世纪前期英国的田制与北魏均田制的比较研究》，载于《世界历史》杂志1981年第5期。

统，阿育王在组织国家官僚队伍时打破了种姓制度。这种法令政策之所以能够实行，原因是当时印度社会的结构已发生了变化。在官方意识形态中，佛教代替了婆罗门教；在政治结构中，大一统代替了分裂割据；在经济结构中，商人阶级兴起了。在婆罗门教占统治地位时期，这种改变是绝不可能出现的，历史上也确实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实例。因此，在一种固定的社会结构中，子系统的任何一种调节都不可能以摧毁结构为代价。这样，附加功能导致异化就成为不可避免的必然趋势。此外，功能异化不仅来自子系统之间的调节，而且还来自子系统的内部。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本身也是由许多小组织耦合起来的，这些小组织的功能也会在运行中发生异化。只要有组织存在，就会发生功能异化。只要有生命，就会有死亡。一切成功都包含着失败的痛苦。任何一个组织系统都处在这种组织和无组织两种因素相互消长之中。

总之，我们可以用一般的组织原理来证明功能异化的必然性。

组织必须在功能耦合中相互调节。大组织的形成需要小组织的功能形成各种耦合网络。用简单的实体组成复杂的系统总会遇到一个难以解决的矛

盾，这就是子系统性质的多样性和组织本身的整体性，二者是对立的。一切组织都只能选择子系统的几种性质来形成整体，而不可能使子系统的一切功能都互相耦合起来，子系统的多余性质，那些没有耦合的功能就成了混乱的根源。它们必然造成整个结构的畸变。

3-5 一个比喻：赫胥黎之桶

社会结构的适应性被破坏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这就是：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结构本身将难以容纳在该结构中发展起来的丰富的社会生活。社会结构是固定的，而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流动的。任何一个社会已经形式化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是灰色的，但具有创造力的生活之树却是长青的。

我们做个比喻：社会结构就象英国的议会大厅，它作为一种组织形式，一旦成形之后，就具有固定性。今天英国的议会大厅，自1852年重建之后，始终是老样子。一百多年的历史变迁，对它来说无非是装上了空调机，每个座位都有了话筒，改

善了照明系统，这些都是非结构部分的更新。大厅的容量绝不会再变了。今天英国的下议员有635名，其数目已超过大厅原先设计的席位。这表明，天长日久，社会结构必然被丰富的社会生活所填满。

当社会生活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会与社会结构发生冲突，它是导致社会结构出现不适应的另一个原因。

社会生活的发展为什么会破坏社会结构的适应性呢？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社会结构不是社会生活本身。它是在某一历史阶段中占主导地位的形式化、社会化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和。注意我们的限定：占主导地位、形式化、社会化的关系。生活内容不都是形式化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都是社会化了的。即使形式化、社会化了，也不见得占主导地位。罗马帝国建立以后，不仅把许多古代民族的生活方式包含了进来，而且把他们的宗教信仰都容纳进来了。当时Aristeides·P·Aelinc在《罗马见闻录》一书中写道：“就象地球负载所有的人类，罗马也迎接世上所有的人民进入她的胸怀，就象海洋接纳百川。”在许多民族和城市的大海中，各民族的生活方式是千姿百态的。罗马允许他们各自保持自己的宗教信

仰和生活传统。条件是不能与罗马法律发生冲突。无疑，这些都是罗马社会的生活，有些甚至是社会组织。但他们未必是罗马帝国结构的组成部分，因为它们不一定占主导地位，有些还没有形式化、社会化。据吉本估计，在罗马帝国后期，基督徒大约有六百万，占罗马人口的二十分之一。① 虽然当时基督教势力已经社会化了，但在西罗马帝国，它还不是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那么占主导地位的，已经形式化、社会化了的结构，同不占主导地位的，尚没有社会化、形式化的社会生活有什么不同呢？第一，社会生活比社会结构丰富得多。它們处于不断的流动变化中。而社会结构是相对固定的，不能随意变化的。第二，没有社会结构的支持，正常的社会生活就不能进行。我们只要去考察任何一个社会中的人类生活，都可以发现，社会结构就象一个桶，只有它才能容纳有组织的人类生活。但它只是一个容器，并不是社会生活的全体。古希腊的工场主组织橄榄油的生产，商人做生意，公民兵为城邦作战，公民大会选举执政官，这一切活动都是社会结构各个子系统的组成部分。没有它们，古希

① 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78页。

腊社会就组织不起来。但是，柏拉图、毕达哥拉斯组织学术团体，阿基米德数沙粒，罗马船夫组织行会，这些并不属于社会结构。这是在结构中生活的人们可以自由创造的东西，每一个人一方面在完成社会规定给他们的任务，一方面在创造新的生活。亿万人的活动就象一个创造和发展的洪流。旧的习惯消失了，新的习惯出现了。生活方式改变了，科学技术成长了，这一切虽然都要依附于社会结构，但它们日益增多，必然对社会结构产生影响。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社会结构能否容纳增长了的社会生活？

赫胥黎作过一个比喻：地球上生命的增加，就象往一个大桶中放苹果，苹果放满了，但桶还有空隙，还可以往里加石子，石子在苹果中间，不会使苹果溢出来，石子加满了，还可以加细沙，最后还要加入几加仑水。桶就是生物圈最主要的结构，它们是土壤、大气和绿色植物。苹果、石子、细沙和水是一批批依附在生物圈内的各种生态系统。如果地球上不是首先出现了这个桶的结构，那么整个复杂的生命系统的增加都是不可能的。既然有了桶，就可以往里填入各式各样的东西，其丰富多采与桶的单调形成鲜明的对比。如果说赫胥黎的桶在比喻生

态结构时有些牵强附会的话，那么比喻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却很恰当。

赫胥黎没有谈到不断地往桶里加东西会出现什么后果。如果桶里装的东西有一种内在的不可遏制的增长趋势的话，显而易见，桶迟早会被撑破。社会结构就是赫胥黎的桶，它的适应性会被生活的增长所破坏。

那么，为什么社会结构之桶中的社会生活一定会不断增长，甚至到快满出来时，仍不会停止这种不断膨胀的趋势呢？为了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分析社会结构和它所容纳的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

社会结构对社会生活的关系可以由两方面构成：一是结构的支持作用，二是结构对生活的限制作用。我们前面已讲过，创造社会生活的每一个人只有从这种结构中获得支持，才能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每个人只有从社会组织中获得生活资料，才有可能进行其他活动。资源、经济能力对人口供养的支持、国家对科学团体经费的支持、社会交通通讯对人与人各种交往联系的支持都是这一类。社会结构对社会生活另一类作用是限制，任何一种社会结构对社会生活都有一定的控制，原则上，它只允

许人们进行对结构无害的活动。罗马帝国允许不同民族和各城市自治，但不允许违背罗马法律，更不允许自行组织军队或政党。中世纪基督教也不允许从事异教活动。表面上看，由于社会结构对社会生活有着限制作用，社会生活不会无限增长；当它膨胀到赫胥黎之桶的边缘时，就会碰到社会结构对它的限制，从而放慢速度，最终停下来。但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因为任何限制都有自已不能控制的地方，也就是存在着盲区，而社会生活几乎是无限丰富的。因此，那些正好处于社会结构限制作用下的盲区部分仍会不断增长。

用任何一种相对固定的限制手段来控制一个不断变化的对象时，这种情况是经常出现的。农药对害虫是一种限制手段，但久而久之，尽管提高了农药的浓度，害虫仍在不断繁殖。原因是任何一种农药都不是长期万能的，总会有一些昆虫对它产生抗药性。这就是控制手段的盲区。某一种农药的长期使用还会导致新的害虫。原因很清楚，关键在于被控制对象是个不断发展变化的东西，而控制手段却是有局限性的。农药可以有效地控制没有抗药性的昆虫增长，这样恰恰给有抗药性的昆虫腾出了生长空间，而且昆虫本身会有抗药性的变异。因此，长期使用

固定的调节手段去控制一个不断增长变化的对象，一定会出现那些处于控制作用盲区之中的部分不断增长。社会结构是相对固定的东西，而社会生活却是千变万化的，因此，社会生活中必定有社会结构限制作用的盲区。社会生活越丰富，盲区越大。处在盲区中的部分也就增长越快。

基督教、习惯法和领主对农奴的人身控制，是西欧中世纪封建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一般说来，西欧封建社会不允许与此矛盾的东西无限发展。但是这种限制也有盲区。基督教承认领主对农奴的支配权，农奴的子女还是领主的农奴。从表面上看，农奴和领主关系的确立是无疑的。无论多久，也不会改变其隶属关系。然而这种制度仍有自己的盲区。基督教严禁近亲结婚。而中世纪的庄园规模有限，农奴很难在本庄园中选择配偶，不得不到外面庄园去找。结果一个农奴和另一个领主庄园的农奴结婚，生下来的孩子属于哪一个领主呢？假如生了两个孩子，一个领主就应当分得一个。但基督教规定一般不得拆散家庭。家庭的完整是受到宗教保护的。这样，农奴的子女问题就有可能构成盲区。一代一代繁殖的结果，势必使盲区面积越来越大。

盲区扩大使控制性调节不得不经常改变办法。

但是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和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政策是不能随便改的。发展着的生活就象射出的箭一样不可逆转。已经增殖了的人口不能再消失，历史演变的既成事实不能否认。只要社会之桶还没破裂，它必然越装越满，最后整个系统将被日益增长的自身重量压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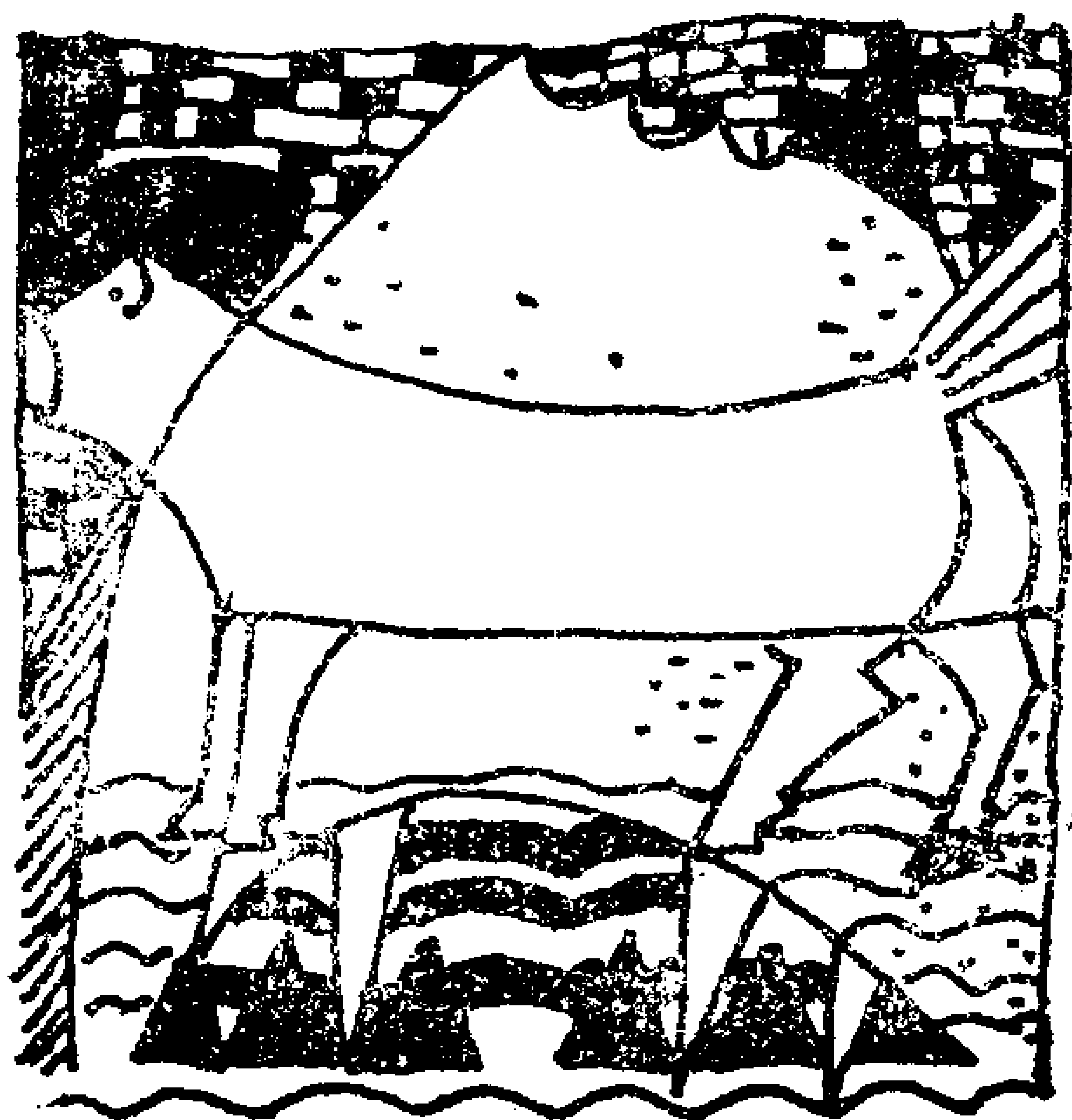
盲区日益扩大，在盲区中的社会生活日益增长，社会结构无法限制它，却还要支持它。它使社会结构的负荷越来越重。一般说来，随着盲区扩大，社会生活不断增长，除了使社会结构的支撑能力越来越紧张外，社会生活对结构没有什么直接的破坏作用。但是，当盲区的扩大一旦超过了极限，就会使社会结构松弛，把整个桶撑破。

罗马帝国在领土扩张中把一个个民族容纳进来。奴隶做为战俘参加罗马生活的时候，对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没有多大影响，随着奴隶的数量越来越多，奴隶制度越来越发展，奴隶的思想及奴隶带来的宗教信仰开始夹杂到自由民的信仰中，一个新来的神祇获得了罗马公民中一部分人的心。最后罗马自身的意识形态被外来之水冲淡了。随着社会生活越来越庞杂，罗马的经济和政治生活对自由民信仰的维持能力日益减弱，各种各样的文化、宗教和信仰

在罗马土地上繁殖起来，支撑能力的变化形成意识形态的变化，不同的学派，不同的价值观念，不同宗教信仰的沉重果实都挂在即将断裂的社会结构的树枝上。

社会结构之桶容纳的社会生活越多、越庞杂，这个桶承受的压力就越大。一方面，社会生活把桶填得越满，越表现出桶的有限性，社会生活就会同桶的容量冲突起来。另一方面，社会生活受到空间范围的约束，本身也容易冲撞起来，发生对立和斗争。这一切都会振荡社会结构之桶。

把本章的思路归结起来就是：社会结构从它建立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了它将来是要毁坏的。毁坏的因素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是结构功能的异化。它是结构自己摧毁自己的过程。再者是附着在结构上的社会生活的增长，它迟早会使相对固定的结构与它容纳的生活不相适应。它表明，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够通过内在的调节力使自己永远处于适应状态，没有万古长存的文明。社会内部永恒地存在着演化的动力，促使其走向不适应，走向新的社会结构。这种内在动力向人们宣告了生命历程的辩证法：凡是产生出来的东西注定要灭亡。



第四章

新社会结构的诞生：西欧封建社会和拜占廷帝国

宇宙间现有的万物都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的结果。

——德莫克利特

4-1 潜组织的成长和取代

二千多年前，老子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哲学思想，他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对于社会结构的组织过程，这一论断十分中肯。“功能耦合”对于社会结构的形式来说是一种“福音”。它使得社会具有自我维系能力，并且为生活在这种结构中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创造生活的框架。但是“功能耦合”同时也埋下失败的种子。“功能耦合”之际，也正是结构慢慢畸变异化之时。破坏

社会结构适应性的祸水不仅因功能异化而积累，还随着社会生活的增长而释放出来。但是，自然界没有纯粹的过程，即使破坏也是如此！当旧结构逐渐瓦解的时候，另一种创造过程也正在悄悄地进行，这就是具有新结构，新功能的子系统的成长。

首先，功能异化从来是一把双刃剑，子系统"结构畸变"固然影响了旧结构的"功能耦合"，但畸变了的子系统结构也是有功能的，因此，对于组织内的每个子系统而言，"功能异化"同时在创造新的结构和新的功能。其中蕴涵着组成未来社会结构的砖块。我们在3.4节中举了池塘生态系统功能异化的例子。有机质的增长、腐杂质的沉淀是鱼、水草这些子系统带进来的附加功能，它们慢慢破坏了池塘结构。但是有机质的沉淀正在创造一个新的子系统，它使池塘变成沼泽，沼泽中的淤泥恰好是青蛙、茅草、芦苇等新的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它在新的系统中执行着重要功能。

庇护制和大庄园的产生，大约是罗马帝国功能异化产生出具有新功能的子系统的最好证据。我们在第三章中详细分析过罗马帝国奴隶制商品经济功能异化的过程。这种异化除了破坏商品经济外，还意味着大世袭庄园的出现，当它们逐渐遍布于整个

罗马版图时，预示着未来社会要由这些具有新功能的子系统组成。

赫胥黎之桶中社会生活的增长同样蕴涵着新组织的形成。当罗马帝国把一个又一个被征服的民族容纳进来时，形形色色的古代宗教也被包容进来，并开始在帝国结构中成长。基督教一开始并未被罗马帝国看重，因为它同高卢人、埃及人、撒克逊人所信奉的古代宗教一样，只是社会结构之桶所盛的许许多多东西中的一种。但是，又有谁想得到，数百年后，它竟发展成取代罗马帝国的新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趋向灭亡的社会好象一个巨大的墓地，未来结构的胚芽在旧结构机体腐烂之时就开始在这个墓地上生长。旧结构内部的功能异化愈是剧烈，每一个子系统的结构畸变愈是明显，畸变后产生新功能的子系统往往就愈多。同样，社会结构这一只赫胥黎桶盛得愈满，它就蕴涵着更丰富的未来结构的砖块。因此，与旧结构适应性破坏过程同步，存在着一个形形色色的具有新功能、新结构的系统创造过程。

旧结构的调节功能瓦解了，具有新功能的子系统出现了，这是不是一定会有新结构取代旧结构

呢？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根据社会结构调节原理，新结构的形成必须使各种具有新功能的子系统实行功能耦合，组成新的适应态。因此，新结构子系统所具有的功能首先要有用，它可以用来组成互为条件的功能耦合网。另外，新结构出现后，要能够壮大到占主导地位的程度，才能取代旧结构。这两个条件并不一定总是具备的。

首先，功能异化只是导致社会结构子系统普遍发生畸变，虽然从原则上讲，任何一个畸变了的结构必然对应着新的功能。但这些功能大多是无用的，它们往往不能互相耦合起来，形成任何组织。贪赃枉法，循私舞弊是一个畸变腐败官僚机构的新功能，但这种功能对任何一种社会组织都没有用处！罗马军团功能异化的后果是军队失去爱国热忱，士兵们一天天变得贪得无厌，他们对军队应有的职能如征战、保卫国家失去了兴趣，这种畸变了的罗马军队也具备某种新的功能，这就是抢劫城市。毫无疑问，这种功能也是没有用的。赫胥黎之桶中所包含的大多数东西也是这样，它们往往互不衔接，或者发生尖锐的冲突。也就是说，子系统畸变具有新功能的子系统和赫胥黎之桶包含的东西大部分对形成新的功能耦合毫无建树，它们是破坏旧

结构的因素，我们将它们称为无组织力量。①

这样一来，虽然创造新结构新功能子系统的过程总是和旧结构瓦解同步进行，但新的社会结构要从旧结构中脱胎出来，并不是轻而易举的，需要有一种机制来保证如下三个环节顺利地进行：

1．旧结构解体时形成的各式各样的新的子系统并不全都是无组织力量，它们中间一定要有可以成为新结构的组织要素的子系统。我们将它称为潜组织要素的成长。潜组织要素必须是完备的、配套的。也就是说，这些代表潜组织要素的新的子系统必须包含了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它们是互为条件，可以进行功能耦合的。

2．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结构中新的子系统互相耦合，形成一种潜在的（它尚未占主导地位）新社会结构，我们将其称为潜结构的形成。

3．潜结构不断壮大，最后占主导地位，取代旧社会结构形成新社会结构。

这是社会结构取代过程的三部曲。理论分析表明，虽然社会结构的取代方式是各式各样的，但任

① 我们将那些对旧结构适应性起破坏作用而不能形成新组织的力量称为无组织力量，有关无组织力量的论述详见《兴盛与危机》一书。

何取代过程都要完成这三个环节。罗马帝国取代罗马共和国经历了这个过程。罗马共和国自由农民经济功能异化畸变的结果是形成奴隶制商品经济，它正好代表罗马帝国的经济结构。共和政体异化导致军事元首政体，它是罗马帝国政治结构的潜组织要素。同样，泛罗马主义、泛城邦爱国主义成为意识形态结构的潜组织要素。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者功能耦合组成了罗马帝国的新结构。在理论上可以根据旧社会结构是否阻碍这三个过程的进行来判断新结构取代旧结构的方式。如果这三个步骤均能在旧结构框架中进行，旧结构既不妨碍潜组织要素的成长，也不妨碍新组织要素互相结合壮大，以至于取代。这三个环节就会互相交融。结构取代的全过程就必定是连续的，三个阶段在时间上没有明显的分界。罗马共和国的演化正是这样。它的结构并不阻碍这些潜组织要素相互结合，也不明显阻碍新结构取代旧结构。所以，潜结构在形成的过程中不断壮大，并同占据主导地位的过程交融在一起。新结构的形成与取代同旧结构的瓦解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当时，除了政治结构发生了一些小振荡外，整个社会并没有大的动荡，罗马共和国演变为罗马帝国是一个近于连续的过程。

当旧结构或旧结构中的无组织力量严重阻碍潜组织要素互相结合、形成潜结构时，结构演化三个环节中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就可以明显区别开来。由于潜组织要素的互相结合不能在旧结构瓦解前进行，它必须等待旧结构瓦解，只有阻碍新子系统耦合的旧结构框架倒塌了，大大小小具备无用功能的子系统被淘汰，也就是对无组织力量进行某种清除之后，代表新社会结构的各个子系统才能进行选择性的重组。这时，就会看到潜组织要素从旧结构中剥离下来的过程。它往往要求潜组织要素具备一定的独立生存能力，以不致于在旧结构的瓦解时遭到彻底破坏。

当旧社会结构不明显阻碍潜结构形成，但却阻碍潜结构的壮大和取代时，结构取代三步中第一、第二阶段往往不易区分，但第二和第三阶段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分界线。下面我们以罗马帝国演化的历程为例进行详细的分析。

4-2 查理曼帝国和西欧封建制的确立

基督教、世袭庄园和日耳曼人的政治组织代表

了罗马帝国内部意识形态、经济、政治三类潜组织要素。罗马帝国灭亡之前，旧社会的大厦尚存之时，尽管这些潜组织要素在一天天成长，却不能互相结合，形成一种代表新社会结构的潜组织。如果仅仅从功能上讲，它们是可以实行耦合的。但旧结构的大厦和无组织力量的洪水却妨碍了它们。

世袭庄园虽然在罗马帝国中广泛存在，在帝国后期已成为农村经济组织的主要形态，但管理它们的却是罗马帝国的旧贵族，它们是腐朽了的帝国政治机器的一部分。同样，蛮族中的政治组织尚且不能和帝国的政治大厦融合，当然也不可能和帝国广大的世袭庄园结合。

一般说来，意识形态结构中的潜组织要素和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中的潜组织要素的结合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前，做到这一点也很难。罗马帝国是以城市生活为基础的，它的意识形态结构组织也只能以城市作为形式化社会化的基地，这一点，对于在形成之中的新意识形态结构的要素也是成立的。历史学家公认，基督教一开始是一种城市宗教，在罗马帝国稳定的时代，它的传播和教会设立的范围基本上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基督教深入农村是在公元五世纪以后，即罗马帝国崩溃

之后。这表明，在罗马帝国瓦解之前，以基督教为代表的新意识形态组织要素不可能广泛地和农村中的世袭庄园相结合。

这样一来，罗马帝国潜组织要素的结合必须等待罗马帝国的崩溃。因此我们在罗马帝国演化的历史上，首先看到了一个代表新社会结构潜组织要素从旧社会结构中剥离下来的过程：这就是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的世袭领地的独立和教会的庄园化。

公元五世纪以后，罗马帝国的大厦开始倒塌，组成旧结构的巨石如雪崩般地碎落下来，这些碎片大多数变成了毫无用处的东西。各式各样的结构畸形的子系统在崩溃过程中被消灭了。古代商品经济衰落，城市中杂草丛生，建筑物的废墟成了农人的采石场。寄生的罗马自由民消失了；军团政治结构完全被粉碎；古罗马宗教也被人们所抛弃。然而只要这个社会中的人没有在动乱中全部消灭，总会有某种可以暂时独立于旧结构而存在的组织要素残存下来。它们就是自给自足的世袭庄园和基督教会庄园。世袭庄园在经济上可以自给自足，所以和旧社会结构的脱离并不会立即危及它的生存，它的性质决定了它是可以从旧社会结构中分离出来的。基督教也是一样，旧结构崩溃带来的灾难愈是深重，现

世的罪恶和灵魂不朽说对人们的影响就越大。只要基督教会也建立起维持它生存的庄园，它不仅可以从城市组织中剥离下来，而且这正好给它造成深入农村的大好时机。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后上百年的动乱之中，虽然很多世袭领地被蛮族入侵和奴隶起义所摧毁，但其中一部分很快变成了自给自足的庄园，在这些庄园中，残存的奴隶制完全被摧毁。庄园主们筑堡而居，组织私人卫队，使庄园不仅在经济上自给自足，而且在政治上也封闭起来，以保证在乱世中的栖身。城市被消灭后，教会的地产迅速演变成独立的教会庄园。总之，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我们在西欧看到了潜组织要素从旧社会结构中剥离下来的过程。

旧结构的瓦解使阻碍潜组织要素结合的壁垒消失了。特别是罗马帝国的政治机器崩溃后，蛮族中盛行的政治和军事组织成为整个社会中唯一值得重视的力量。这时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结构的潜组织要素在西欧广大地区普遍地混杂在一起。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蛮族王国。人们常有一个错觉，认为这些蛮族王国的建立标志着西欧封建社会的确立。如果我们仅仅分别分析蛮族王国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各子系统的内容，是容易发生这种

错觉的。大多数蛮族王国的经济结构均由世袭庄园组成，基督教已成为人们普遍信奉的宗教，而蛮族军事性组织也成为政治结构的主要成份。但是，这三个组成封建社会的子系统虽然混合在一起，在大多数蛮族王国中它们并没有形成功能耦合。仅仅是各种子系统堆砌在一起而已。

西欧封建社会的确立需要庄园经济结构、蛮族政治结构和基督教意识形态结构形成一种互相调节的整体（图4.1）。子系统是否真正耦合，可以从它们之间是否存在互相调节来判断。众所周知，西欧封建社会政治结构对经济结构的调节由宏观微观两个方面组成。宏观调节表现为领主之间形成了一种稳定的政治关系，即一种金字塔式的身份制。从而使整个社会安定下来，为庄园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了一种必需的社会秩序。由于在领主中形成了统一的分封制和骑士制度，整个社会才能从一个个近乎于独立的庄园中获得一支相对有效的军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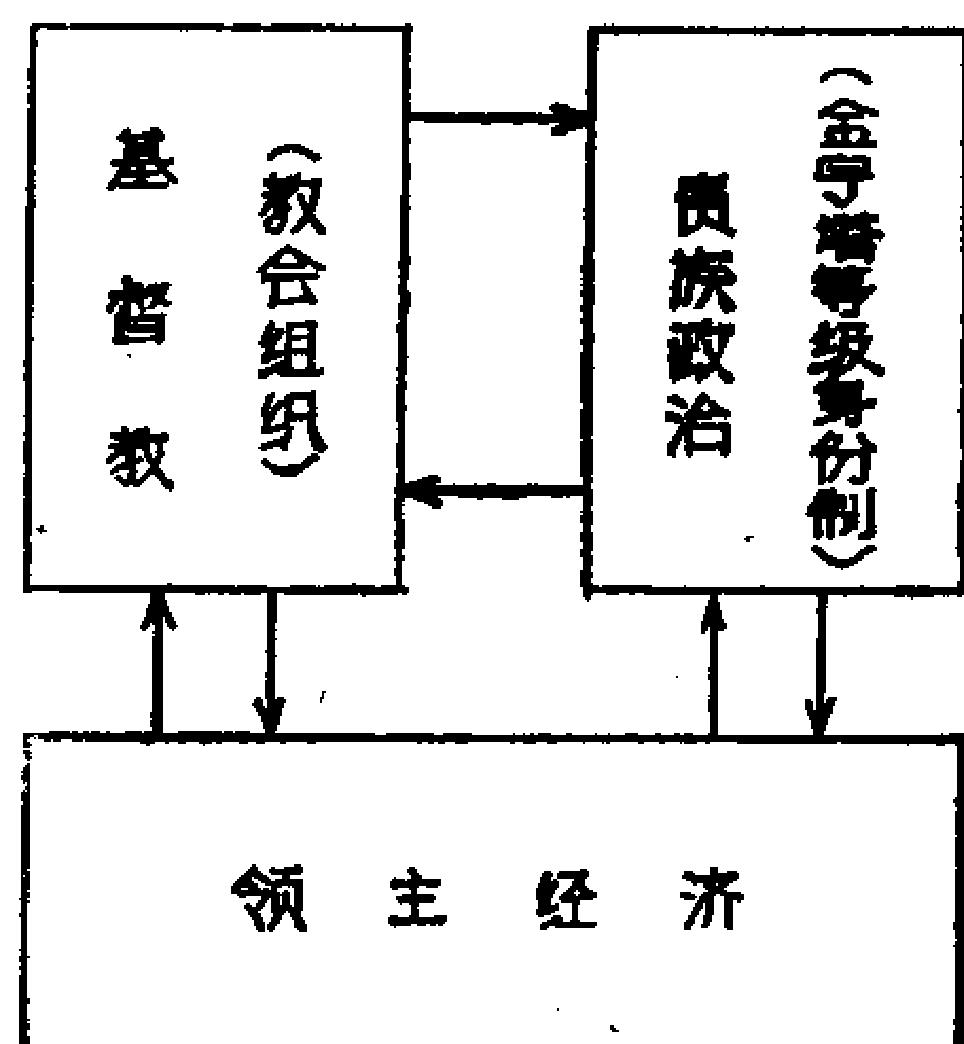


图4.1

量，才可以组成军队来抵抗各式各样的入侵，以保证经济生活正常进行。政治对经济结构的调节作用在微观方面也十分重要。它主要表现在领主政权对庄园内部的调节。其标志是领主对农奴形成确定的权利和义务。关于领主的权利，人们谈得很多，它们是：领主征收地租权，对农奴的人身支配权，甚至还有对农奴女儿结婚时的初夜权。人们常常忽略的是，这些权利是领主承诺了义务才换取到的。权利需要人们普遍接受，必须和义务相结合。义务就是对庄园生活的调节，领主必须承担在乱世中为农民和农奴提供保护的义务。领主的城堡往往是盗贼侵犯时全庄园人藏身的地方。这种调节作用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由于这些勇士，农民得享安全。他们不再被屠杀，不再被牵去作俘虏……人们生活于或可说开始生活于粗鲁而又残酷的统治之下；他们遭受粗暴的待遇，可是获得了保护……。"①此外，领主对习惯法的维持，他们对庄园中争端的裁决也是政治结构对经济结构调节的重要方面。甚至后来成为封建领主恶习的游猎行为在当时对经济都有调节作用，因为它可以抑制狼群繁殖。

---

① 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第321—322页。

在绝大多数蛮族王国中，政治结构的子系统对庄园经济都没有这种调节作用。一个个庄园不仅经济上自给自足，而且政治上完全独立，领主私人卫队拥兵割据，他们之间并没有形成确定的身份关系。蛮族武装几乎是游离于经济结构之外的统治力量。他们在文化上实行普遍的旺达尔主义，除抢劫和破坏外，对社会秩序没有任何建树。因此蛮族王国大多都处于一种混乱状态，盗贼横行，战乱四起。一个个自给自足的世袭庄园在混乱中苟延残喘，根本谈不上经济的发展。

同样，在大多数蛮族王国中，意识形态结构也没有和政治结构耦合起来，发挥它应有的调节作用，基督教意识形态结构和政治经济结构的耦合不仅意味着基督教为经济和政治生活提供一种统一的价值观念，使骑士忠于他的伯爵，使农民安于现状。更重要的是，它还意味着基督教会在每个庄园中建立起来，形成一种统一的宗教组织。功能耦合意味着意识形态组织——教会和西欧封建社会的政治组织形成一致的管理网。教会组织也必须确立与金字塔身份制一一对应的层次，形成互相配合的调节系统（图4.2）。绝大多数蛮族王国都没有做到这一点。虽然罗马帝国灭亡后，教会庄园化了，但教会设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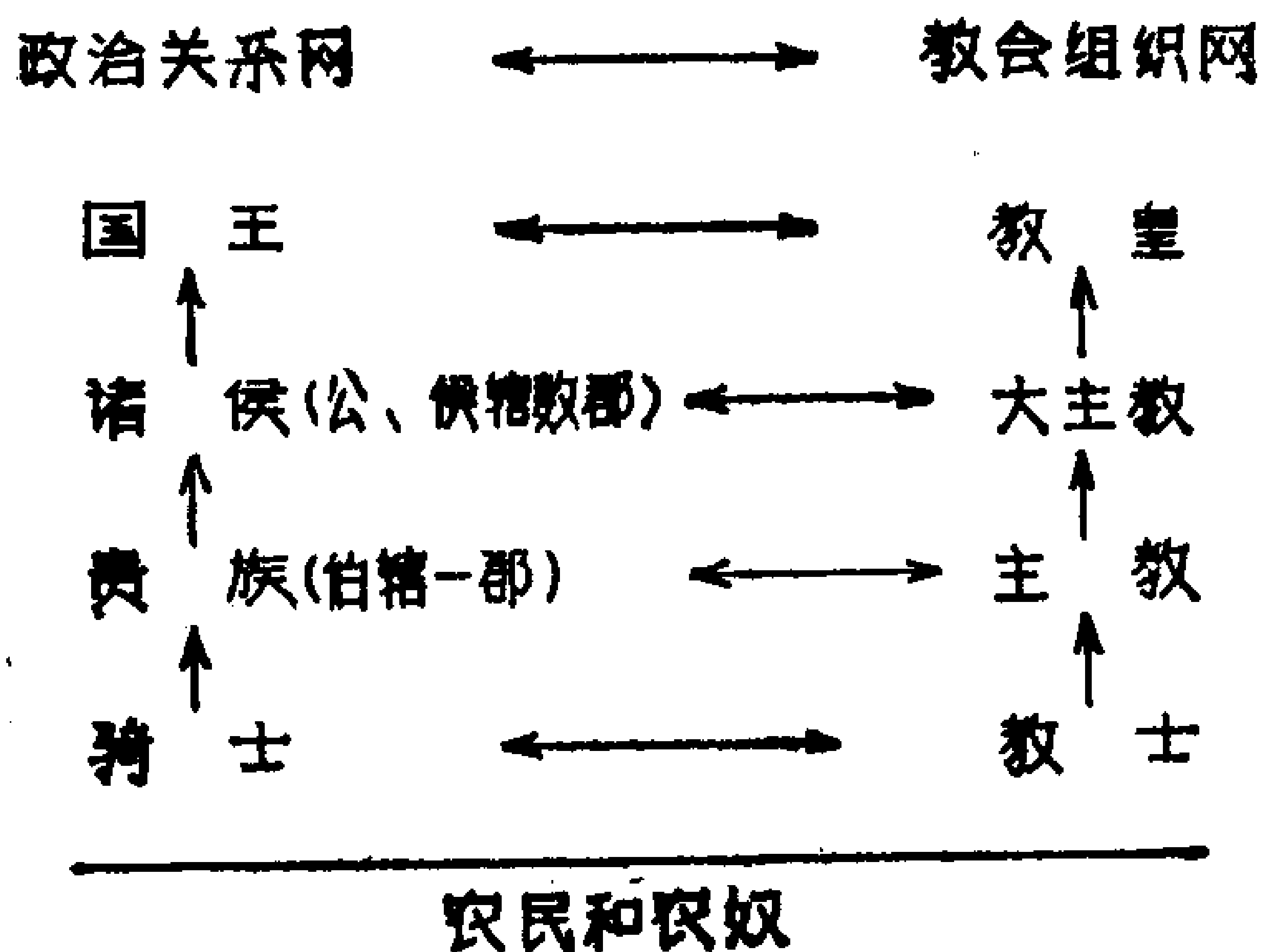


图4.2

庄园并不等于在每个庄园设立教会。由于世袭庄园完全独立，各自信奉的教义不能保证统一；因此一个世袭庄园信奉一种教派，形形色色的教派混杂的现象在西欧大多数蛮族王国中屡见不鲜。

根据社会结构调节原理，一个社会中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如果不能形成互相调节的整体，社会就不存在稳定的结构，就没有容纳经济发展和正常的社会生活的框架，这就势必出现巨大的破坏！公元六世纪的意大利就是典型的例子。那时，意大利的社会秩序一片混乱，争夺土地的战争接连不断，罗马文明的发源地仿佛一下子倒

退了一千五百年。据历史记载，罗马公民们逃到山区和森林，那里豺狼成群，以致许多地方豺狼成为一种恐怖。田地荒芜，野生的谷物没有人收获，当年人类的住宅成了野兽的栖身之所。其实，这种情况在六至七世纪的西欧是到处可见的。

那么，为什么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这三方面的潜组织要素不能自发实行耦合，迅速构成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呢？关键在于，这些潜组织要素要能从旧社会的躯体中剥离下来，必须具备相对的独立性和封闭性。世袭庄园要不是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自给自足，早就随着社会结构的解体而消失了。教会庄园和蛮族军事组织也是这样。既然相对独立性和封闭性是潜组织要素从旧结构中剥离出来的条件，那么它必然带来潜组织要素互相结合的困难。要形成统一的社会结构，必须在领主间建立服从和等级关系。必须用行政的力量将宗教组织深入到每一个独立的庄园中去。这只有在通过武力征服建立统一的国家后才能完成。每一个世袭领主的私人武装虽能用来保卫庄园，但大多都不足以发动一场征服战争！

现在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西欧封建社会的建立走过了一条独特的道路，即它只能通过法兰克王国的封建化才能实现。从理论上讲，法兰克王国的

作用就是完成了结构取代必须的第二个阶段，把潜组织要素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潜在的新结构。没有法兰克王国短暂的统一，潜组织要素的封闭性不能被打破，就不能实现功能耦合。法兰克王国依靠剥夺部分世袭庄园和广大的空地建立起采邑制度，从而使采邑的主人之间形成了一种确定的金字塔式的君臣关系。它不仅使国家获得了统一的军事力量，而且也获得了行政力量，有力地促进了统一教会网的建立。史书上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某些领主曾顽固地拒绝教会触角伸到自己的领地中来，国王不得不派骑士和伯爵充当主教，用武力打破潜组织要素的封闭性。

然而，必须指出，在法兰克王国中，未来西欧封建社会的结构仅仅是一种潜结构。占主导地位的采邑虽然含有领主经济的成份，但毕竟不等于世袭庄园。金字塔式的封臣关系在法兰克王国中只是潜含在国家组织之中的，它当时还是一种君臣关系。

因此，西欧封建社会的确立，必须等待法兰克王国的解体。它需要君臣关系演化为贵族之间的等级身份制，军事采邑演化为领主庄园。这时领主庄园已不同于罗马帝国遗留下来的世袭庄园。它们是整体中的一部分，已经同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结构

耦合起来。同样，这时出现的新贵族，也不是拥兵割据，占地为王的领主，而是已确立的政治结构中的一部分！只有在统一帝国解体的过程中，已经形成的潜结构才能占主导地位。社会结构取代的第三个阶段才能完成。这表明，法兰克王国的瓦解和它的形成一样，对于西欧封建社会的确立都是必不可少的。没有它的建立，潜组织要素不可能结合，没有它的瓦解，潜结构不可能实现最后的取代。

形象地说，把一个个政治上独立、经济上自给自足的领主庄园组成一个功能耦合的封建社会，就像用一个网兜把马铃薯装起来。网兜的经线是等级身份制，纬线就是宗教组织。由于潜组织要素的自我封闭性，封建网兜不可能从个别领主庄园这些马铃薯中生长出来，它需要通过一个统一体的解体生长出来。只有依靠这个统一体才能把旧结构中的潜组织要素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功能耦合的整体。法兰克王国的瓦解，把君臣关系演化为金字塔的封建等级关系。尽管骑士对伯爵，伯爵对国王的依附关系是松弛的，然而毕竟是一个统一体。而且，在法兰克封建化的同时，宗教组织的纬线也深入到每一个领地，与政治结构的功能耦合起来。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历史上一个奇特的现象：彻底的农奴化和典

型的封建化仅仅出现在日耳曼和罗马因素完全溶合的地区，它仅限于墨洛温王朝的疆土。西欧封建社会中大多数庄园不是从罗马帝国的大庄园直接继承下来的。法兰克王国建立和瓦解后，对大部分领地进行分割、碎裂及重新组合，才形成了整个西欧的封建社会。封建社会的领主多数是法兰克军事采邑制度中成长起来的新贵族。

西欧封建社会的建立过程表明，任何社会结构的取代都必须经历潜组织形成，潜组织结合，最后占据主导地位这三个阶段。而且，只要其中任何一个受到阻碍，结构取代就不能顺利完成。在西欧封建社会取代罗马帝国的过程中，最困难的是潜组织要素的互相结合，由于潜组织要素从旧结构中剥离出来而带来的封闭特点，它们的结合一定要通过法兰克王国这样的中介体。没有这一中介，正是很多地区长期不能过渡到封建社会的原因。

五世纪中叶，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裘特人曾在不列颠建立了许多蛮族小王国。但一直到1066年诺曼底征服之前，英国始终没有确立完整的封建结构。诺曼底公爵带着远征军入侵不列颠，实际上起了类似中介的作用。而在意大利的东哥特人和在西班牙的西哥特人，却都没有充当过法兰克人那样的

中介作用。东哥特人想建立一个统治众多独立世袭庄园的政权，结果他们自己被消灭在世袭庄园的暴动和拜占廷帝国的入侵之中。西哥特人在西班牙建立的王国是蛮族王国中生存最长久的，但罗马留下的世袭庄园及他们的私人武装是西哥特王国最难消化的东西。西哥特人太少了，他们只是浮于社会统治的表面，他们在西班牙的历史上几乎什么痕迹也没有留下，西班牙建立封建社会走过了漫长的道路。

4-3 东罗马帝国：斯拉夫人入侵和君士坦丁堡

人们或许会提出一个例外，这就是东罗马和以后的拜占廷帝国。如果我们从整体上去把握罗马帝国的演变，就会发现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出现的是两种不同的新结构，一个是由法兰克王国瓦解而生成的西欧封建社会，另一个是东部的拜占廷帝国。从生产关系上讲，虽然二者均属于封建社会，但这两个社会的结构却是大不相同的（图4.3）。在西欧封建化的过程中，城市几乎消失，商品经济萎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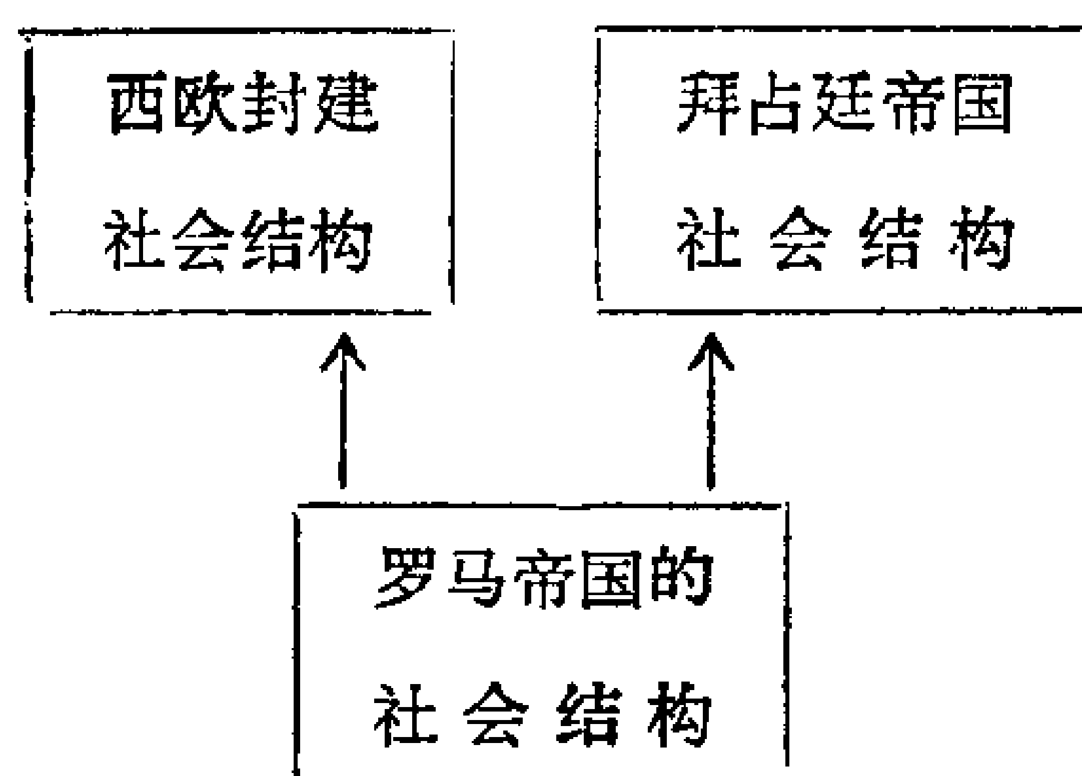


图4.3　罗马帝国瓦解后演化为两种社会结构

到不能再少的地步。政治上皇权衰落，政权彻底地地方化了，甚至龟缩到一个个的城堡之中。整个社会出现了所谓“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封建等级制。而拜占廷帝国却还存在着强大的王权，存在着官僚机构。城市仍旧统治着农村，继续保持着相当发达的商品经济。甚至意识形态也不尽相同，罗马帝国大厦倒塌时，基督教分成了两派：天主教和东正教。在西欧出现了横跨各封建国家而又与地方政权并行的统一教会。但东正教却几乎成了拜占廷帝国的意识形态部门。

既然世袭庄园、蛮族政治组织，基督教是罗马帝国中存在的潜组织要素，既然新社会结构的形成可以由潜组织要素形成潜结构，最后取代的结构来

说明，那么为什么拜占廷帝国出现了与西欧封建社会不同的结构？是不是社会结构取代的条件在罗马东部不适用呢？分析这一表面上的反例，可以使我们对社会结构取代过程获得进一步的理解。

罗马帝国瓦解之前，遍布西部广大农村的庇护制世袭庄园同样在东部蔓延，东罗马帝国基督教的力量甚至比西部还要强大。因此，就潜组织要素生长而言，帝国的东部和西部基本类似。

差别出现在潜组织要素从旧社会结构中剥离的过程。众所周知，公元565年，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逝世以后，东罗马帝国的危机接踵而来，萨拉森人在亚洲征服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以及亚美尼亚、乔治亚和卡帕多细亚。从瓦尔达尔河到摩拉瓦河及亚得里亚海，希腊和希腊化文明被斯拉夫人扫荡殆尽。帝国的权力仅仅限于君士坦丁堡本身。实际上，此时作为罗马帝国延续下来的政治、经济结构已经灭亡了。这时，东罗马帝国也出现了经济结构潜组织要素从旧社会结构剥离下来的过程。那些世袭庄园纷纷独立。但是帝国东部的环境和西部大不相同，西部的世袭庄园生活在日尔曼人入侵的环境中，而东部的世袭庄园却碰到了斯拉夫人入侵的旋风！表面上看，作为蛮族入侵，斯拉夫人似乎和

日耳曼人没有多大区别。事实上，斯拉夫人并不像日耳曼人那样由于长期生活在罗马帝国的边境上而罗马化。他们更为原始。因此对待那些从旧结构上剥离下来的世袭庄园的态度与日耳曼人完全不同。日耳曼人只是改变了部分领地的所有权，基本上全盘接受了潜组织要素。斯拉夫人的办法是彻底破坏它。关于这一点，恩格斯曾经指出："日耳曼野蛮人既使罗马人从他们自己的国家中解放出来，便强夺了他们土地的三分之二来互相分配，以作为报偿"。[1]他们在这三分之二的土地上实行了采邑制度，另外三分之一的土地仍旧保留大世袭庄园。实际上，不同的日耳曼部落对大世袭庄园的剥夺也不相同，西哥特人仅仅没收了领主三分之一的土地用来分配，东哥特王国则是日耳曼各蛮族王国中最为罗马化的国家，他们仅仅分配了无主荒地。在意大利的大世袭庄园几乎没有失去土地。这就是说，无论哪部分日耳曼人都没有取消世袭庄园，最多不过把它变成自己的采邑。而斯拉夫人却完全破坏了世袭庄园，代之以他们自己熟悉的农村公社。这一扫荡是如此的彻底，以至于公元570—600年间巴尔干山以北地区"老的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9页。

人口几乎消灭殆尽”，①甚至在罗马经济结构根深蒂固的马其顿、色雷斯，大世袭庄园也所剩无几。汤普逊指出，到了公元620年，帝国各行省讲拉丁语的人仅剩下十分之一。②在东罗马帝国，古老的农村公社普遍复苏了。

应当注意，农村公社和世袭庄园、采邑制是完全不同的潜组织要素，它从来就是小农经济的温床。它本身在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却没有坚硬的政治外壳。农村公社中的自由农民可以为统一帝国提供赋税和兵源，可以成为中央集权政体的经济基础。只要有一种政治模式来组织他们，或者说只要城市来重新统治他们，他们就可以同某种政治结构形成新的功能耦合系统。本来，罗马帝国的奴隶制商品经济瓦解了小农经济，现在，斯拉夫人的入侵又把它带了回来。它使东罗马帝国的大部分地区回到罗马征服以前的起点。

这说明，由于斯拉夫人的入侵，世袭庄园从罗马帝国的旧结构中剥离下来后，发生了重大变化。

---

① 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18页。

② 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22页。

斯拉夫人强迫它们变成农村公社，它在结构上与农奴制庄园完全不同。经济结构潜组织要素的重大变化决定了东罗马帝国已经不可能演变到类似西欧封建社会的结构中去。它必须走一条新的道路。

这种新的社会结构是什么呢？它同样可以通过旧结构中成长起来的潜组织要素来判断。斯拉夫人的政治组织比日尔曼人原始，不可能提供身份等级这样的潜组织要素。就算东罗马帝国存在贵族身份制，也不能和农村公社耦合起来。它们必然被淘汰。那么，有没有一种政治上的潜组织要素能与农村公社耦合呢？有！这就是军事官僚制度。这种潜组织要素之所以能出现，也和东罗马帝国政治结构演变的特殊过程有关。

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的另一个差别表现在奴隶制商品经济衰落的程度上，罗马帝国从公元三世纪末开始了商品经济的普遍衰落，但是，在东部和西部的程度却是很不同的。西罗马帝国灭亡的时候，商品经济几乎全部被消灭了，城市荒芜，世袭庄园是唯一残存的实体。然而东罗马却不是这样。据统计，公元五至六世纪时，东罗马还有600座大大小小的城市，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十四分之

一①。尽管城市生活已不是公民生活的主要部分，但东罗马帝国濒于解体时，还有少量的城市存在着。也就是说，东罗马帝国的城市有一点与西罗马的城市不同，它们能部分地从旧结构中游离出来。这一点似乎是不可思议的。罗马城市是奴隶制商品经济的枢纽，随着奴隶制商品经济的消失，它必然要灭亡。那么，东罗马帝国的少数城市为什么能脱离旧结构而存在呢？关键在于，东罗马帝国的很多城市是由国内、国际双重贸易支撑的，国内贸易衰落后，只要国际贸易尚存在，那些对外通商的城市就有可能相对独立于旧结构而生存。东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堡就是一例。正如马克思所说，它是“东西方之间的一道金桥”，② 是当时国际贸易中最大的枢纽。希腊人、犹太人、叙利亚人、阿拉伯人、保加利亚人、意大利人的贸易都要经过这里中转。国际贸易给君士坦丁堡带来大量的货币收入。东罗马可以用它来组织军队，收买蛮族领袖，从军事角度来看，君士坦丁堡也有特殊的地理长处，只要它的水师封锁了博斯普鲁斯和赫勒斯旁海峡，城市的三面就都不会

---

① 郑如霖《关于东罗马帝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中的几个问题》，载于《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63页。

受到威胁。因此，即使东罗马的土地全部丧失，君士坦丁堡依靠自己也能存在下去，并为建立新的社会结构提供据点。

部分城市一旦从旧结构中暂时剥离出来，就在新结构的形成中起着重大作用。一方面，从城市产生出来的军事组织和政治组织可能发展成新的潜组织因素。另一方面，城市可以作为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潜组织因素结合的母体。只要城市重新统治农村，农村公社中的自由农民经济要素就能和新的政治，意识形态结构耦合起来。历史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首先是意识形态结构和政治结构潜组织因素的结合。罗马帝国全盛时期，东部和西部的意识形态是基本相同的，都信奉古罗马宗教。但东罗马受到东方、希腊和埃及的影响比西罗马大。西罗马作为罗马文明的发源地，在思想上比东罗马保守。在罗马帝国濒于崩溃之际，东罗马和西罗马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别明显起来。东部罗马的旧贵族元老少，新贵族多，他们中间很多人抛弃了旧意识形态转而信奉基督教。而在西罗马，随着城市的消失，基督教与帝国的政治机器产生了更大的距离，甚至被抛了出来，最后成为游离于政治结构以外的力量。因此必须有中介体，才能把基督教和政治结构

重新组织起来。而东罗马帝国不需要这种中介，它的部分城市一直存在着，成为政治结构与意识形态结构新因素结合的母体，结果，东罗马的基督教与帝国政府逐步合一，成了帝国的意识形态部门。

尽管东罗马帝国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的潜组织要素有着相互结合从而创造新社会结构的可能，但其创建的过程仍旧是十分痛苦的。当时的人们并没有认识到怎样改变旧的政治结构才能建立新的功能耦合系统。所以，大多数尝试者仅仅怀着一种建立秩序，甚至是恢复旧体制的希望去东碰西撞。从查士丁尼到立奥三世 继 位， 拜占廷的政治动乱频繁，它经历了三个正统王朝和六次篡位的宫廷政变，包括十七个皇帝更迭，新结构才大体建立起来。经济结构是农村公社中的小农经济、部分庄园的混合形态。它为政治结构提 供 税 收和兵源。政治结构是一种军事官僚体制。公元七世纪起，君士坦丁堡开始实行军区制度，利用大量的自由农民作兵源，并把地方行政 大 权 交给军事长官。这种军区制和古罗马总督统帅行省军团的体制是根本不同的，后者以城市为基础，前者以农村为基础。拜占廷的军队由自由农民和拥有世袭份地的军人组成，根据份地的多寡确定兵役。它实际上包含着军

事封土制的因素。从此，拜占廷有了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成功地击退了阿拉伯人的进攻。新结构确立的另一个标志是《伊苏里安法典》代替了奴隶制的《查士丁尼法典》。新社会结构的建立甚至对意识形态结构也进行了进一步清理。东正教虽然属于新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但由于旧结构瓦解时，相当一部分教会庄园化了，它拥有很多地产，与军功封士制不适应。因此，在拜占廷的历史上出现了连续百年的"破坏圣像运动"。皇帝立奥三世没收了大量的教会土地颁发给军人。直到马其顿时期（公元867—1057），拜占廷帝国新的社会结构才最后完成了取代，达到一种适应态。此后出现了社会发展安定而繁荣的局面。

必须指出的是，军事封士制度会出现功能异化，分裂割据倾向的抬头必然使中央政府衰落。这突出地表现为自由农民农奴化，军功采邑慢慢演变为世袭庄园。拜占廷经济结构不断向庄园经济演化正是拜占廷衰落的重要原因。然而拜占廷帝国与查理曼帝国不同，它有相对发达的城市和商品经济，有官僚机器。可以采取措施抑制和减慢功能异化过程。拜占廷社会结构有一个微妙的特点，当功能异化破坏了社会结构的稳态时，中央政府衰落，政权重新龟

缩到君士坦丁堡城中，只要国际贸易存在，君士坦丁堡就是修复帝国的据点。所以我们在拜占廷帝国长达800年的历史中，可以看到它的版图处于一种反反复复的伸缩之中。每当社会结构不适应时，农民起义和外来入侵总是或多或少地消灭积蓄在社会结构体内功能异化的结果和无组织力量。为下一次修复打下了基础。这种情况，直到君士坦丁堡的海上国际贸易地位被新发展起来的意大利城市取代时才结束。拜占廷帝国一直维持了近一千年。

东罗马帝国建立了一种不同于西欧封建社会的结构，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我们只要对任何一个社会的结构，它的潜组织要素产生的过程，以及相互结合和取代的条件进行具体分析，就不仅可以理解是什么样的新结构可以取代它，还可以明白，每当一个旧社会结构瓦解时，由于不同地区的社会生活不同，社会结构瓦解后剩下的组织要素不同，就为不同形态的新结构提供了各种可能。也就是说，社会结构的演化会出现分叉现象。当一种社会结构形成了功能耦合系统时，它自身的调节能力可以维持稳定。这时诸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心理的某些细小差别，英雄和领袖的作用，外来微小干扰等等不可能对社会结构产生重大影响。然而当旧结

构趋于瓦解时，以上因素对形成新结构的作用则不可忽视。新结构的形成之所以对各种偶然因素十分敏感，关键在于潜组织要素从旧结构剥离下来后，本身并不稳定，在不同的条件下，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变化，它们如晶种一样，会造成由它们发展起来的潜结构出现很大的不同。在这里，我们解决了本书一开始就提出的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既然人类社会都起源于原始部落和氏族社会，为什么会出现东西方模式的巨大差异，为什么人类历史上会有形形色色的社会结构。我们所说的解决，是指提供了一种方法。要真正理解各民族的演化道路，还要具体地分析各种演化机制，分析不同社会结构的组织要素，分析其特殊的功能耦合系统。虽然，有些要素还埋没在历史的尘埃中难以知晓。但是，从理论上我们可以断定，人类历史的演化既不像机械决定论者所说的那样是一条直线，也不像唯心主义史学家所说的那样是一片无规律的混乱。历史的发展有着自己的规律，无非是这种规律和人们原来想象的因果关系和决定论有所不同罢了。



第五章

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首先在西欧确立

议会除了不能使一个女人变成男人和使一个男人变成女人外，它能够做一切事情。

——英国 格言

5-1 中世纪城市和古希腊罗马城市、东方古代城市的差别

现在，我们来回答本书一开始所提出的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最先从西欧封建社会中产生？表面上看，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各式各样的封建社会结构进行分析，研究它们的演化过程。中世纪西欧、中国、日本、印度、拜占廷的社会结构各不相同，在这里逐一进行具体分析似乎是难以实现的

任务。然而，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有某些独有的特点，可以使我们从理论上作出推断：近代资本主义文明只可能在类似西欧封建社会的结构中产生。

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也要经历结构取代的三部曲。首先是潜组织要素的出现，其次是潜组织要素形成功能耦合的结构，最后是潜结构取代旧结构。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结构的潜组织要素是商品资本和雇佣劳动，政治结构中的潜组织要素是市民组织，意识形态中的潜组织要素是人文主义和市民文化。这些潜组织要素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它们只能出现在以城市为中心的地区，在城市中完成结合。从这个特点出发，联系社会结构的取代条件，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如果城市是旧社会结构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那么无论这种旧结构是什么，它们都不能成为资本主义潜结构形成的母体。道理十分明显，如果城市是旧社会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么，当旧结构瓦解时，城市也必然同旧结构一起同归于尽。资本主义潜组织要素与西欧封建社会潜组织要素除形态不同外，有一个根本的区别，这就是：它们不能游离城市而存在。自给自足的庄园可以从旧结构中剥离出来，商品经济却不行。基督教可以游离出城市而乡村化，但市民文

化一旦离开城市就会枯萎。市民组织也是同样。所以，假如城市属于旧结构不可分离的部分，它就会从两个方面破坏资本主义潜结构的形成。首先，它作为旧结构的统治中心，是旧势力最强大、最顽固的地方，即使资本主义潜组织在这里产生，成长也十分困难。第二，当城市随着旧结构瓦解而衰落时，资本主义的潜组织由于无法从城市中剥离出来，它会随着城市的衰落而消亡。

历史学家认为，在中国和拜占廷封建社会兴盛之际，资本主义萌芽都出现过，而且如果仅仅从商品经济的规模来看，它们远比中世纪的西欧发达。从拜占廷君士坦丁堡市政长官的法令汇编中可以看到，公元十四世纪时，君士坦丁堡私人作坊及个体手工业者极多，他们在商品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行会力量也十分强大，城市人口已达60万以上。无疑，这是经济结构中的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封建王朝的末期也是这样。明末景德镇制造瓷器的工人达10万之众，而且大多数都采用雇佣劳动形式。①一般说来，城市生活繁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潜组织要素的市民文化就容易产生。今天，人们公认人文主义起

① 《江西志》（康熙）卷146《艺文》、萧近高《参内监疏》。

源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其实，人文主义最早出现在拜占廷。早在十一世纪，拜占廷著名的哲学家米海尔普塞鲁就发展了柏拉图的哲学思想，提出哲学应与神学分离。十三世纪以前，拜占廷就出现过类似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思潮。当时人们热爱古典文化，崇拜理性力量，注重人的个性。不少意大利青年来到这里求学。拜占廷许多著名的学者常去意大利讲学，比如瓦尔拉姆和他的学生皮拉特，就曾教过意大利著名的人文主义者彼特拉克和薄伽丘学习希腊文字。格米斯脱·普利顿为了传播希腊和罗马文化，在佛罗伦萨创办了柏拉图学院。可以说，拜占廷的人文主义思潮直接促进了意大利文艺复兴。

然而，资本主义潜组织要素在中国和拜占廷封建社会中的命运如何呢？它们虽然发达，却不能相互结合。它们在旧结构的土壤上显得繁花似锦，却不可避免地随着旧结构的衰落而凋谢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资本主义萌芽，根植于城市和以城市为中心的地主经济中，它是旧结构的组成部分。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城市大多是郡县政府衙门的所在地。封建王朝一旦瓦解，这些城市的衰落也往往降临。每当中国封建王朝崩溃之时，动乱首先破坏城市，于是资本主义的萌芽常常在焚毁旧结构的烈火中化为灰

烬。拜占廷帝国瓦解也同样出现城市衰落及自由农民农奴化现象。这些农奴制的领主庄园，后来成了奥斯曼帝国的组织要素。但发达的资本主义萌芽却同样遭到了摧残。虽然中国和拜占廷社会的演化模式并不相同，但资本主义结构都不能在这些社会中确立起来。

从结构上看，是否存在着这样的封建社会：它内部有相对发达的城市，但城市又不是社会结构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呢？有的，它的典型代表就是西欧封建社会。日本封建社会的城市和商品经济虽没有西欧发达，但它的结构与西欧封建社会类似。它们的经济结构都是庄园领主经济，政治结构是贵族政治。社会组织框架主要不依靠城市。农奴和领主的关系构成主要的经济关系网，一个个孤立的高墙壁垒的城堡是庄园领主的统治中心。因此，城市一旦形成，从一开始就是与旧的封建结构对立的东西。它并不属于旧的封建结构。这一点，可以从西欧封建社会城市的起源得到证明。西欧中世纪的城市是西欧封建社会基本形成后才慢慢出现的。从它产生之日起，就没有被组织到旧结构的框架中去。

关于西欧中世纪城市的起源问题，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如“公社”起源说，“庄园”起源说，“市

场法”起源说，“卫戍”起源说等等。有人认为它们是罗马社会残留下来的，有人则说是宗教集会中心形成的。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上述起源说并不正确。中世纪西欧的城市既不起源于伯爵的城堡，也不起源于大教区管辖的中心。从地理位置上讲，它们建立在商业贸易的交结点上，出现在封建关系最薄弱，封建统治鞭长莫及或权力真空的地带。例如，中世纪德国的城市，最初是一些商人从伯爵领地中借来的“城堡防效区”或公有土地，用栅栏围起来，作为临时售货点或居住点。他们付给领主一些租金。逐步地，栅栏内形成了一种不同于领主庄园的社会生活，一种不同于领主庄园的政治经济关系。

正因为中世纪西欧的城市不是旧社会结构的有机部分，而是掺进旧机体的异物。所以在这些城市中，旧社会结构的控制力量相对薄弱，无法阻碍潜组织因素的结合。尽管西欧中世纪的城市较小，无法同东方封建大国的城市相比，但却使资本主义结构的潜组织因素很好地结合了起来，并日益地发展、壮大。历史学家们认为，虽然西欧中世纪城市有各种各样的差异，却存在着三个共同的要素，即：贸易、市民和市政府。这三者不仅是新社会结

构的基本要素，而且一旦出现，就是完备的，可以互相结合的。它们彼此之间形成了功能耦合系统。

因此，在西欧封建社会中，潜组织要素的产生和潜结构的形成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在西欧封建社会远未衰落之际，潜结构就顺利地形成了。其标志是城市自治。自治意味着建立一个政治机构来对新经济结构进行调节，突出表现在设立一种保护机构来对抗领主，维护市民生活和商业贸易，并为市民文化的生长提供土壤。虽然城市自治政府并不能完全排斥领主的权力，他们不得不缴纳赋税并服役。但他们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城市有自行管理的行政官，有团体印章，有市政厅和钟塔。即使是封建税收，也是由城市政府来课税，领主不能直接征收。

城市的兴起在人类历史中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城市自治也并不罕见。但中世纪西欧的城市却是史无前例的创造。说它史无前例，并不是指城市贸易中心和商品经济的特点，而是指它同原有社会结构的关系。中世纪的城市自治与古希腊罗马的城市自治根本不同。希腊罗马的城市虽然也实行自治，但它们是罗马帝国社会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在维系帝国政治文化统治的同时，又是帝国赖以生存的经济命脉。尽管在后期城市对整个社会生

活发生着越来越重大的作用，但对于西欧封建社会的结构组成来说，城市是无关紧要的。

正因为如此，当旧结构之桶瓦解时，它不仅可以独立存在，还会一天天壮大，成长为一个新社会的容器。无论是西欧封建社会还是日本，我们都可以看到一种奇特的历史进程：城市的壮大繁荣和封建社会的衰落同步。而不是象中国，拜占廷的封建社会和古罗马所见到的那样，城市兴盛于旧社会结构的鼎盛时期，又与旧社会结构一起瓦解。公元十二到十四世纪，是西欧封建社会衰落的时期，而西欧城市的数目却在此时增长了十倍，每个城市的人口也平均增长了两到三倍。众所周知，资本主义潜结构，正是在这时形成的。日本的城市在形态上似乎与西欧中世纪的城市有很大区别，但它也是在庄园领主经济和贵族政治的背景上出现的，所以，在城市自治权的获得，自治权的增长，以及城市繁荣与幕府衰落同步等方面，与西欧城市基本一致。日本的史学工作者曾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每当幕府衰落时，旧的领主政治关系网破裂，日本社会的结构处于动荡之中，城市就迅速发展。一旦新的幕府建立，封建领主和武士的政治关系网又组织起来，城市的发展就受到限制，甚至出现衰落。毫无

疑问，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与日本封建社会的特殊结构密切相关。

十九世纪中叶，日本最后的一个幕府——德川幕府急剧衰落。德川幕府每年的赤字达 59 万 两，1854——1856年，赤字增达70万两。①而当时城市经济却欣欣向荣。属于世界最大的城市，它就占了三个，即江户、京都和大阪。②将军和大名都不得不向新兴的资产阶级借债。仅大阪一地，新起的资本家借给全国大名的钱就有六千万两之多。各地大名每年运往江户、大阪、京都三大城市的大米有400万石，其中作为这六千万两的利息就有300万石。③幕府和各藩财政日益困难，不得不克扣和削减下属的俸禄，武士一天天没落，转而经商求学，封建贵族特权及政治力量日益削弱。相反，城市市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力量一天天强大起来。日本维新派的胜利，标志着日本向近代资本主义结构的转变。在经济上，它依靠了商人和市民给予倒幕派以相当大的财政支持。据统计，新政府在内战期间的

① 参见李家桂、许永璋《日本倒幕运动成功原因试析》，载于《郑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

② 休·帕特里克，亨利·罗索夫斯基《亚洲新巨人——日本的经济是怎样运行的》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6页。

③服部之总《明治维新讲话》，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9页。

军费和财政开支，均靠发行“太政官札”和其他不兑换纸币以及向三井等大商业资本家借款来解决。①对于“库乏铢两之储”的新政府来说，三井的向背实起决定性的作用。三井的财政援助，首先是军事援助，据说从官军东征开始到进入江户前后，合计约十万两。②城市之所以能有这样的经济实力，正是因为它具有不随着旧结构瓦解而衰亡的特点。明治维新成功的另一个条件是兰学为维新派提供了意识形态基础。市民及下级武士同王权结合，形成了国家资本主义政治结构。这个条件也同城市的繁荣有关。在日本如果没有一天天壮大的城市，兰学也就不可能生根，成为新社会结构的潜组织要素。新的政治、经济，文化子系统就不可能耦合起来，当然也就不会向近代资本主义转变。

总之，资本主义社会兴起的过程很象埃舍尔的名画“解放”。最后飞出的那些天鹅就是资本主义结构。它们是从画面上的那个白色三角形演变而来的。如果我们说，那个白色三角形代表着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三个子系统构成的新结构——中世纪

① 井上清、玲木正四《日本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7页。

② 柴垣和夫《三井和三菱——日本资本主义与财阀》，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15页。

城市的话，那么，它在画面上恰好是黑色图案本身的空隙部分。黑色图案代表着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结构。应当说，任何一个人在挥毫做画之时，都无法担保图案的空隙部分正好形成一个潜图案，就象一个组织的否定和异化不一定恰好是另一个组织一样。而西欧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的转化恰好是这样的关系。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刚好同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相反，统一的资产阶级政府刚好同分裂割据的贵族政治相反，现世的人文主义思潮又刚好同注重永生的基督教相反。只要旧的封建结构瓦解，相反的白色图案就放大。这种特殊的取代机制只有类似西欧封建社会的结构才有。我们认为它正是西欧封建社会最先演变到资本主义的原因。

5-2 影响资本主义确立过程的三种因素

人们自然不会满足于这种高度宏观的分析。因为中世纪的英国、法国、德国都确立了大致相同的封建结构。但是，资本主义社会建立的过程却大不相同。其中，英国最先确立了资本主义结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经历了大革命的风暴，比英国晚一个

世纪之多；而德国的封建社会最顽固，整个取代过程步履维艰。既然英国、法国和德国在中世纪的社会结构基本一样，为什么资本主义取代封建社会的过程有如此大的区别！只有解决这些问题，才能对资本主义在西欧确立的原因获得进一步的理解。

实际上，这三个国家封建社会结构相同只能决定结构取代的第一、第二阶段相同，即城市在封建结构中的状况相同，它保证了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及结合为潜结构的情况大体一致。无论英国、法国，还是德国，在十四世纪以前，城市发展的规模和程度都大致相当，然而，资本主义结构的建立有待于潜结构的壮大，并取代旧结构。结构取代的第三阶段完成得是否顺利，就要看其它条件了。中世纪后期，随着封建社会的衰落，城市的数量和规模都有了很大发展，已经具备了最后取代的可能性。虽然旧结构已经松弛，摇摇欲坠，但潜结构要占据主导地位，还有许多困难。最大的障碍就是如何消化象海洋般的农村。资本主义结构从潜组织发展到占主导地位，意味着原来仅限于城市的市民社会要放大成整个社会。不仅其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三个子系统有待进一步的成熟，更重要的是战胜农村，统治农村。用管理城市的办法管理整个社会，

用经营工商业的办法去经营农业。这个问题是以往社会结构的历史变迁中没有遇到过的。

在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产生以前，任何类型的封建社会都是以农村生活为其主要特征。中世纪后期的城市虽然强大，但整个市民人口却不到总数的20%。城市虽然是一个潜在的新社会结构，但对农业社会来说，每一个城市只是一个小得可怜的潜组织。一个个城市星罗棋布地生长在农村的海洋之中，只有把它们联合起来，才有可能战胜农村。这个过程是不会自发实现的。把一个个的城市变成统一的城市文明所遇到的内在障碍就是城市自治。中世纪的城市既然能从旧结构中游离出来，本身就具有另一种封闭性。这种封闭性在结构取代的第一、第二阶段起着保护的作用，但在第三阶段就成为取代的障碍。正如本书4.2节中所说的农奴制世袭领地可以从罗马帝国结构中剥离下来而具有封闭性一样，历史的辩证法在这里又一次阐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对新事物的成长来说，每一次轻而易举的胜利都会带来未来的艰难困苦。自治城市虽然发展很快，却不可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去实现统一。

有关自治城市必然带来封闭性的问题，古希腊社会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顾准同志对此作了精辟的

论述。他认为，希腊的自治城市和城邦民主制必然形成每一个城市以自己为中心的“城邦本位主义”，既使城市间的文化是一致的，经济上是非自给自足的，但自治的外壳却使政治上难以实现统一①。显然，罗马帝国建立统一的城市帝国，依靠的是罗马军团去实行民族征服战争。实际上，古代社会中那些包容众多城市的社会结构都不是依靠城市自身的放大建立的。无论是中国封建社会，拜占廷或阿拉伯帝国，都是如此。中世纪城市虽然性质上和古希腊罗马的城市不同，但自治带来封闭性这一点却很类似。

那么，资本主义潜结构怎样才能不断壮大，才能克服自身封闭性的障碍呢？显然，要使潜结构发展到主导地位，必须使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结构都突破城市的外壳，伸展到农村去。因此，它必须完成如下三个转变：第一、把城市中原来仅仅建立在商业和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推广到农村去。在十八世纪产业革命以前，欧洲经济结构中最重要的部份仍然是农村。中世纪城市资本主义关系仅仅出现在商业流通和手工业中。使经济结构完成

① 参见顾准《希腊城邦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从封建经济全面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变，必须实现农业的资本主义化。第二、市政厅转变为资产阶级政府。中世纪每一个城市都有它的自治政府，但是这些政府的总和并不等于一个资产阶级政府。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利益，对其它城市的利益它往往无动于衷。因此，它们的总和不能代表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因为城市本身具有离心倾向，资本主义政治结构的最后取代不可能通过各城市为维护自已利益建立城市同盟的方式来实现。德國中世纪的城市同盟就是例子。1265年瓦解的“莱茵同盟”曾有100个城市参加。1376年内乌尔姆、康士坦茨等14个城市组成的“士瓦本同盟”，最兴盛时也有80个城市参加。著名的“汉撒同盟”曾控制北方海上贸易数百年之久。但是，这些城市同盟都不关心德国的统一，没有组成统一的资产阶级政府。因此，要把一个个城市中市民独立的政治力量组成一种统一的资产阶级政府，完成政治结构的取代必须通过凌驾于城市之上的统一力量，需要一种能够把他们组织起来的中介。第三、市民意识形态要成为整个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虽然人文主义可以在市民的城市中占主导地位，但不要忘记，在中世纪后期，市民充其量占人口总数

的20%，市民文化在广大农村占据统治地位谈何容易。要做到这一点就要给人文主义内核披上宗教的外衣，使其与旧的意识形态结合起来，深入农村，统治农村。显然，这三个转变反映了资本主义潜结构发展成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所必须的过程。只要其中之一没有完成，资本主义结构的取代就不能最后实现。

那么实现这三个转变需要什么样的社会条件呢？从英国圈地运动和德国容克地主向资本家转化过程中，我们看到，实现第一个转化的条件是保证资产阶级能够顺利地进行土地兼并。实现第二个转变需要强化王权来作为实现政治统一的中介。第三种转变则需要宗教改革。新教中既有人文主义的精神，又披上了宗教的外衣。

现在，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英国、法国和德国建立资本主义结构的方式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其原因正是这三种转变进行的速度和方式不同。虽然中世纪时这三个国家的社会结构基本相同，但王权兴起的时间不同，市民力量和诸侯力量的对比不同。这些因素一般不影响潜组织要素的出现及潜结构的组成，但影响潜结构发展成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的历程，从而对结构的取代的第三阶段造成重

大影响。

我们先看政治结构的取代。市民组织要强大起来、统一起来，作为在全国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一定要依靠王权来做为中介。王权的强大和城市的联合可以成为国家在政治上统一的中介。但如果王权过分强大，事物就会向另外的方向转化。王权毕竟不代表新的社会结构，它会反过来成为取代的障碍。因此，王权、诸侯和市民力量在不同时间的对比及变化，对政治结构的取代有重大影响。

这种复杂的影响也会从经济结构的取代中表现出来。要使封建的农业经济转变为资本主义农业经济，常常是先把农奴转变为自耕农或佃农；再把自耕农或佃农变为农业工人和雇佣劳动者。（见图5•1）而农奴转变为自耕农是一个可逆过程。关键取决于封建社会中诸侯力量、市民力量、王权力量之间的对比。众所周知，市民力量的强大和王权的强大有利于农奴转化为自耕农。相反，诸侯力量强大则可以使自耕农再度沦为农奴。因此，经济结构转化的关键是这三种力量的消长。王权和市民力量的增长对破坏封建农奴制经济有利。所以王权的强大有助于经济结构的转化，但是不是越强大越好呢？并不是这样。因为市民力量增长引起经济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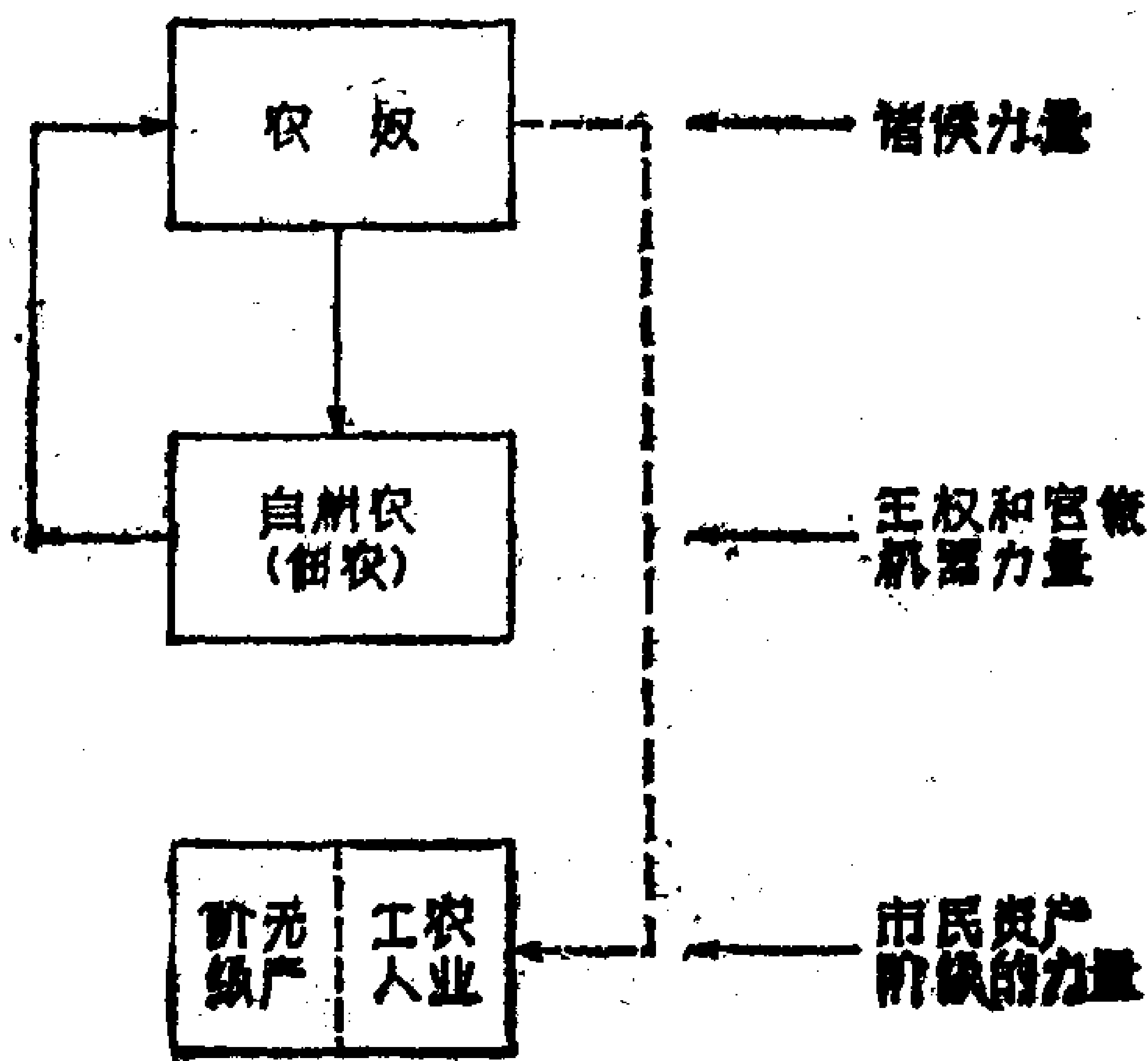


图5.1 经济结构的变化与政治结构中三种力量的关系

变化的机制与王权增长引起经济结构变化的机制是不相同的，它们的作用方向也不同。市民力量的增长标志着城市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不断地战胜领主经济，而王权的强大对庄园的破坏则是另外一种机制。王权通过官僚系统去限制和削弱农奴对领主的依附关系，特别是国王剥夺领主在领地内的权力，更有利于农奴向自耕农的转化。王室领地扩大，官僚系统控制全国，标志着剥夺领主对农奴的人身控制。一旦农奴摆脱对领主的依附关系，就由自己过去份地的大小来决定它是自耕农还是佃农。对于国

王和市民来说，转变农奴为自耕农的目标是一致的。但这种转变一经完成，下一步利益会立即背道而驰。王权要限制土地兼并，保护自耕农利益，以便扩大税收，巩固统治。资本主义经济却要求瓦解自耕农经济，使农民变为雇佣劳动者。因此，王权强大到一定程度，又会与市民利益相冲突，反过来遏制城市的力量，阻碍经济结构的取代。同样，这三种力量的不同，宗教改革的方式和道路也不相同。

因此，这三种力量不同的增长方向，也就决定了英国、法国和德国的不同道路。首先，假如王权的力量增长过快，压倒市民与诸侯力量之和，王权就可以依靠官僚系统形成绝对君主政体。那么，国家虽然统一了，却不是资产阶级的国家。王权虽然在早期充当了中介，后来却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王权与市民阶级的冲突会日益尖锐起来，资产阶级的政治结构只有经过一场激烈的社会动荡才能确立。显然，这是法国式的道路。第二，王权与市民结盟消弱了诸侯的力量，但王权的力量增长不快，官僚机器也不完善，王权既充当了转化的中介，又没有能力长期停留于绝对君主制阶段。结果，经济结构由自耕农经济迅速地向资本主义经济

转化，很快实现了结构取代。这是英国式的道路。第三，由于王权长期衰落，封建经济的瓦解主要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诸侯力量大于王权力量与市民力量之和。那么，王权就无力充当中介了，统一的国家也就建立不起来，资本主义政治结构的壮大就会遇到巨大的障碍，以至旧社会瓦解后结构取代仍不能完成。那么，旧结构在瓦解过程中会反过来对潜结构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使城市衰落，自耕农向农奴倒退，出现所谓“再版农奴制”。结果资本主义长期不能发展，这就是德国的状况。下面，我们来具体剖析一下这三条不同的道路。

5-3 议会和三角形均势：英国捷足先登

我们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一下王权力量、诸侯力量和市民力量怎样变化才会使资本主义潜结构最容易取代旧结构。显然，市民力量直接代表着资本主义潜结构的壮大程度，诸侯力量代表旧结构的势力。那么，王权力量代表什么呢？前一节我们指出，王权在政治上代表统一的封建政府，经济上则要维持自耕农佃农经济，意识形态上则处于旧教与新教之

间。显然，这正是封建结构和资本主义结构之间的东西。（见图5.2）王权实际上代表西欧封建社会结构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之间的中介结构。它不同于西欧典型的封建结构，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结构，是结构取代的中间阶段。中介既然要完成结构转化的桥梁作用，那么，它的最优状态就是既存在，又不稳定。任何中介体过于稳定都会使转化停滞于中间阶段。因此，王权、诸侯、市民力量只有具备如下模式，中介体才是最优的。这就是，诸侯力量不断减弱，市民力量不断壮大，当市民力量强大到一定程度后，王权力量的增长受到遏制。如果这三种力量如此有序的消长，取代进程便最为顺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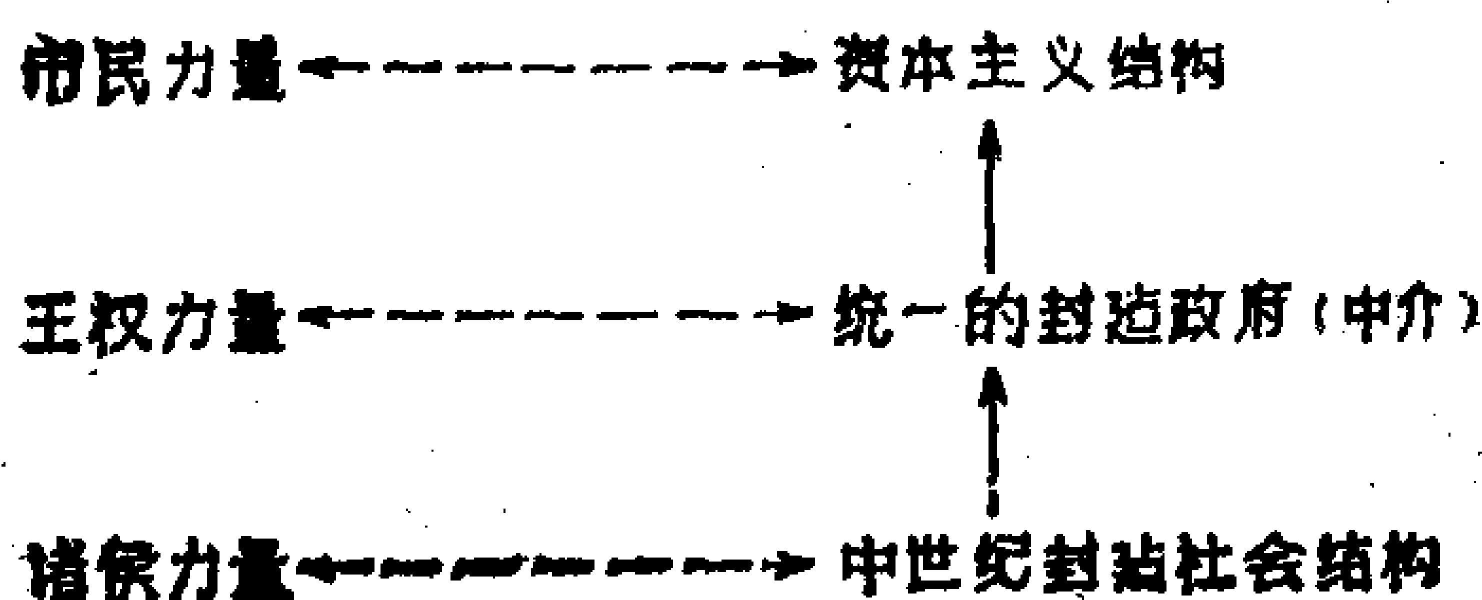


图5.2

一般说来，在封建社会中，市民力量随着资本主义潜结构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增长，诸侯力量则随着旧结构的瓦解而削弱，但王权力量的发展却可以大起大落，诸侯力量强大到一定程度会使王权迅

速衰落，而王权力量一旦强大起来，官僚机构的膨胀速度会大大快于市民力量的增长速度。怎样才能使王权力量处于最合适的比例呢？唯一的办法是利用王权、市民和诸侯之间的复杂关系，依靠它们两两结盟的机制。王权与市民在维持统一方面利益一致而与诸侯对立，诸侯在反对官僚机构方面和市民利益一致而与王权对立，王权和诸侯在维系小农经济方面一致而与市民对立。这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它们三者可以在不同条件下两两结盟。

我们可以从理论上证明，当王权、诸侯、市民存在着两两结盟的可能性时，它们三者的力量一旦符合三角型条件，就能保证王权作为一种最优中介体。

所谓三角型条件是指这三种力量任何两个相加都大于第三者，就象三角的任何两边相加都大于第三边一样。只要市民、王权、诸侯三种力量的比例符合三角型条件，它们中的任意两个联合都大于第三者（见图5.3)就能保持王权中介的存在，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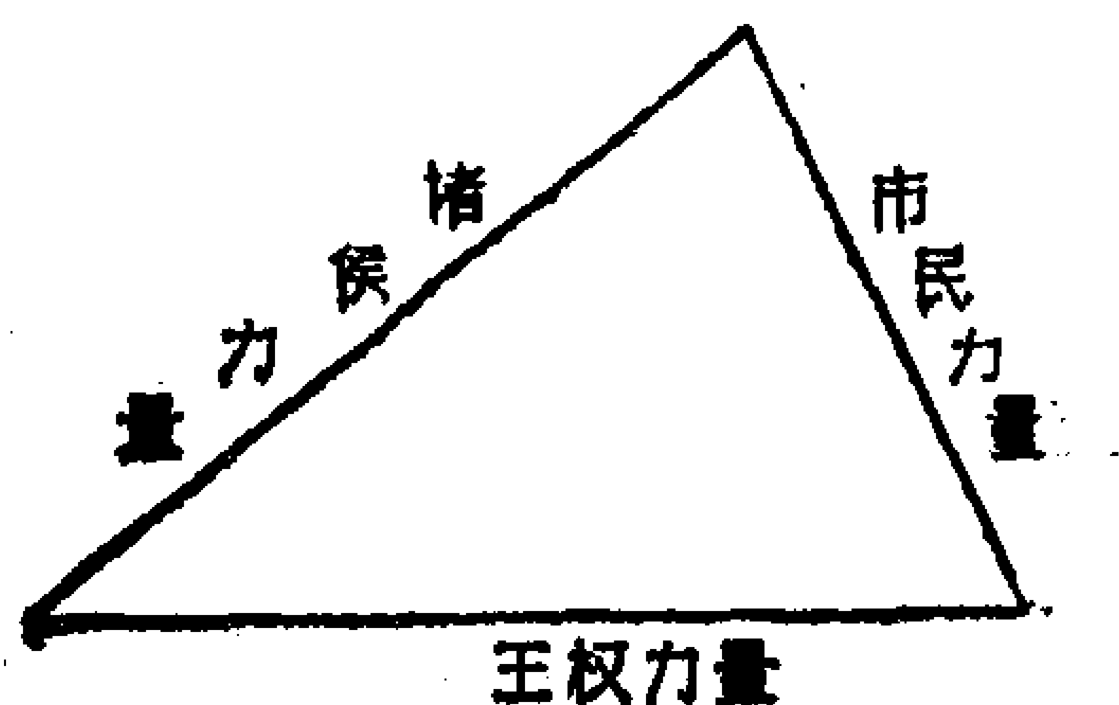


图5.3　王权、诸侯与市民力量的三角均角

控制王权的膨胀。当王权弱小，诸侯力量强大，威胁国家的统一时，市民力量与王权力量的联合大于诸侯力量，就可以保证国家的统一。当王权力量过大，市民又转过来与诸侯结盟，两者的力量就可以遏制王权的增长。当然，另一种结盟的可能性也存在，那就是王权与诸侯结合反对市民。但我们知道，封建社会结构由于其内部功能的异化，不可避免地有诸侯势力减弱、市民力量增强的历史趋势。

这样，我们就从理论上推出了一个结论：只要王权、诸侯、市民三者存在两两结盟的可能，它们的力量满足三角型条件，就会出现一种最佳的中介体，使结构取代最为顺利。英国之所以最早进入资本主义，正因为它具备了这个条件。

从历史上看，西欧各国中最先出现强大王权的是英国。这同威廉公爵征服英格兰，输入西欧封建制度直接相关。诺曼底军队一共有12000人，其中被分封土地者有5000人。而当时英国人口已达150万。①为了维护少数外来者的统治，英国必须强化

---

① 威廉·兰格《世界史编年手册》古代和中世纪部分下册，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389页。

科斯敏斯基、斯卡斯金主编《中世纪史》，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93页。

王权。在封建社会早期，市民阶级尚未兴起之时，王权往往是比较脆弱的，常常如昙花一现，很快被膨胀了的诸侯力量所吞没。但英国在十二世纪以前，由于存在特定的条件，王权一直保持着相当的力量，这是因为英国诸侯的土地是在征服过程中逐步分封的，所以诸侯封地往往很分散，这一点与欧洲大陆的情况不同，诸侯力量的发展不致于很快强大到威胁王权的程度。另一方面，王权却可以联合英吉利人反对诸侯，这一切使英国的王权在十一到十三世纪时一直保持相对稳定。从1086年国王颁布的土地调查书的内容可以看出当时王权力量的强大，连农民圈养猪的数目都有记载。国王通过土地调查，普遍建立起向诸侯征收土地税的制度，这在西欧大陆是罕见的。表5.1是1086年和1279年英国剑桥郡的大、中、小庄园的百分比数目。这表明，在11—13世纪期间，英国诸侯力量的发展受到遏制，农奴维兰的平均份地也由60英亩减至15英亩①。十一世纪后，英国的城市开始兴起，到十三世纪时，市民力量日益强大。此时王权更可以联合市民反对贵

① 孔令平《中世纪前期英国的田制与北魏均田制的比较研究》，载于《世界历史》1981年第5期。

年　代	大庄园百分比	中庄园百分比	小庄园百分比
1086	58%	34.2%	7.8%
1279	23.5%	38%	38.5%

表5·1　英国剑桥郡11—13世纪庄园变化

族诸侯。亨利二世曾颁布武装诏令，建立由市民和自耕农组成的武装民兵，以摆脱军事上对封建骑士的依赖。①

这样，到十三世纪后，英国王权力量、市民力量，诸侯力量顺利地走进了三角形平衡区，建立了社会结构取代的最佳中介状态，王权既不会被诸侯吞没，也不会过分强大。当诸侯的分裂倾向严重时，王权就与市民联合起来，去保持统一；当王权出现专制的倾向时，市民就与诸侯携起手来，防止官僚机构和国王权力的膨胀。由于两两结盟的可能性存在，任何一方也不能用自己单一的力量形成独自统治的格局，只能出现相互维持均势的局面。这时，历史要求出现一种新机构，一种新制度，它能够体现三种力量的均势，执行两两结盟，遏制一方

① 威廉·兰格《世界史编年手册》古代和中世纪部分，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393页。

的功能。这种机构果然被创造出来了，它就是君主议会制度，历史证明，这种通过两两结盟遏制一方不占绝对优势的机制，不仅是早期英国议会的主要职能，而且还反映了议会成长的过程。

英国议会产生于十二世纪亨利二世召开的“大会议”。考察一下亨利二世为什么要召开大会议是很有趣的。1135—1154年，诸侯割据力量有超过王权的趋势，贵族发动了叛乱，亨利二世不得不与平民力量结盟，利用骑士和市民的支持同封建主进行斗争，拆除了在内乱中封建主修建的城堡，并把与市民的结盟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规定骑士、市民和自由农民都有权越过领主法庭直接向国王法庭上诉，从法官和军人，而不是从贵族中选拔郡长，取消骑士的军役，代之以“盾牌税”，等等。①这次结盟的直接成果是召开由国王、市民和领主三方参加的大会议，从而出现了议会制度的萌芽。

十三世纪初，英国王权增长过快，诸侯和市民又结盟反对王权。当时，约翰王借助官僚机构的力量不断扩张势力。由于他反对教皇的失败，每年要向教皇交纳一千镑的重税，于是他把负担转嫁到诸

①参见王荣堂《略论英国议会的起源》载于《史学月刊》1983年第4期。

侯和市民的身上，通过没收诸侯土地，任意增加城市新税等办法，获取资金，膨胀官僚机构，扩大王权。英国眼看就要走上绝对君主制的道路。因此，诸侯与市民力量之和开始发挥作用，1215年在大贵族的领导下，贵族、骑士和市民联合举行大暴动，约翰被迫于当年6月15日签署了著名的《自由大宪章》。《大宪章》肯定了“大会议”的权力，强调国王只有取得“大会议”的同意，才能向封建主和市民征收额外的临时税和附加税。大宪章规定：国王必须遵守法律。如果国王违法，臣民有权强迫他尊重法律①。

在十三至十四世纪，两两结盟的情况在英国屡屡发生。1258年，亨利三世为了给儿子谋取西西里的王位，不惜破坏《大宪章》，强迫贵族和骑士交纳其收入的三分之一给王室。这时，又出现了贵族和市民的联合。大贵族们用武力冲进王室，迫使亨利三世驱逐法籍大臣，实行改革，再度召开“大会议”。1258年6月，“大会议”在牛津开幕，通过

① 科斯敏斯基、斯卡斯金主编《中世纪史》，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13－416页。

英国《自由大宪章》，《中世纪中期的西欧》，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9—82页。

了著名的“牛津条例”，国家政权暂时交给诸侯操纵的15人会议掌管。这时，诸侯们已经懂得，如果仅仅依靠他们本身的力量不可能战胜国王，所以，以孟福尔为首的主张长期与市民结盟的开明集团战胜了顽固派，终于在1265年，创建了现代议会的雏型。以后三十年间，两两结盟的现象仍然不断出现，到1295年，爱德华一世不得不承认三角均势，召开议会。当时出席议会的成员有 400 多人，其中大主教2人，主教和教士18人，修道院院长 66 人，其它宗教阶层的首脑3人，伯爵9人，男爵41人，骑士63人，市民代表172人①。这次会议史称“模范议会”。②从此确立了以三角均势为背景的协商政府的形式。

这说明，在任何两方的结盟都可以压倒第三方时，整个社会的各种政治力量迟早会明白，与其在军事政治斗争中表现实力，不如由三方共同建立一个协调机构，用表决来解决问题。从此，议会制度就被历史创造出来了。那些死要面子的贵族表示不屑于同市民一起开会，议会不得不一分为二，贵族

① 科斯敏斯基、斯卡斯金主编《中世纪史》，三联书店 1957年版第416—422页。

② 王荣堂《略论英国议会的起源》，载于《史学月刊》1983年第4期。

组成上议院，市民组成下议院。在国王、诸侯、市民三者中，国王力量最强，故处于领导地位，设立了一个“常设咨议会”，即枢密院，它代表国王执掌行政大权，这就是内阁制的萌芽。十四世纪以后，代表三角均势的议会正式确定为一种制度。到了十五世纪，议会取得了整个立法权。这种由于三角均势导致的议会制度，对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取代封建社会结构起了重大作用，它使王权在取代过程中充分实现了中介体的作用，而不是障碍。

议会制度的一个重要作用是阻止官僚机构的膨胀。英国虽然很早就设置了官僚系统，但由于三角均势的存在，立法权牢牢地掌握在议会手中，官僚机构不可能膨胀起来，只能一直处于“吏”的地位。1694年，议会颁布法令规定税务人员不得参加议会。1701年又规定，凡领取皇家薪俸和养老金的官员不得成为议员。稍后，又规定政府部门的官员，除少数高级官员外，不许参加党派和政治活动。1710年又颁布法令规定，任何邮政人员通过口头、书信或其它方式运动选民，要受到罚款和免职的处分。后来又规定取消邮务人员、税务人员和警察的选举权。这些规定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英国的文官始终不得兼为议员，不得介入党派活动。议

会手中掌握着立法权，是官僚机构膨胀的巨大障碍。

人们常说，英国之所以最早建成资本主义，是同英国的贵族与资产阶级关系密切相联的。大量的中小贵族经商，经营土地，和市民打成一片，所以他们能和市民结盟限制王权，那么，为什么独独英国的贵族如此开明？为什么英国从事商业的贵族们不耻于市民事业呢？究其原因，关键是官僚机构受到议会的遏制。我们知道，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封建关系解体，贵族骑士有三种转化道路：一是动摇长子继承制，诸侯的土地越分越小，诸侯人数越来越多，土地日益分割，大量贵族不得不成为游手好闲者或拦路抢劫的匪徒；二是失去封地的贵族转变为国王的官吏，即贵族子弟成为官僚机构的来源；三是贵族去经商。这三条道路在封建社会中都是可能的，但哪一种占优势则取决于中介体的状况。如果王权弱小，中介体不存在，那么必然出现第一种情况，即德国中后期的情况。如果王权过于强大，官僚机构发展很快，贵族无疑于倾向变成宫廷官吏，这也就是法国的情况。据统计，十六世纪法国享有各种特权的贵族多达100万人，①到十八世纪后

① 波梁斯基《外国经济史》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483页。

期还有40万左右，其中有爵号的宫廷贵族共约4000户。[1]在英国，这两条道路都走不通。诸侯的土地不能无限分割，王权也不能无限膨胀，社会秩序又相对稳定，贵族的其余子女只有经商。所以，十三世纪以后，英国慢慢地形成了一种传统，封地由长子继承，次子以下的贵族子女进入商界。当时大公司的学费往往要200—300镑，许多贵族子女不得不经商，形成了李尔本之类的特殊学徒阶层。

君主议会制中介体的形成，不仅促使贵族去经商，而且有利于资产阶级取得骑士的称号。由于英国很早就形成了三角均势、两两结盟的政治共同体，使三股势力在政治滚动中日益融合了身份差别。所以，英国骑士和贵族的爵号是廉价的，国王很乐意用它来增加自己的收入。资产者只要付少量的"盾牌税"就能进入骑士行列。在贵族政治或君主官僚政治系统中，身份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决定了贵族的政治权力。而在英国这种君主议会制系统中，身份制的政治作用逐步削弱了，甚至资产者把贵族的爵号作为一种负担，当时在英国有许多绅士

---

① 王荣堂《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页。

为逃避义务不愿接受骑士称号。查理一世在1630年对收入40镑以上无骑士称号的地主课以罚金。这一年就有13250人被罚。

这样，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只有英国最早出现由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发动土地兼并—圈地运动。王权为了自身的利益必然要维持自耕农的稳定，这在英国也不例外。英国国王曾多次颁布法令限制圈地，但英国已经形成君主议会制中介，大量的贵族经商，加入市民资产阶级的行列，土地就是他们最重要的资本。国王限制圈地法令的颁布及实行都要受到君主议会制中力量对比的限制。这样一来，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前，君主的力量虽还强大，但无奈市民和贵族的两两结盟，最终只能“限止”圈地的速度，而不能消灭它。所以英国的圈地运动出现最早、历时最长。随着君主议会制的力量对比的变化，圈地越来越不可遏制。据R·G·Lang研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一个世纪，议会议员的大多数已是圈地运动的支持者和获利者。如伦敦市参议员的140名富商中，有118人拥有田产。其中96人有309处庄园，平均每人3.2个庄园。当时富商市民把一半以上的资金用于经营土地。一个叫R·阿克戴尔的富商在十七世纪三十年代，用10000镑钱经商，

11485镑投资土地。①如果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由于议会内政治力量的对比，圈地运动还不能破坏自耕农经济的话，到资产阶级革命后，一系列加速土地兼并的法令颁布了，十七至十八世纪短短的一百年间，自耕农经济几乎全部消失了。

同样，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英国自上而下地进行了宗教改革，这在西欧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君主议会制中介体的存在，大量市民代表和资产阶级化贵族进入国家政权。英国的上层统治阶级中新教徒比例很大，才使亨利八世敢于因教皇不批准其离婚请求而同罗马教廷决裂。1534年国会通过“至高法案”，宣布国王是英国教会的最高首领，拥有任命教会的各种教职和决定教义的权力。有趣的是，在英国意识形态结构的这一变化中，君主议会制中政治力量的对比也起着决定作用。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前，虽然实行了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但改革很不彻底，而后议会与国王的斗争常常和清教徒运动互相呼应，这一点意味深长。它表明在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取代封建社会结构的进程中，意识形态结构的取代和政治结构的取代是同

① 顾晓鸣《略论十九世纪英国革命中的新贵族》，载于《复旦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第88—92页。

步的。国会战胜了君主，包含着人文主义内核的卡尔文教同时成为被普遍接受的意识形态。

自然，三角均势不可能永远保持下去，因为在整个封建社会瓦解的过程中，诸侯的力量是不断减小的，而市民和王权的力量却不断增加。总会有那么一个时刻，诸侯的力量已小到不足以支持三角均势，那时就会出现绝对专制王权。然而，此时市民的力量亦增长到相当的程度。①(我们可以设想，当王权力量增长，诸侯力量减小时，如果市民力量不同步增长，那么三角均势就不可能维系较长的时

① 我们用数学公式来证明这一点。令X、Y、Z分别代表王权、市民和诸侯力量。根据三角形的均势条件，议会存在时必然有：

$$\begin{cases} X+Y>Z & X>0 \\ X+Z>Y & Y>0 \\ Z+Y>X & Z>0 \end{cases}$$

假定Z为常数，就可以得到图5.4，显然，满足方程的X、Y在阴影区间。

这个区间的变化取决于Z的大小，当Z很小时，区间如图5.5所示。也就是说X=Y，这一结果的意义是：当议会存在相当长的时间，X、Y、Z在议会存在的条件下变动，随着Z变小，X、Y的大小趋于相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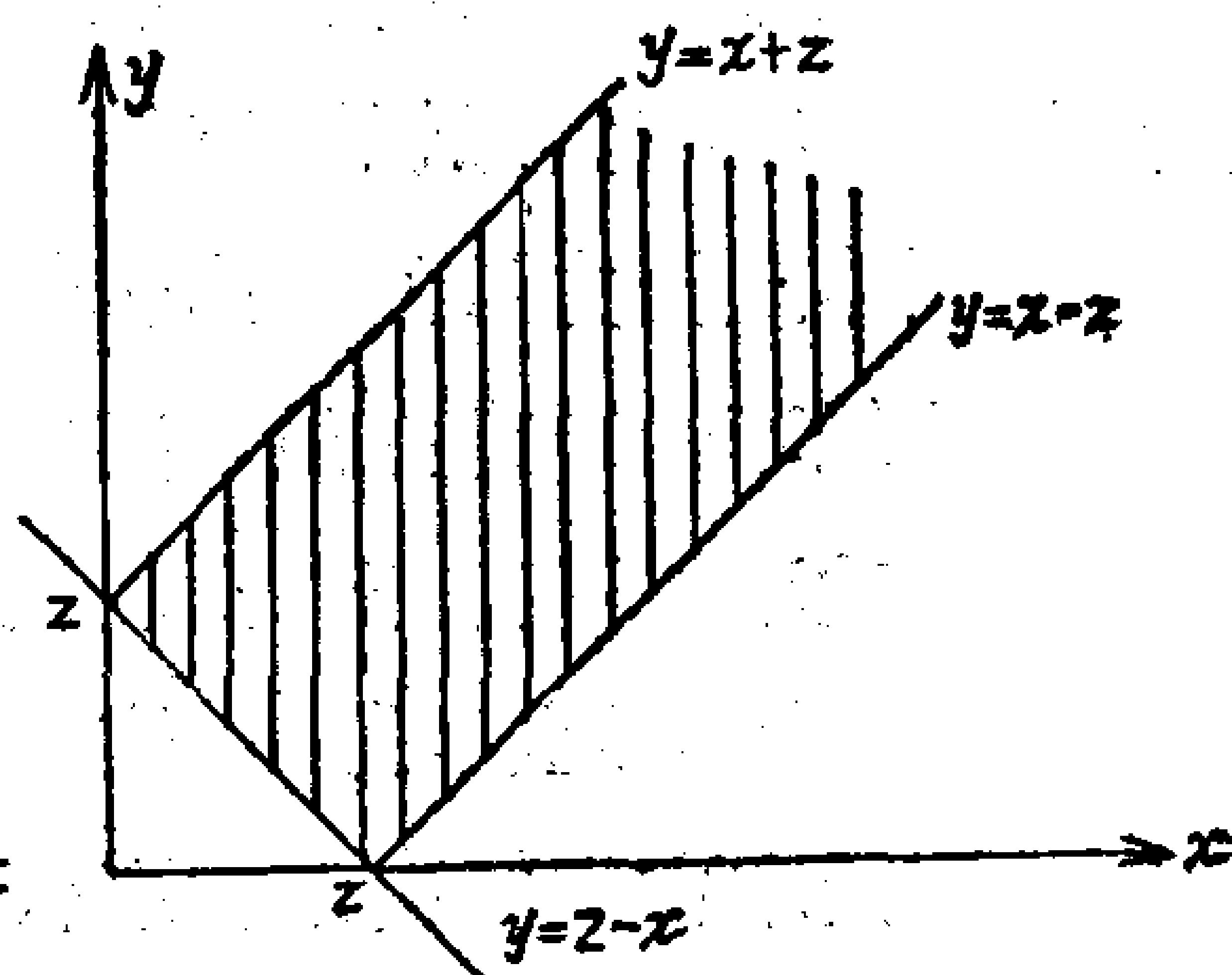


图5.4

间，而会迅速破坏。）因此，当英国绝对专制出现时，资产阶级以它与王权相差无几的力量出来抗衡。三角均势的破坏就预示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绝对专制王权很快就被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王权的中介作用结束，资本主义结构实现了取代。

5-4 官僚机构的阻碍和法国急风暴雨式的大革命

为什么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取代封建结构比英国晚一百年呢？为什么法国道路和英国道路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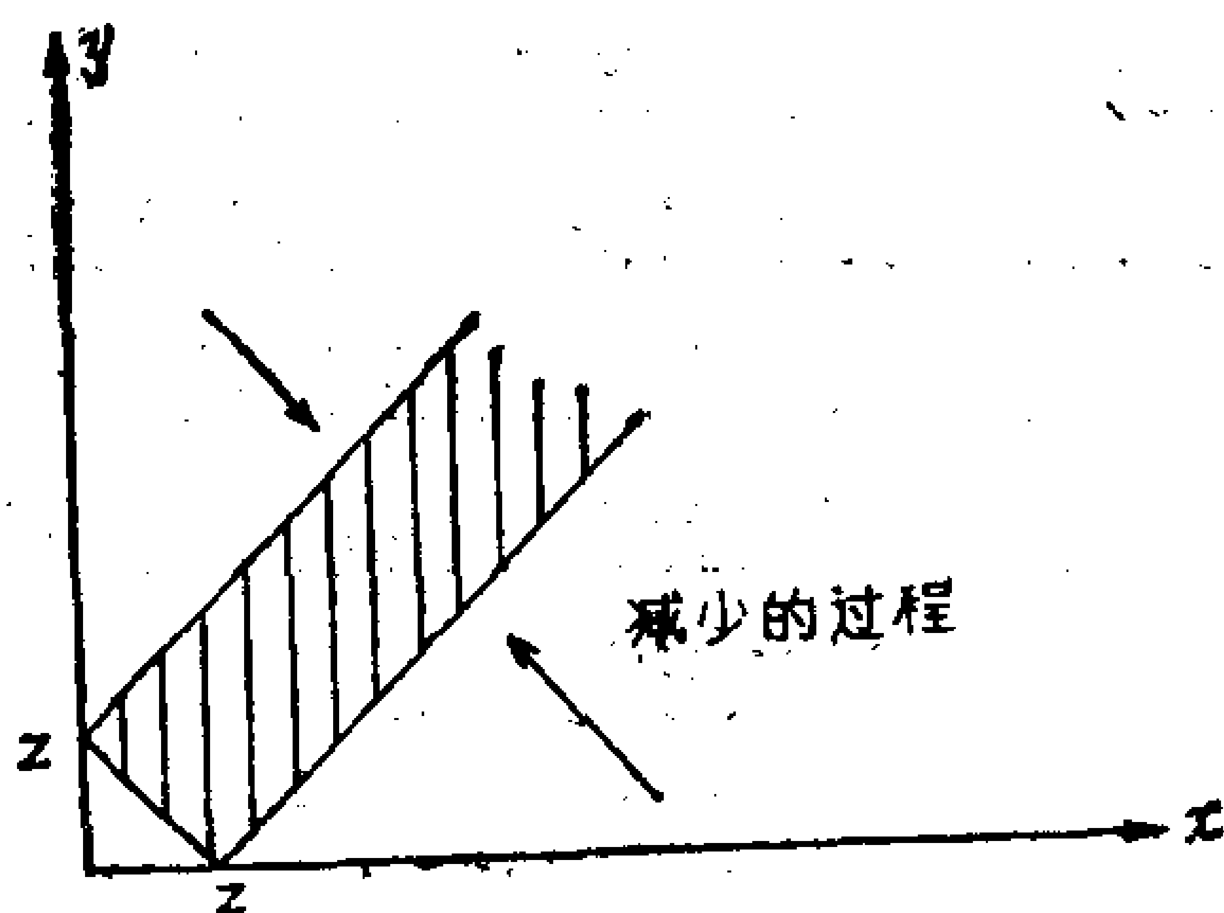


图5.5

不同呢？这是史学界长期争论、至今没有解决的问题。众所周知，在政治上，法国是采用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方式，用暴力推翻专制王权，建立了共和国，而不象英国那样采用君主立宪制实现了近乎于平稳的过渡。在经济结构的取代上，法国不像英国那样有持续了几个世纪的圈地运动，瓦解了自耕农，逐步迫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变成雇佣劳动者和农业工人。对英国来说，资产阶级政府确立前后自耕农的瓦解和雇佣工人的产生只是速度和规模不同。而法国大革命前这种转化过程几乎不存在。自耕农、佃农经济足足保持了两个世纪。法国大革命是市民、自耕农和佃农等第三等级反对封建专制政府的联合暴动。法国意识形态结构的取代也很特殊，从宗教改革的角度来看，它没有英国和德国彻底，但却采取了另外的方式，即通过启蒙运动来传播人文主义，因此声势比英国、德国更为浩大。

表面上看，这些特点似乎同法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比英国晚一百年毫无关系，但是，只要我们认真分析一下法国社会结构演变中王权、诸侯与市民力量的消长过程，分析一下法国王权的特殊形态，就会发现这些似乎毫不相关的现象完全可以得到统一的说明。

如果仅仅从中世纪后期封建制度的衰落，王权和城市力量的壮大这两点来看，法国和英国基本相同。法国王权的强大也相当早。十二至十三世纪时，英法两国王权力量与城市市民力量的对比相差不多。腓力二世时期（1180—1223年），法国战胜英国金雀花朝，夺取了金雀花朝在欧洲大陆的大部分领地，从而使王权一跃成为统一全国的力量。腓力二世也采用与市民结盟的办法来抑制诸侯力量。他实行了全国的司法、货币和军事改革，加强了官僚机器，他规定国王铸币为全国通货，促进了经济统一。①可以说，在十二至十三世纪，法国同英国一样，依靠王权与市民结盟大于诸侯的力量，实现了全国的统一，建立起中介体。但法国和英国有一点不同，法国贵族诸侯与市民之间的等级鸿沟比英国深得多，几乎是难以逾越的。英国的封建主义是从西欧输入的，诺曼底人带着血统等级制度征服不列颠后，不得不同英吉利人的各种观念融合，结果淡化了等级观念。而法国却是西欧封建传统的发源地，从八世纪到十二世纪约四百年中，贵族等级制度深深侵蚀了所有贵族的灵魂，于是就出现了一个

① 参见威廉·兰格主编《世界史编年手册》古代和中世纪部分下册，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455—457页。

与英国完全不同的情况，即诸侯与市民结盟极其困难。在英国，诸侯只要与市民在利益上一致，双方就会跨越等级鸿沟，携起手来反对王权。但在法国，这种结盟几乎从未实现过。十六世纪后则完全失去了结盟的可能性。法国国王把部分市民商人吸收进官僚机构。法王还把一些主要的税收包给商人高利贷者，包税者将税款预先垫付给政府，然后在政府的保护下向纳税人超额征税。这样一来，整个市民阶级被王权分化了，其上层和王权联合起来对付下层市民。于是，市民阶级作为一个整体与诸侯结盟的可能性势必丧失。我们知道，英国诸侯与市民结盟大多发生在反抗国王附加征税的问题上。但在法国，这种时刻来临时，被分裂了的市民阶级根本无力去同诸侯结盟。特别是由于法国盛行鬻官制度，一般的法官、财政官、税吏等职务，可以用纳捐的方式获得。资产阶级一旦捐得了官职，就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超额收回捐官的本钱。这样一来，上层市民商人进入官僚机构，成为穿袍贵族，王权与上层市民的结盟就更加牢不可破。最终使市民与诸侯结盟的可能完全消失。

据此，法国不存在英国那种王权、市民、诸侯两两结盟，形成三角均势的条件。它只有一种

可能，就是王权与市民结盟。这样，法国的王权中介体就形成了一种不同于英国的形态，不是君主议会制系统，而是短暂的三级会议和随后立即出现的绝对君主制政体。

毫无疑问，法国的三级会议类似于萌芽状态的议会制度。但是，由于法国不存在诸侯与市民结盟的可能，维持三角均势的机制被破坏了。由于王权势力的膨胀比市民力量的增长快得多，因此三级会议就不可能进一步发展为议会，而只能是绝对君主制的前奏。我们翻开法国三级会议的历史，可以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三级会议仅仅出现于王权弱小的时候，王权一旦强大起来，三级会议很快就被膨胀起来的专制王权所吞噬。法国的第一次三级会议是1302年召开的，到了1483年，王权足够强大之后，在70多年的时间里三级会议再也没有开过。十六世纪末，法国王权再度衰落，三级会议又一次召开。但到了十七世纪初，王权很快又占了统治地位，国王索性把三级会议取消了。直到法国大革命爆发前的170年间，三级会议竟然无人问津。三级会议两起两落的过程，说明法国缺乏维持三角均势的机制，由此不难理解法国王权与英国王权中介体之间的区别。

从理论上讲，三级会议出现的条件是王权力量小于诸侯力量，而王权力量加上市民力量则大于诸侯力量。因此它与市民结盟便能抑制诸侯，实现统一。1302年召开第一次三级会议，究其社会背景，表面上似乎是腓力四世与教皇的斗争，实际上是王权与市民联合反对代表封建割据力量的诸侯。在整个西欧封建社会中，教皇与诸侯在经济利益上往往是一致的。王权越衰落，诸侯力量就越强大，教皇的权威也就越巩固。但是由于法国没有市民与诸侯结盟的可能，三角均势不能保持，导致王权无限地扩大起来。三级会议从一开始就没有对王权的约束作用，它的主要职能是决定怎样分摊新税，不过对行政和司法的改良提出一些要求，根本不可能象英国议会那样迫使国王遵守法律。这就难怪法国王权和官僚机构会迅速地膨胀起来。当王权和官僚机构的力量超过诸侯的力量时，英国的议会会出现诸侯与市民的联盟以抑制王权，而法国的三级会议则绝不可能，唯一的历史结果就是停止三级会议，王权演化为绝对专制的形态。历史证明，1484年以后，王权凭借自己的力量已足以抵制诸侯的分裂割据倾向，因此三级会议就有70年没有召开。等级君主制走向了绝对君主制。

历史是幽默的，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它常愿意把内在规律向人们再现一次。十五世纪末，法王发动了侵略意大利的战争。1525年，法兰西斯一世在意大利被威亚大败被俘，丧失了在意大利占有的全部土地。紧接着，法国又陷入三十年宗教战争。连绵不断的战争，使法国的王权衰落了，诸侯势力膨胀起来。王权不得不再次与市民结盟，以维持国家统一的局面。三级会议又一次戏剧性地出现了。但到了路易十三时期,王权又强大起来,三级会议干脆被取消了。1614年，贵族为了限制一天天膨胀起来的王权，坚持要召开三级会议，但是城市代表不肯与诸侯结盟，他们都支持王室，贵族的计划完全失败了。很显然，法国和英国不同，市民宁可让国王取消三级会议，也不同诸侯结盟。因此法国的三级会议不能成长为资本主义政治结构性质的议会。路易十三的首相黎世留加紧从穿袍贵族中选择官吏，设立非常法庭，惩治叛乱贵族。法国的绝对君主制进入鼎盛时期。十七世纪中叶以后，专制王权官僚机构已强大到这种程度：即使市民与诸侯结盟，也不可能同它抗衡。1648年巴黎法院的贵族反对王权斗争的失败，就证明了这一点。

绝对君主制这种中介体决定了法国的资本主义

结构不可能和平地取代封建结构。强大的中介本身就是障碍。从政治上看，虽然它把一个个自治的城市和广大农村组织在统一的君权之下，自治城市的市政厅却是隶属于官僚机构的。虽然大批的穿袍贵族加入了官僚机构，但这毕竟不是资产阶级政府。它同君主议会制最大的区别在于没有包含一个象议会这样的资本主义政治组织。资产阶级虽然通过参加官僚机构获得了一些政治权力，但就一个阶级而言，它没有从旧的政体中分离出自己的组织形式，因此，要从绝对君主制这一中介体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必须首先粉碎原有政体。革命的过程势必十分激烈，而不像英国在君主议会制条件下能够实现较为短暂、顺利的变革。

从经济上看，绝对君主制一开始就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成长的，这使法国一度曾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但它焕发出来的生命力很快就会枯竭。因为专制王权要维护自耕农、佃农经济的稳定，特别是国王取得了对诸侯的胜利后，就开始限制资产阶级的发展。官僚机构成为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事实证明，法国进入绝对君主制以后，整个经济停滞在自耕农、佃农经济上。进入十七世纪以后，法国的农业已大大地落后于英国。可见，王权

和官僚机构的力量至多把农奴从对领主的依附中解放出来，却不能瓦解整个旧的封建生产关系。随着王权力量的膨胀，对自耕农、佃农的剥削一天天加重起来，到了十八世纪中叶，国王和贵族把大部分领地作为贡地分给农民或下一级领主，坐收贡赋。同时还保留了一部分领地直接出租，以获取高额地租。从领主那里得到份地的农民，每年要缴纳贡赋，他们被称作纳赋农或年贡农。向领主租种土地的农民，每年要以收获的一半来交纳地租，称为对分制佃农或分成制佃农。由于绝对君主制限制资本主义经济在农业中发展，封建剥削关系自身的发展使农民和贵族之间的冲突尖锐起来。当农奴刚刚被解放为佃农之际，整个农业生产充满了活力，但是，只要社会停滞在绝对君主制，农民获得的自由很快又被沉重的赋税、地租吞没了。在中世纪，领主的权利和义务是相互结合的。而绝对君主制剥夺了领主对领地的行政管理权，仅仅留下了领主对农民收租的权利。这就使领主对农民的经济剥削日益成为不可忍受的东西。因为贵族越衰落，剥削就越加剧。同时，膨胀起来的官僚机构不断加重农民的负担。十八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法国出现了一个封建反动时期，领主们把多少年前已被废除的各种税

收特权又强加在农民头上，如养鸽权、打猎权、桥头税、尘埃税等等。同期，国家的各类税收也急剧上涨，直接税在1715年—1789 年的 74 年间增加了69％，间接税在十八世纪增加了两倍。国税之高有时竟至夺去农民收入的一半。① 毫无疑问，绝对君主制的延续，使整个农民阶级同贵族、王室、官僚机构的矛盾一天天尖锐。最后导致了自耕农、佃农和市民的联合暴动。

绝对君主制中介体也给意识形态结构的演变带来了新问题。王权已经强大到可以控制教会的地步，天主教不过是王权手中维护正统的工具，这样，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已绝无可能。相反，宗教改革必然要以由下而上的农民反封建主、诸侯反王权的奇怪形式出现。十六世纪中叶的胡格诺战争就是典型的例子。但是，无论诸侯还是农民的力量，都不可能同王权抗衡。所以由下而上的宗教改革必然失败。这样，意识形态结构的取代就不能走宗教改革的道路。市民文化为了取得社会优势，不得不与宗教彻底决裂。这个过程漫长而痛苦，只有在激

① 王荣堂《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11页。樊亢　宋则行《外国经济史》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01页。

烈的冲突中才能完成。这正是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风起云涌的原因。法国的人文主义运动彻底抛弃了宗教外衣，以英国已经实现了资本主义结构为模式，系统地构造了新社会的蓝图。它彻底批判了王权、神权和一切封建特权，宣传建立“理性”社会，提倡民主，传播唯物主义，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结构最彻底的表现形态。

现在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法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比英国晚一个多世纪。从十六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水平和市民的力量来看，法国绝不比英国逊色。但是，由于中介体不同，决定了取代方式不同，因而取代过程和时间也都不同。无论是启蒙运动的展开及逐步深入人心，自耕农、佃农与王权贵族矛盾的日益激化，还是与王权结盟并进入官僚系统的资产阶级感到王权已是自己进一步发展的障碍，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法国资本主义结构对封建结构的取代，在政治上需要砸碎旧的政治结构进行重组，为此要学习消化英国已经建成的模式。这一切都使得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比英国来得晚，但方式上却更为彻底。

5-5 王权衰落和再版农奴制：德国的道路

如果把英国、法国、德国十六世纪的经济作一宏观比较，可以发现，德国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最高。德国的城市虽然比法国兴起得晚，但发展更快，整体经济水平已居欧洲首位。图5.6 是德国城市发展的曲线。①1507年威尼斯驻德大使奎里尼在写回国的报告中说，德国大约有1 00个自由城市②。这表明在十二至十五世纪之时，德国的资本主义潜结构正在迅速壮大。十三至十四世纪时，德国的农奴制几乎已经全部消灭。③十六世纪时，德国从事冶金和采矿业的工人已达12万人，占总人口的1%。④同时期的英国，采矿工不过3—4千人，十七世纪初，英国采矿工与运输工的总和也不过3万人。远远不及十六世纪德国的水平。这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潜结构随着封建社会的衰落而加速成

①④ 孔祥民《德国中古史》，第77页、第88页。

② 《1507年威尼斯驻德大使奎尼关于德国情况的报告》，载于北京师范大学编译《史学选译》第3期。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24页。

长。对整个西欧社会来说，无论是英国、法国还是德国，这都是一个普遍的规律。但是，与英国、法国明显不同的是，德国封建势力似乎特别顽固，资本主义潜结构取代旧结构格外艰难，这个过程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德国社会结构取代艰难的关键因素是缺乏中介体。众所周知，从公元九世纪到十九世纪，德国处于分裂状态达1000年之久，王权一直十分弱小。正是因为缺乏中介体的作用，虽然旧结构中资本主义的潜结构——城市十分发达，但无法统一起来，进而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

世界史上，德国王权的长期衰落始终是一个迷。十二至十三世纪时，英国和法国的王权日益强大，国家趋于统一。当时德国卓越的诗人瓦特·冯·福格尔魏德（1170—1230）曾这样哀叹德国的封建割据状态：

“德意志民族啊，我为你悲伤！
对秩序的嘲弄——这是你的景况。
甚至蚊子也有自己的国王。”

十六至十八世纪，英国已经实现了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法国已确立绝对君主制，德国却分裂成3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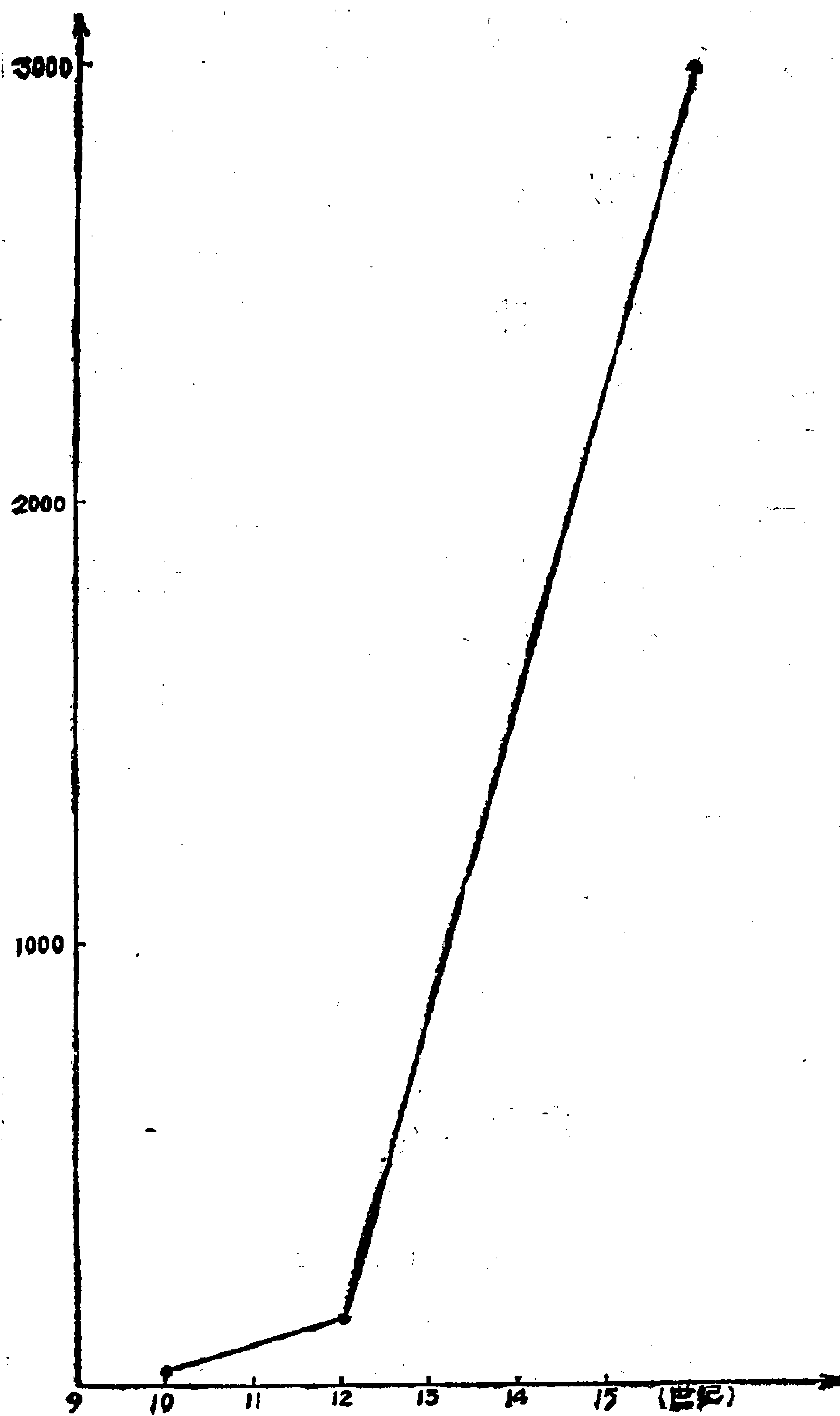


图5.6 德国城市的发展

个独立邦、50个自由市和1500个帝国骑士领地。有的邦国还不如一个中等的村庄大。为什么德国王权不能成为统一的中介力量呢?过去,史学界盛行的一种观点,认为德国王权的长期衰落是由于教皇力量过于强大而造成的。确实,在整个中世纪,德国教皇力量比英、法两国都强大,但是,教皇力量的增长与其认为是王权衰落的原因,不如看成是王权衰落的结果。在西欧封建社会中,教皇和王权是互相对立的,教皇总是支持诸侯反对王权,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在英国和法国,教皇力量之所以不能无限扩张,正是因为王权对他的限制。因此,要真正理解德国王权不能成为真正中介的原因,这就需要具体分析德国王权、市民和诸侯力量在历史上的消长机制。

在西欧封建社会的历史中,王权强盛起来并不是奇特的现象。但保证强盛王权的稳定,却需要一定的条件。对于德国来说,历史也曾提供了两次王权强大,实现统一的机会。第一次是十世纪中叶奥托一世在位时期。公元949年,奥托成为第一个完全控制五大公爵领地的国王。他是十九世纪以前,德国历史上最强有力的国王。但是,王权的优势并没能保持下去,随着诸侯势力的膨胀,很快就消失

在诸侯割据之中。我们知道，英国和法国保持王权的强大是有条件的。十一世纪时，英国国王和英吉利人联合起来抑制诸侯；十三世纪时，法国王权靠同市民的结盟保持稳定。而公元十世纪时，德国的城市尚未兴起。德国大多数城市是在十一世纪后才出现的。比法国和意大利晚两个世纪。难怪奥托一世的王权很难维持稳定。另一方面，奥托一世发动侵略意大利的战争加速了王权的衰落。在他统治的最后十年中，注意力集中于对外战争上，国内诸侯乘机扩大力量，反对王权。德国历史上王权第二次强大是十一世纪亨利四世在位时期。当时德国的城市已经兴起，王权与市民结盟已有可能。1074年，莱茵市民帮助亨利平息了诸侯的叛乱。1104—1106年，教皇勾结大封建主发动叛乱，莱茵市民又一次站出来支持亨利。编年史中记载：亨利四世"军队的最大部分是从商人方面来的"。① 当时王权强大，社会安定。然而，亨利四世以后，王权很快又衰落了。王权稳定之所以又一次被破坏，关键是德国推行连续不断的对外侵略政策，结果破坏了王权与市民的结盟。据一位历史学家统计，从公元951年

① 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76页。

到1250年，德国侵略意大利共43次，平均每6年一次。十二世纪以后，德国又一再发动对西斯拉夫人的大规模掠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德国的疆土扩大了一倍多，易北河畔的西斯拉夫人逐渐日耳曼化，到十四至十五世纪时，他们已丧失自己民族原来的语言，完全讲德语。①

对外侵略战争为什么会导致王权衰落呢？首先，它破坏王权与市民结盟。市民之所以在王权与诸侯的斗争中支持王权，是因为王权代表着秩序，有利于他们发展工商业。他们对封建方式的侵略兴趣不大。因此，王权在战争中只能依靠诸侯的力量，因而总是强化骑士的队伍，对诸侯有利。果然，亨利四世以后，国王放弃了与市民的结盟，转而讨好诸侯，打击城市。1220年，腓特烈二世颁布法令，给诸侯以铸币权、司法权、收税权，并禁止城市收留农奴。此外，从侵略战争中获得大量土地，必然扩大诸侯的力量。当时西欧大多数封建国家都实行长子继承制，其余子女另找出路。原因是在封土不能扩大的情况下防止分割。而德国却可以在对外战争中获得大批的新土。正如一位威尼斯驻

① 孔祥民《德国中古史》，第45—46页。

德大使所说："世俗诸侯习惯把封邑留给长子，然后把其它领土、主教区或教会采邑留给其他孩子。这样，如果公爵有十个儿子，十个儿子都要求象父亲一样当公爵。结果，德国就出现了无数的伯爵、公爵和方伯，……因此，大部分世俗诸侯总是乐于袭击意大利，好为他的什么儿子、什么兄弟和什么侄子等等，提供封地。"① 长此以往，对外战争必然导致诸侯封地扩大，王权衰落。

到了十三至十五世纪，虽然市民力量已很强大，但是对外战争已使诸侯的力量强大到这种地步：即使偶尔出现王权兴盛，王权与市民力量之和，也不能大于诸侯的力量。因此，王权作为中介力量，在德国已失去了可能性。德国的三角均势不可能建立起来。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德国帝国议会制度上看到。德国的议会与英、法不同，它仅仅是诸侯表决的机器。帝国议会在表决重要的议案时，按惯例只有三票表决权，一票归选侯，一票归诸侯，一票归自由城镇代表。当议会快结束时，核对这三票，只要有两票赞成，表决结果就成

① 《1507年威尼斯驻德大使奎尼关于德国情况的报告》，载于北京师范大学编译《史学选译》第3期，第8页。

立。①而诸侯手中据有两票，违反诸侯利益的议案自然不能通过。自由城镇的选票只有选侯与诸侯发生矛盾时，才能发挥作用。王权则根本没有表决权。

诸侯力量强大到足以压倒一切力量之和，全国统一的局面就难以形成。正如恩格斯所说："只要各诸侯开始感到某皇室的权力变得过份强大，就经常引起王朝的更替"。②1356年，查理四世颁发了黄金证书，从法律上正式肯定了七大选侯选举皇帝的特权。此后，选侯们专门选举那些对自己毫无威胁的弱小诸侯为国王。只要发现国王势力增长，就立即改选。国王成为统一中介的可能性就完全失去了。

必须指出，中介的缺乏只能阻碍新结构取代旧结构的进程，并不能保证旧结构不衰落。十六世纪德国的封建制度已经全面解体，从经济上看，农奴已基本上转化为自耕农或佃农。但是由于缺乏王权的中介作用，这一转化的结果与英、法完全不同。我们知道，促使农奴向自耕农转化有两种力量，一

① 《1507年威尼斯驻德大使奎尼关于德国情况的报告》，载于北京师范大学编译《史学选译》第3期，第7页，

② 恩格斯《关于德国的札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48页。

是商品经济，二是王权。王权限制诸侯力量，促使农奴转化为自耕农，并保证自耕农的生存。但是，这一力量在德国不存在。所以十六世纪德国农奴制的瓦解完全靠商品经济的力量。因此，它得到一个特殊的结果：自耕农很少，大量的农民转化为佃农或耕农。农村中贫富差别十分悬殊，大量农民没有土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关键在于德国不象英法那样有王权限制领主。因此领主可以任意加重对农奴的剥削。假如有王权存在，领主经济出现衰落时，领主并不能任意剥夺农奴的份地，也不能随便提高农奴的地租。在德国，商品经济只可能使农奴中的一小部分演化为自耕农，而大部分则沦为佃农。尽管商品经济瓦解了农奴的人身依附关系，但解放了的农奴已贫困得只能充当佃户。德国农民的境遇比英法的农民要苦得多。德国史学家赫茨研究了十六世纪初萨克森80个农村居民的状况，得到了一个惊人的结论，80个村子共有居民 4,125户，其中完全没有土地的2689户，占65.2%。① 也就是五分三的农民没有任何土地。这与英法大不相同。弗兰克于1534年写道：“德国有非常多的乞丐和一

① 孔祥民《德国中古史》，第84页。

般的穷人，多数人贫困体弱”，“城里游荡着许多穷学徒”，他惊呼“总共只有一半人劳动。如果除去他们的主人、闲散的市民、商人、贵族、诸侯、学生、神甫、各类僧侣、儿童、病人、乞丐和全体妇女，则劳动者不到全体居民的三分一”。①

总而言之，十六世纪德国的封建社会处于一种特殊的状态。一方面是封建制度衰落，城市和商品经济迅猛发展，雇佣劳动普遍出现，市民力量壮大起来。另一方面是缺乏王权的中介作用，诸侯在政治上占主导地位，农村中有大量处于赤贫状态的贫雇农，阶级矛盾空前尖锐，王权衰落失去了与教会抗衡的力量。教会的掠夺与诸侯强大成正比。正如马克思所说：“宗教改革以前，官方的德国是罗马最忠顺的奴隶。”②教皇对德国的掠夺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德皇马克西米连一世（1493—1519）曾说：“教皇在德国的收入比皇帝多一百倍③。”结果，这一切造就了欧洲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宗教改革和农民起义。资本主义潜组织的生长提供了宗教改革的思想核心——人文主义，农民极度贫困造成阶级

①③ 孔祥民《德国中古史》，第84页。第100页。

②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页。

矛盾的尖锐，提供了起义的基础，教皇对德国的掠夺使愤怒的人们把仇恨的目标集中起来，三者合一，正好造成宗教改革和农民起义。然而，诸侯毕竟是最强大的。个别诸侯保护了宗教改革，全体诸侯镇压了农民起义。因此，改革和起义只能得到一个结果：即逐步自下而上地完成意识形态结构的过渡，路德教从异端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由于缺乏中介，政治和经济结构无法实现过渡。即使意识形态的过渡，也经历了极其艰难的过程，这就是以不同宗教为代表的利益集团之间长达30年的宗教战争。

十六至十七世纪，德国社会处于长期的混乱之中。本来新社会结构最后取代旧结构的过程已经开始，但由于缺乏中介，造成了分娩时长期的痛苦。取代过程中出现的动荡首先打击了新生长起来的潜结构——城市。结果，新社会结构流产了。

三十年战争给德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破坏。十六世纪初经济上先进的德国变成了落后的德国。恩格斯写道："在整整一代的时间里，德意志到处都遭到历史上最没有纪律的暴兵的蹂躏……，到处是一片人去地荒的景象。当和平到来的时候，德意志已经无望地倒在地下，被踩得稀烂，撕成碎片，

流着鲜血。①据统计，三十年战争结束时，德国人口已减少三分之一，在科隆、美因斯、特里尔大主教区境内，有二百多个城市和二千多个村落被毁。捷克居民在战前有300万，战后减至78万，一度以纺织品闻名的奥格斯堡战前有人口8万，战后只有12,000人。纺织品产量只及战前的十二分之一。城市、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遭到严重破坏，农奴制普遍地又盛行起来，自由农民就象白色的乌鸦那样少见。②

十五世纪，德国农奴制的消灭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随着商品经济的破坏，农奴制又恢复了。由于农奴制的瓦解一般地基于两种力量：王权对诸侯的限制和商品经济的发展。那么农奴制的再版一般也有两种原因：王权的衰落和商品经济的破坏。东欧和其它地区出现再版农奴制的原因十分复杂，在德国，由于王权从来没有强大过，所以出现再版农奴制的原因较为单纯，仅仅是商品经济的衰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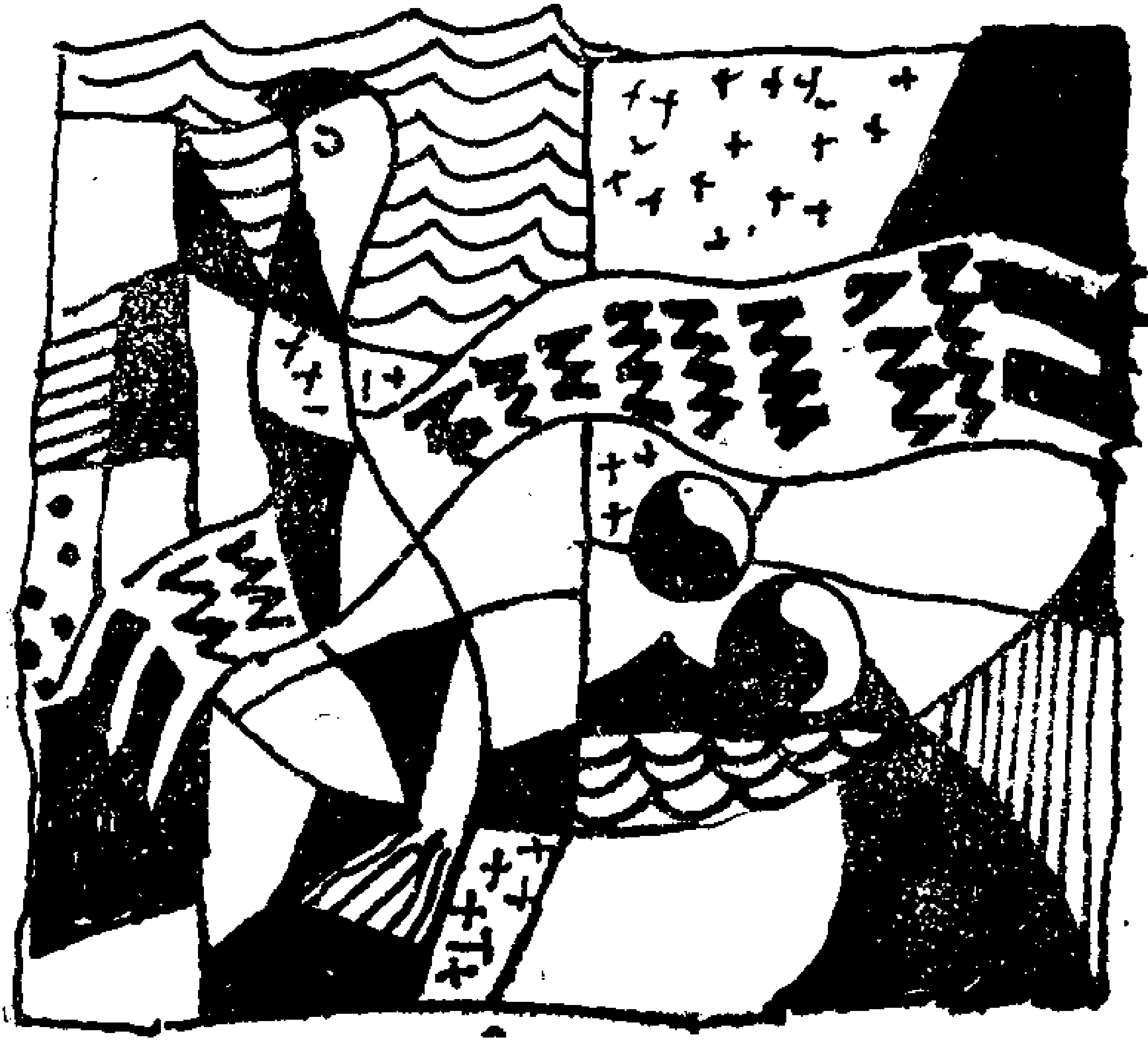
德国再版农奴制的出现使资本主义结构取代封

① 恩格斯《马尔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50—151页。

② 周一良 吴于廑《世界通史》中古部份，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62页。

建结构的历史大大推迟了。它走了一条与英法完全不同的道路。首先要慢慢等待城市经济的恢复，此后又面临着西欧发达的商品经济改造成的巨大国际压力。实际上，后来德国经济和政治结构的转化是在特殊条件下实现的。经济上，是在强大的外来压力下直接从农奴制过渡到资本主义的。随着容克地主转变为资产者，农奴转化成了被雇佣的农业工人和工人。没有经过英法那种先转化为自耕农，再转化为雇佣工人的过程。政治上则是通过王朝兼并战争实现了统一。因此，后来的德国具有强烈的军国主义和国家主义色彩。

总之，对比英、法、德三国发展的道路，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只要对结构取代的条件进行具体分析，我们就完全可以理解社会结构演化在不同文明不同国家的细节。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纲领，无论从宏观方面还是在微观方面，都显示出解决理论问题的巨大生命力。



第六章

结构取代和社会进步

进步不仅仅意味着用一个现实去代替另一个现实，它必须用一个更大的发展可能去取代那个已趋于穷尽的发展可能。

——作 者

一位哲学家讲过："牛顿创立了一种人的语言，既能解释苹果跌落在草地，也能解释太阳的升起。真理就是在眼花缭乱的现象中找到秩序，在庞杂的偶然性中发现必然。"历史唯物主义对人类发展的把握正是这样。前面几章的分析表明，只要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结构适应性的核心原理出发，应用现代科学的系统理论和组织理论，就能得到社会结构演化的普遍规律。我们用这一方法简要地分析了从罗马帝国到西欧资本主义确立这一历史过程，给予了历史研究中很多重大的问题以清晰而

统一的说明。然而，历史唯物主义的生命力绝不仅限于此，它将为研究全部人类发展提供有力的武器。

首先，这一方法不仅可以用来研究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化过程，还可以用于研究所有文明的演化过程。例如研究印度、阿拉伯、日本社会结构的演化过程。所不同的仅是，在这些国度，随着潜组织要素的不同，结构取代的方式是不同的。另外，我们只要稍微浏览一下第四章所讲的社会结构取代的三个步骤，很自然地会提出一个问题：社会结构取代的条件十分严格，无论是功能异化创造新子系统的过程，还是潜结构的形成及占主导地位都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如果这些条件不能满足，会出现什么结果呢？这样，就会得到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结构取代不是社会结构演化的唯一模式。显而易见，当新结构不能取代旧结构时，另一种重要的模式就是旧结构的修复，这时社会结构的演化就呈现出一种崩溃—修复型。中国封建社会自秦汉大一统建立到清朝二千年的演变就是一个典型的范例。关于这一种模式，《在历史表象的背后》一书做了详细的分析。其特点是：旧结构功能异化的结果主要表现在无组织力量的增长上，由于形成潜结构的过程被阻

断，旧结构自身又存在着修复机制，社会结构的演化就出现修复—崩溃—再修复的周期性振荡现象。这种演化模式反映了社会结构处于一种停滞状态，从而是一个超稳定系统。一般说来，要保持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结构数千年不变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内部的潜组织要素和无组织力量增长很快。所以在人类文明史上，很少见到一个庞大的帝国可以稳定地存在五百年以上。一种固定的社会结构，无论它看上去如何强大，都迟早会成为历史博物馆的陈列品。但是，假如社会结构属于崩溃——修复型，情况就很特殊了。我们往往能看到一种颇为壮观的历史现象，古老的社会结构保持几千年，但并不是在静态中保持的，它经历着一次次的崩溃和修复。伴随社会结构停滞的是周期性社会动荡。控制论把它叫做超稳定系统。中国封建社会正是这样一个超稳定系统。一方面，它那古老的社会结构自秦汉到清朝长期地延续下来；另一方面，每隔二、三百年，旧王朝就要崩溃，新王朝就要取而代之。中国封建社会的实例证明，复杂而庞大的文明社会，只有依靠周期性振荡的机制，才能保证生存数千年，这种演化模式不仅适用于中国封建社会，在世界史的研究中，它很可能也适用于古代埃及社会结构的分析研

究。①

结构分析方法还可以说明人类历史中生产水平进步的复杂过程。我们知道，生产水平在总体上是不断发展的。西欧封建社会的生产水平比罗马帝国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水平比封建社会高。但在历史发展的具体过程中，生产水平的发展却并不是连续上升的。从罗马帝国到资本主义社会确立的二千年中，生产水平的进步是一条颇为奇怪的波浪式曲线。罗马帝国生产水平发展最快的时期是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一世纪，在这以后的几百年，生产水平就处于停滞状态。罗马帝国灭亡以后，整个社会生产水平大幅度下降，公元五至七世纪，人口大量死亡，田园荒芜，古代科学技术知识渐被遗忘。一直到八世纪，生产水平才重新开始上升。同样，西欧封建社会的生产发展也不是连续上升的过程，它发展最快的是八至十三世纪，十四世纪到达顶点。十四、十五世纪，生产水平的发展又陷于普遍的停滞，一直到十六世纪以后，才又出现新的增长。为什么生产水平的进步呈现出如此复杂的波浪式特点呢？只要我们应用结构分析的方法考察社会

① 关于这一点，请参阅金观涛 刘青峰《兴盛与危机》第九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结构取代和生产水平发展的关系，就能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一条新的思路。

必须指出，生产水平和经济结构并不是同一个概念。经济结构是指一个社会的经济组织，是人与人之间的普遍的经济关系网。生产水平则反映着人对自然的控制能力、科学技术的发达程度等等。在社会结构稳定的时期，经济结构基本不变，但物质财富却在日益积累，生产水平处于日新月异的变化中，它是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们在第三章中把社会结构比喻为一个桶，社会生活是桶中所容纳的东西的总和。因此，考察生产力的进步和社会结构取代的关系，必须探讨仅仅作为容器的社会结构和丰富多采的社会生活之间的整体联系。尽管这种联系十分复杂，但有一点却很明确，人类社会有组织的生产活动必须要以社会组织的存在为前提。也就是说，生产水平的积累和发展都离不开社会结构。就像蜜蜂酿蜜需要蜂巢一样。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如果在结构取代中出现旧社会结构的瓦解，新社会结构又尚未形成的情况，必然造成对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公元五到八世纪西欧生产水平的倒退正是如此。我们在第四章中证明，罗马帝国灭亡以后，新结构的潜组织要素从旧结构中

剥离下来，一直到八世纪才形成新的社会结构。显然，为什么八世纪以后西欧生产水平又重新提高就不难理解了。那么，在某一种社会结构中，生产水平是不是可以无限增长呢？我们知道，任何一种社会结构都不能永远保持稳定，功能异化和社会生活的增长会破坏社会结构。这就使社会结构和生产水平之间呈现出一种微妙的关系：社会结构存在是生产水平增长的前提，但任何一种社会结构都不可能无限地容纳生产水平的进步。当生产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社会结构就会成为一个天然的界限，限制它进一步的发展。也就是说，任何一种社会结构对生产水平的发展都有一个固定的容量，超过这个容量，社会生活就会把桶撑破。

一般说来，社会结构三个子系统处于适应和比较适应的状态时，生产水平提高往往较快，因为社会结构对生产力的支持作用较大，限制作用尚没有表现出来；当社会结构各个子系统的适应性一天天减弱，生产力的发展将碰到越来越大的限制，使生产水平的进步速度放慢，甚至停滞。所以，某种社会结构内的生产水平发展较快的时期大多是在这种结构建立后的中前期。罗马帝国就是明显的一例。公元一世纪前后，罗马帝国的生产技术发展到顶

点，尽管当时距离社会结构的瓦解还很远，但生产技术的进步已逐渐停滞了。当时，双轮犁和收割机械已经发明，水磨、筑堰修渠、利用水车、施肥等新技术都已出现。但是，这些新技术不能进一步的发展和推广，其原因是遇到了不可逾越的界限，那就是奴隶制度。马克思说过，在奴隶社会中，普遍使用的只能是那些最笨重的生产工具。他说："按照古人恰当的说法，劳动者在这里只是会说话的工具，他们之间的区别只在于此。但是劳动者本人却要让牲畜和劳动工具感觉到，他和他们不一样，他们是人。他虐待它们，任性地毁坏它们，以表示自己与它们有所不同。因此这种生产方式的经济原则，就是只使用最粗糙、最笨重，因而很难损坏的劳动工具。"① 因此，在罗马帝国奴隶制商品经济中，尽管生产规模有很大发展，但生产技术、分工和劳动生产率等经济进步的要素却都有一个天然的界限，这就是奴隶制生产关系所带来的容量极限。

人们常说，西欧农业生产力最大的改进是公元八世纪三圃轮作制和新的轭马法及马蹄铁的普遍应用，它提高了单位农田的产量，并使农业和运输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22页。

术出现了一次革命。其实，新的轭马法的改进在技术上极为简单，只是由过去把轭具放在马颈上改为放在马肩上，这样马在拉车时不致于让轭具压迫呼吸。因此马车的载重量提高了许多倍。为什么罗马使用了几百年的马车，竟没有发现这一点呢？当然，古代技术发明有偶然性。但是，我们可以设想，即使这一发明在古罗马出现，是否也同其它那些机械发明一样得不到推广呢？这一点的确是值得考虑的。因为奴隶不爱护牲口，对马车的载重量漠不关心。可以肯定，三圃制，马蹄铁这些看来并不困难的技术发明只有到西欧封建社会后才能普遍推行。这同社会结构的取代密不可分，农奴制在生产关系上比奴隶制先进，因而对生产水平的提高也具有比奴隶制更大的容量。

社会结构对社会进步的容量限制是多方面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对科学技术和其它创造性活动同样表现出固定的容量。罗马法是罗马帝国在政治上最了不起的创造之一。但无论是罗马法还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说，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都否定奴隶的人格。城市是罗马生活的基础，因而罗马是一个建筑大国，但是罗马皇帝拒绝用机器来搬运神殿的大柱，理由是它会使搬运工失去工作。

阿基米德证明了杠杆原理，并利用这一原理设计了滑轮装置，把一艘新造的大船拉到水中。然而阿基米德也有很浓厚的奴隶制思想，因此常为自己设计的机械感到羞耻。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古罗马的工商业组织规模很大，却又很脆弱，为什么很多新技术发明出现在中世纪看来落后的修道院中，而没有出现在“发达”的罗马城市里。

公元二世纪前后，即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也是整个古希腊罗马科技水平发展的顶点。当时，亚历山大里亚是西方科学的中心。托勒密的天文学、欧几里德的几何学、几何光学、静力学都趋于成熟和完善。但是，从此以后，罗马的科学就再也没有什么发展了。古代自由民科学家已经做完了他们所能做的一切。科学史家在分析当时科学的成就时，都十分奇怪，既然他们在几何和天文学理论上已经达到如此高明的程度，为什么会停滞不前呢？近代实验科学需要科学传统和工匠传统的结合，这在古罗马是做不到的，狭窄的城市社会和古代宗教使当时的科学家成为不被世人理解的一小撮。科学活动的天然藩篱就是城市里小小学院的高墙，在此之外，是一片荆棘丛生的荒野和愚昧的海洋。

社会结构限制生产水平提高的情况在西欧封建

社会中同样存在。近年来历史学家发现，西欧封建社会自八世纪以后，经济一直在稳定发展，但十四世纪似乎是一个顶峰。从十四世纪中叶到十五世纪，经济普遍陷于停滞。英国的羊毛输出量仅为1350年的三分之一，全国羊毛产量也下降了三分之一①。西欧其它地区的情况大多也是如此；当时的德国普遍存在着“荒废的村落”。法国史学家也发现当时的法国耕地荒废、人口减少。比利时史学家发现当时的弗兰德斯城处于历史上最不景气的时期。西方的史学家对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作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如气候、人口、通货、战争等等，结果却令人失望，几乎没有一条是能够普遍成立并令人信服的。但是，假如我们从任何一种社会结构对进步都有固定容量的观点出发，就不难理解这一现象。十四世纪正好是西欧封建社会从适应到不适应的转折点，具有更大容量的资本主义结构还未形成，封建社会结构之桶又快要装满了，社会生活的发展已接近了社会结构容量的极限。来自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各方面的限制，使新的发展失去了可能。

① M·波斯坦《中古社会的经济基础》，载于《世界历史译丛》1980年第4期。

就拿技术发明来说，促进中世纪经济发展的大多数技术革新都是十四世纪以前完成的。英国用三田制代替了二田制，牧羊人饲养出大批高质量的羊群，尼德兰人完善了排干沼泽和筑提防海的技术，水磨工人制造出上击式水车，加斯科尼的葡萄种植者建立了闻名世界的大面积专业化葡萄园等等。从十三世纪末叶起，技术改进越来越慢，规模也越来越小。英国十五世纪的农业进步根本不能同十三世纪相比。假如一个社会结构还存在着创造生活的余地，它本身就鼓励人们去发明，而当人们的创造能力触到了既定的社会关系网时，它就要限制创造活动的发展。整个社会的进步必然碰到巨大的障碍。那么，十五、十六世纪以后，西欧生产水平为什么又有新的增长呢？原因是代表新社会的潜结构迅速成长起来了，它在经济发展中所占的比重已达到不可忽视的程度。尽管完成取代的条件还不成熟，但在英国和法国，已经出现了某种位于封建形态和资本主义形态之间的中介结构，特别是英国，资本主义因素日益占据了社会各方面的主导地位。因此，这一时期经济的增长是在旧结构中的新社会潜结构成长带来的。这时的经济增长和结构取代出现了同步现象。同样，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英国的产业革命

一直要到资产阶级革命完成后才开始，因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意味着一个比封建社会容量更大的结构形成，生产力大解放的时刻也就到来了。法国和德国革命后的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

既然每一种社会结构对进步都有一个固定的容量，那么，对于不同的社会结构，容量就是不同的。我们可以根据结构来判断容量的大小，进而判断结构的演化是否代表着进步。只有新结构的容量大于旧结构时，结构取代才是一种进步。我们说，社会进步很像中国的箱套。这种传统工艺品是一个大箱子，里面一层层地套着小箱子。如果不同的箱子代表不同的社会结构，那么箱子的大小代表结构的容量。但是，社会结构的进步恰好同箱套的顺序相反，是在小箱破裂以后，从中长出一个大箱子来。从小箱子破裂到大箱子长成，社会难免不发生动荡。动荡就可能损伤或中断进步因素的发展。就像哲学家常说的那样，历史上很罕见某种长久的进步不是伴随着暂时的倒退。要使进步成为一种连续过程，不仅需要及时地用大箱子取代小箱子，还要尽可能地使取代近于连续地进行。那样在旧结构瓦解时，更大的新箱子就可以把进步因素从旧结构中吸引出来。如果取代不及时或不连续，就会出现暂时的倒

退。我们研究社会结构的容量和取代过程，可以对社会生产水平的发展和变化作出清晰的判断。

总之，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一旦和现代科学的方法结合，就会形成一个不断深入、不断细化的研究纲领，它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一条可以走出历历迷宫的道路。

人类的历史是漫长而艰难的，然而又是辉煌的，历史研究也是一样。多少年来，历史学家一代接着一代，在被时间尘埃淹没的过去中发现事实，在错综复杂的史料中寻找规律，在黑暗中追求真理。人们渴望着一种能够理解人类发展的历史哲学。本书仅仅是在这方面作了一点尝试。我们希望用自己的探索来鼓舞人们去作进一步的尝试。四百年前，培根曾经说过："不做尝试的危险和失败的危险是不相等的。因为在前一种情况下我们将损失巨大的利益，而在第二种情况下，损失的只是一点人类劳动。"我们的尝试很可能不完全正确，但是我们坚信，如同人类正在逐步认识那浩瀚宇宙的规律一样，亿万人历史活动长河中存在的盲目性在人类科学和理性面前也不会永远继续下去。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
作者＝金观涛
页数＝２４１
ＳＳ号＝１０２３８７７８
出版日期＝１９８５年０４月第１版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第一章　　序言：对历史哲学的渴求
第二章　　从古罗马看社会组织的秘密
２．１　　罗马帝国奇特的商品经济
２．２　　城市生活和罗马帝国的政治与意识形态
２．３　　罗马、中国、印度——不同的社会结构
２．４　　社会组织的结构－功能分析
２．５　　罗马共和国怎样演变为罗马帝国
第三章　　古代社会的衰落
３．１　　是什么因素侵蚀了罗马共和国的小农经济
３．２　　罗马帝国灭亡之谜
３．３　　没有万古长存的帝国
３．４　　适应态破坏的原因：功能异化
３．５　　一个比喻：赫胥黎之桶
第四章　　新社会结构的诞生：西欧封建社会和拜占廷帝国
４．１　　潜组织的成长和取代
４．２　　查理曼帝国和西欧封建制的确立
４．３　　东罗马帝国：斯拉夫人入侵和君士坦丁堡
第五章　　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首先在西欧确立
５．１　　中世纪城市和古希腊罗马城市、东方古代城市的差别
５．２　　影响资本主义确立过程的三种因素
５．３　　议会和三角形均势：英国捷足先登
５．４　　官僚机构的阻碍和法国急风暴雨式的大革命
５．５　　王权衰落和再版农奴制：德国的道路
第六章　　结构取代和社会进步